

復興崗學報

第 126 期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復興崗學報

出版者：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地 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 2 段 70 號

網 址：<https://www.fhk.ndu.edu.tw>

電 話：02-28920854

發行人：唐永清

編輯者：「復興崗學報」編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吳明霖

副主任委員：莊沼渠 邱華源

總 編 輯：董慧明

編審委員：王嵩音 余振民 李昌國 胡正申

范世平 馬振坤 郭育仁 程淑華

陳世民 傅文成 黃葳葳 羅至美

執行編輯：林宗蒲 方自億 羅 洋 鄭瑩妮

孫復威

（以上均按姓氏筆畫排序）

封面設計：胡定傑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403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85 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104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出版

中華民國 50 年 6 月創刊（半年刊）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其他類型版本：無



本著作係採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臺灣授權條款

GPN: 2005000025

ISSN: 0429-8063

復興崗學報 126 期目錄

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辛亥革命」及「民族」之研究：庫博（Corpro） 語料分析應用.....	許閔政、俞貞沅.....1
論我國國防大學教育發展過程與興革方向.....	陳秉賢.....41
當代孫學研究主題大數據分析：以《孫學研究》期刊為例.....	蘇義倫、羅駿慈.....67
當女人成為女兵：從軍教片《中國女兵》探討女性軍人之身體政治學.....	吳依屏.....99
2023年「以哈衝突」爆發的必然性研究：地緣政治因素與宗教因素的探討	楊嘉智.....121

復興崗學報

民114年6月，126期，1-40

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辛亥革命」 及「民族」之研究：庫博（Corpro） 語料分析應用

許閔政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

俞貞沅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 要

習近平於 2021 年的紀念辛亥革命 110 週年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要求中國人民必須弘揚愛國精神，鑄牢民族意識。自詡為孫中山的繼承者是中共領導人慣用論述，然中共領導人對孫中山之評價為何？中共的愛國思想是否符合孫中山民族思想原意？

本研究使用電腦輔助語料工具就 1956 年至 2021 年間中共領導人在孫中山誕辰及辛亥革命紀念大會的談話文稿進行分析，發現中共領導人對孫中山、民族及辛亥革命的論述是有固定邏輯、鋪陳與脈絡，而操弄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是中共推崇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最終目的。

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辛亥革命」及「民族」之研究：庫博（Corpro）語料分析應用

關鍵詞：孫中山、辛亥革命、中共、民族、愛國主義

通訊作者為俞貞沅，電子郵件：itapea0219@gmail.com。

許閔政、俞貞沅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of CCP Leaders Regarding Sun Yat-Sen's "1911 Xinhai Revolution" and "Nationalism": A Linguistics Approach of Corpro

Min-Cheng Hsu

Doctoral student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Chen-Yuan Yu

Doctoral student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In 2021,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at the CCP is the inheritor of Sun Yat-Sen's revolution during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Xi also called on the Chinese people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consensus. The CCP leaders often describe themselves as the inheritors of Sun Yat-Sen, but what are their evaluations of Sun Yat-Sen? Whether the patriotism ideology used by the CCP aligns with Sun Yat-Sen's original vision of nationalism?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science methodologies, employing the computer-assisted analysis tool to analyze 12 speech transcripts delivered by the important CCP leaders at commemorative events for Sun Yat-Sen's birthday and the Xinhai Revolution from 1956 to 2021.

The findings reveal a consistent and structured discourse strategy by CCP leaders. The ultimate goals of CCP's reverence towards Sun Yat-Sen is to manipulate national spirit and patriotism.

Keywords: Sun Yat-Sen, 1911 Xinhai Revolution, CCP, Nationalism, Patriotism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Yuan Yu; Email: itapea0219@gmail.com

壹、前言

1911 年 10 月湖北武昌革命黨人發動起義，結束中國二千餘年的帝制王朝（戚嘉林，2012），同年 12 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並於 1912 年 1 月 1 日宣誓就任，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另 1911 年為中國天干地支紀元的辛亥年，故史稱「辛亥革命」。

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帝制，一舉改變中國的歷史與命運，是故受到全球華人的推崇與景仰。以我國為例，1940 年由國民政府明令通告尊稱孫中山為國父（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無日期，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49>）。中共則於 1956 年舉行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此後每逢 10 週年的辛亥革命紀念日辦理大型慶祝活動（楊開煌，2021）。中共領導人在歷次大會均發表談話，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更親自主持相關紀念活動，顯見對孫中山之尊崇。

值得深思的是，雖然中共歷屆領導人對孫中山抱持高度評價，讚揚辛亥革命開創中國新格局，但又強調辛亥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如胡錦濤在 2008 年的紀念改革開放 30 年大會指出，當代中國歷經三次偉大革命，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 1949 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第三次改革開放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毛磊，2016）。

此外，依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族概念，中國的民族主義係大漢族主義；過往學者亦指出，孫中山的民族思想在後期轉化為強調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主義（朱宏源，1993；蕭亞譚，2007）；而中共之民族主義思想是源自馬克思及列寧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認為民族主義是爭取革命勝利，完成任務後便可以棄用；近年民族主義亦被中共作為維護政權、抑制境內分離主義的工具，並將內部改革訴求曲解為來自西方的陰謀，透由激化民族情緒對抗國際壓力，型塑愛國就必須愛黨的黨國意識形態（吳心晒、黃忠偉，2010）。

沿此脈絡下，中共高層究竟如何評價孫中山？為何強調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革命？中共現今慣用的愛國主義及民族思想是否符合孫中山之原意？前述問題共同交織組成本文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本文區分五大部分，於前言說明問題意識，接續透由文獻回顧爬梳孫中山民族思想演變及中共民族思想與愛國主義，探討晚清及民國肇建的時代背

景如何影響孫中山民族思想，中共建政後民族思想是否發生質變；第三部分係以資料科學為基礎，運用語料分析工具，就中共慶祝辛亥革命與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的講話內容進行文本分析，以實證方法檢視歷任領導人對孫中山、民族、辛亥革命的論述；第四部份討論自 1956 年至 2021 年間，歷任領導人論述孫中山、辛亥革命、民族與愛國精神的特徵、脈絡與時代意義；最後於結語總結研究發現並提出未來可行研究方向。

貳、文獻回顧

一、孫中山之民族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後之演變

孫中山一生歷經君主專制及與民主初建兩個階段，其思想可能因時代因素而有不同內涵。如蕭亞譚認為孫中山民族思想可區分排滿鬥爭、五族共和及中華民族論三階段，民國建立前孫中山的民族論述是以「排滿鬥爭」為核心，由興中會誓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便可得證；建立民國後，因希望新國家能繼承滿清的領土，並預防各民族在國勢不穩情況下各自獨立，故民族論述修正為漢、滿、蒙、回、藏共存之「五族共和」論；然孫中山於 1919 年在《三民主義親撰篇》再度修正其論述，提及漢族要犧牲其血統、歷史與自大，與滿、蒙、回、藏之合而治之；從前述內容可以得知，孫中山係在「五族共和」基礎上追求一個同質的中華民族（蕭亞譚，2007）。

朱宏源則以對內和對外區分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對內係思考境內種族關係，且以漢族立場為重；對外則將各族視為一體，論述與外國民族的關係；此外亦指出清末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均經歷巨大變化，中國的民族思想在中西文化不斷衝擊下進行探索，故其民族思想是不斷變化的（朱宏源，1993）。

那思陸將民族主義區分為包容型與排斥型的民族主義，包容型民族主義是以平等為基礎，多數民族須尊重、同意少數民族自決權；而排斥型民族主義是以壓迫、侵略其他種族為基礎，可分為主張壓迫與滅絕的激進型及主張同化與融合的溫和型（那思陸，1994）。孫中山早期的民族思想雖以漢族為

核心，且「驅除韃虜」主張亦頗為激進，但其實是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及滿清的統治，易言之，孫中山其實是反對民族間的侵略與霸凌，因此與激進的排斥型民族主義顯有不同；而孫中山後期主張的同化與融合，在概念上較符合溫和的排斥型民族主義。

此外筆者參照蕭亞譚（2007）孫中山民族思想變化三階段，並依歷史事件製作「孫中山民族思想變化與歷史重大事件對照表」（如表 1），從歷史的視角分析孫中山民族思想。沿表 1 脈絡得知，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前後並不連貫且有斷裂情形。辛亥革命前，孫中山主張以漢族為核心的民族主義，其著眼是為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未依革命口號建立漢族國家，而是希望將少數民族納入中國（沈松僑，2002）。沿此脈絡下，孫中山始終以復興中國為念，其不斷變動的民族主義是救國的工具與策略，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再度成為與西方並駕齊驅的富強之國（朱宏源，1993；鍾道明，2012）。

表 1：孫中山民族思想變化與歷史重大事件對照表

孫中山 民族思想	時間	事件	說明
排 滿 鬥 爭 論	1840 年 至 1910 年	1. 自 1840 年起清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義和團之亂更導致 1900 年的八國聯軍。 2. 孫中山於 1866 年出生，在清朝腐敗、列強欺凌、經濟積弱的背景成長，故其民族思想顯受時空背景所影響。	在辛亥革命及民國初肇前，孫中山狹隘的排滿論述係清廷腐敗不堪且中國人口以漢族為主，此時的排滿是為了推翻滿清的階段性任務。
	1911 年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	

孫中山 民族思想	時間	事件	說明
五族共和論	1912 年	袁世凱逼迫溥儀退位；中華民國成立。	戚嘉林（2012）及朱法源（1993）認為民國初建時，滿、漢之間仍存有族群矛盾，且其他民族如蒙古、西藏、新疆等亦受到革命及民族自決思潮影響，紛紛尋求獨立，孫中山為彌補民族的裂痕，開始主張五族共和，希望中華民國能繼承清朝領土，更期盼各族支持新政府，避免中國再度分崩離析。
	1912 年	3 月實施《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任第二屆臨時大總統。	
	1913 年	宋教仁被暗殺，孫中山對袁世凱不滿並發起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	
	1915 年 至 1916 年	1. 北洋政府接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激起民族主義情緒。 2. 袁世凱改國號中華帝國引發全國抗爭，蔡鍔、唐繼堯發起「護國軍」討袁。 3. 袁世凱病逝，中國開始軍閥割據時期。	
	1917 年	張勳擁溥儀復辟失敗，孫中山展開第一次護法運動。	
	19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概念。	

孫中山 民族思想	時間	事件	說明
中華民族論	1919 年	1. 一次大戰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2. 北京學生遊行抗議巴黎和會決議，長期積蓄的民族情緒爆發並開始五四運動。	1919 年孫中山民族思想再次變化，全盤否定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及五族共和論；此外依〈修改章程之說明〉，孫中山認為直到各民族融合成中華民族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才算完成。朱泐源（1993）認為變化的原因係中國仍以漢族為主體，且滿、蒙、回、藏等已受日、俄、英國影響，唯有形塑整體中華民族意識，方能對抗帝國主義。
	1920 年	孫中山重建軍政府，開始第二次護法。	
	1921 年	1. 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5 月宣誓就任並反對北洋政府。 2. 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與第三國際代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國共產黨。	
	1922 年	陳炯明叛變，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	
	1924 年	國共第一次合作實施聯俄容共。	
	1925 年	孫中山先生逝世。	

資料來源：

1. 〈孫中山民族主義 /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戚嘉林，2012，《海峽評論》，253：27。
2. 〈再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朱泐源，199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337、343、345。
3. 〈三民主義〉，孫中山，1919，《國父全集》（第 2 冊，論著，頁 335），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1989，臺北：近代中國。
4. 〈修改章程之說明〉，孫中山，1920，《國父全集》（第 3 冊，演講，頁 215-219），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1989，臺北：近代中國。
5. 作者參考中國近代歷史事件自行整理。

二、中共視角下的民族思想與愛國主義

西方世界在 19 世紀歷經民族主義思潮，且隨著經濟發展及資源需求大增，部分國家開始侵略他國以獲得天然資源，共產主義藉此主張，弱小國家必定會被資本主義帝國借民族主義之名，行壓迫與剝削之實（胡婉庭，2012）。此外西方民族主義是以血緣區分民族，馬克思是以階級意識為基礎，認為西方民族主義必將造成經濟對立並引發革命（劉性仁，2009）；惟共產主義卻不排斥將民族主義作為推動革命的工具，這種作法由列寧發揚光大，又稱「列寧式民族政策」（劉性仁，2009；施正鋒，2016）。

中共思想路線係奠基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依前述馬克思及列寧主張，應在革命完成後棄用民族主義，但當時人民已廣泛接受民族主義思想，且隨後日本開始侵略中國，激起全國抗敵的民族情緒，故中共將民族主義轉化成具有愛國意涵的「民族共產主義」（劉性仁，2009）。威權政體常將黨與國家包裹在一起，並利用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強化治理正當性，如冷戰期間蘇聯與南斯拉夫便以愛國主義壓制內部族群差異與紛爭（He & Guo, 2000）。吳瑟致指出，自建政後中共便建構「二元對立」概念，每當出現危及政權或與西方國家出現矛盾或衝突時，便會操弄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強化統治正當性，批判資本主義、維護民族自尊等口號成為凝聚團結的利器（吳瑟致，2022）。

近年中共進一步將愛國思想擴張為國族認同，並將層次拉高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而言，中共認為「愛國主義」內含的國家認同必須與中共統治相連結。在中共的刻意灌輸與滋養下，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近年在中國逐漸崛起，對內開展「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大眾流行文化，並對外國展現敵意（Chang, 2020），同時刻意強調「大國自信」，發展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從新冠疫情期間的話語分析研究中發現，中國網民展現高度自信，認為中國防疫的表現比其他國家更好（Wang & Tao, 2021）。

為何近期愛國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主張愛國主義為官方刻意主導的學者認為，由官方媒體的強硬態度顯示係由中共刻意引導，希望團結對抗來自外部的壓力；相反的，主張民間自發提升愛國意識型態的學者認為，因為民間高度擁護民族主義，使中共不得不在壓力下有所作為（汪宏倫，2014）；

亦有學者將中國民族主義與「百年屈辱」、「落後就會挨打」等口號相連結，主張中共是因應現代化和門戶開放政策才提出前述口號，後來卻用作滿足民族主義需要（Wang, 2020），此外中國內部亦對近年西方媒體就南中國海、西藏及人權的報導產生不滿，助長民族主義擴張（Hussaini, 2020）。

三、孫中山與中共在民族思想的異與同

透由梳理孫中山五族共和、中華民族論並比對中共建政初期的民族政策，可發現部分理念相同之處。如孫中山早期的排滿、反帝的民族主義是為了建立民國，中共也利用反帝及反階級壓迫獲取民心；孫中山的主張是為了避免國內各族尋求自決，造成再次分裂，而中共創黨時曾討論建立民族自治聯邦國家的可能性，惟考量中國歷史、社會景況、部分民族尋求獨立、國際形勢等，最後放棄實施聯邦國家，只允許少數民族實施區域自治（曹清波、吳楚克，2016）。就反對民族間的壓迫、維持領土完整及權衡時宜的方法觀之，孫中山與中共的民族思想與做法確有部分相同之處。

此外，中共在文化革命期間藉由「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清洗少數民族原有的傳統文化、宗教、語言，同時強迫融入漢族（朴炳光，2013）。雖然中共主張前述融合是社會主義建構過程中的民族自然融合，不具強制性，但這樣的思維與作法與孫中山所推崇的溫和漸進及五族共和思想背道而馳。

隨後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共對少數民族實施經濟優待、補貼等特殊待遇（朴炳光，2013），希望消弭先前激烈的民族同化造成的創傷；此外胡錦濤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2010），習近平亦在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3）。可知鄧小平後的中共領導人均主張將各族融為一體，打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前述內容大抵符合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論及復興中國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進一步地將愛國主義擴展至民族認同，甚或將層次提升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海內外華人加強中國認同，並希冀延伸至對共產黨的忠誠。易言之，中共將「愛國」曲解為「愛黨」，將愛國與中共統治相聯繫，不斷灌輸人民只要支持、認同中國，就必須支持中共統治。

中共選擇性的擷取孫中山民族及救國思想，並擴大解釋為愛國就必須愛中共，顯已偏離孫中山原意。

參、檢視中共領導人如何評論孫中山、辛亥革命及民族思想

過往對於中共領導人及政府部門的官方論述研究相當豐沛，如顏瑞宏以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習近平在中共建政 70 週年的講話內容（顏瑞宏，2021）。此外運用電腦軟體進行中共領導人講話內容文字探勘的方法正蓬勃發展中，如梁梓然對習近平的 2,486 篇講話稿進行文本探勘，並與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歷屆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相互比對，爬梳中共反霸權論述的發展脈絡（梁梓然，2023）；此外亦有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及《論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等書籍進行文本探勘，並由民粹威權主義觀點分析中共建構政治敘事的策略（黃信豪，2023）。

本研究係採用「庫博（Corpro）中文語料庫分析」之辭頻、共現詞，以及 TF-IDF 進行文本分析。「庫博」是一個以語料庫為基礎，適合分析中文文本的電腦輔助工具，其主要功能為輔助研究者分析文本中字詞的出現頻率，以及透由詞彙搭配的共現關係分析瞭解上下文脈絡，藉以得知文本的意涵與邏輯（傅文成，2020；闕河嘉、陳光華，2016）；就學理而言，單一字詞的重要性會依出現的頻率而增加，因此辭頻是一個重要的評估指標，但單憑辭頻還不足以決定字詞的重要性，雖然出現頻率非常高，但有可能是不重要也不具分析價值，如發語詞、介系詞、代名詞、感嘆詞及標點符號，因此可納入停用詞（傅文成、黃琇戩、顏瑞宏，2021）。使用停用詞可以增加分析效率與準確率；實務上沒有統一或標準的停用詞表，須依分析目的和文本內容決定。

TF-IDF 是一種統計方法，分別由辭頻（Term Frequency, TF）和逆文檔頻率（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組成，辭頻代表單一字詞在全體文本出現的次數，而逆文檔頻率則是具稀有且有特徵的詞語（在較少的文本中出現）有較高的權重值，而常見的詞語（在較多的文本中出現）權重值較低（Frommholz & Roelleke, 2016）。易言之，單詞的重要性會因在單一文本頻

繁出現而增加，但隨著在所有文本頻繁出現而下降；本研究藉 TF-IDF 得知各單詞的重要性，並據以爬梳文本的重心及論述的脈絡。

揆諸前述，本研究在完成資料蒐集後，將透由辭頻、共現詞、停用詞、TF-IDF 等文本探勘工具進行分析。

一、資料蒐集

在資料蒐集方面，中共於 1941 年設立辛亥革命紀念日（楊開煌，2021），自 1949 年建政後更不吝辦理相關紀念活動；此外歷屆中共領導人亦多次讚揚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惟講話內容論點擴散未聚焦，且篇幅及文字比例亦偏低；在歷次講話場合中，最重要且對孫中山、辛亥革命論述最豐富的，是每逢 10 週年辦理的辛亥革命及孫中山誕辰大型紀念活動，並循例由中共領導人發表談話，沿此脈絡下，前述內容顯然是最適合分析中共領導人對孫中山、辛亥革命及民族思想論述的文本資料；此外本研究以庫博之辭頻與共現詞為主要分析方法，如將 1949 年迄今所有提及孫中山、辛亥革命的講話內容納入辭頻分析，將會產生大量「雜訊」，反而影響辭頻分析準確度。

基於前述理由，本研究聚焦 1949 年後每逢 10 週年的紀念孫中山誕辰，以及紀念辛亥革命大會毛澤東等 8 位中共領導人講話內容。活動資料彙整如表 2、3：

表 2：1949 年後中共辦理大型紀念辛亥革命活動說明表

時間	週年數	講話人	資料來源
1961 年	50 週年	周恩來	中國政協網 ^a
1981 年	70 週年	胡耀邦	人民日報 ^b
1991 年	80 週年	楊尚昆	陝西省文史資料數據庫 ^c
2001 年	90 週年	江澤民	中國國務院公報 ^d
2011 年	100 週年	胡錦濤	中國政府網 ^e
2021 年	110 週年	習近平	中國政府網 ^f

資料來源：

- a. 〈周恩來在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2011 年 9 月 14 日，取自中國政協網 <http://www.cppcc.gov.cn/2011/09/14/ARTI1315964727713274.s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b. 〈在首都各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1981 年 10 月 10 日，《人民日報》，1 版。
- c. 〈首都隆重集會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無作者、無年代），取自陝西省文史資料數據庫 https://www.sxlib.org.cn/dfzy/wszl/sxswszlsxg/zzl_5157/qt_5170/201701/t20170122_608891.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d. 〈在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無年代），《中國國務院公報》2001 年第 31 號，取自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1114.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e. 〈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 10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無年代），取自中國政府網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1-10/09/content_1964851.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f. 〈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 11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無年代），取自中國政府網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09/content_5641633.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表 3：1949 年後中共辦理大型紀念孫中山誕辰活動說明表

時間	週年數	撰稿或講話人	文本資料來源
1956 年	90 週年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 ^a
1966 年	100 週年	周恩來	人民日報 ^b
1986 年	120 週年	彭真	人民日報 ^c
1996 年	130 週年	江澤民	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 ^d
2006 年	140 週年	胡錦濤	中國政府網 ^e
2016 年	150 週年	習近平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f

資料來源：

- a.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11、312），毛澤東，1977，北京：人民出版社。
- b. 〈在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周恩來總理的講話〉，（無作者），1966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報》，2 版。
- c. 〈彭真在首都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大會上講話〉，（無作者），1986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報》，2 版。

- d. 〈江澤民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無年代），取自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 http://www.gwytb.gov.cn/zt/zylszl/speech/jhzl/201101/t20110123_1725491.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e. 〈胡錦濤在孫中山誕辰 140 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無年代），取自中國政府網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6-11/12/content_440200.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f. 〈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無作者、無年代），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1111/c64094-28854791.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接續運用闕河嘉及陳光華設計之「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以及 TF-IDF 進行前述文本分析。具體而言，首先以庫博分析工具自表 2、3 的 12 篇講話（專文）稿萃取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文字雲如圖 1-12），再彙整每篇文章中與「民族」、「辛亥革命」共同出現的字詞，接續計算並列出 12 篇文本中 TF-IDF 權重值最高的前 10 個單詞（如表 4），最後將頻繁出現且不具分析價值的單詞列為停用詞，並依毛、鄧、江、胡、習五代領導人主政時間重新整理（如表 5、6、7），藉以爬梳中共五代領導人對孫中山、民族及辛亥革命的論述偏向及時代意義。

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辛亥革命」及「民族」之研究：庫博（Corpro）語料分析應用

圖 1：紀念孫中山 90 週年誕辰文字雲



圖 3：紀念孫中山 120 週年誕辰文字雲



圖 5：紀念孫中山 140 週年誕辰文字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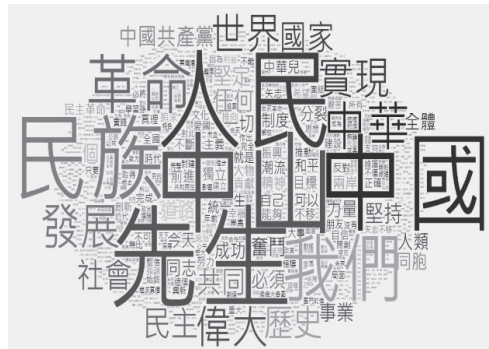
圖 2：紀念孫中山 100 週年誕辰文字雲



圖 4：紀念孫中山 130 週年誕辰文字雲



圖 6：紀念孫中山 150 週年誕辰文字雲



A word cloud visualization featuring various Chinese political terms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s. The most prominent words are "革命" (Revolution) and "社會主義" (Socialism), which form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omposition. Other significant words include "中國共產黨"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民族" (Nationality), "偉大" (Great), "人民" (People), "勝利" (Victory), "我們" (We), "世界" (World), "先鋒" (Pioneer), "取得" (Achieved), "團結" (Unity), "領導" (Leadership), "階級" (Class), "資產階級" (Bourgeoisie), "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解放" (Liberation), "鬥爭" (Struggle), "政策" (Policy), "事業" (Cause), "反動" (Reactionary), "共同" (Common), "到底" (To the bottom), "發展" (Development), "一切" (Everything), "這裡" (Here), "我" (I), "固定" (Fixed), "實現" (Realization), "民主" (Democracy), "民權" (Civil Rights), "自由" (Freedom), "平等" (Equality), "和諧" (Harmony), "穩定" (Stability), "繁榮" (Prosperity), "昌盛" (Thriving), "幸福" (Happiness), "安康" (Peace and Health), "富強" (Rich and Strong), "文明" (Civility), "進步" (Progress), "開放" (Opening up), "改革" (Reform), "創新" (Innovation), "發展" (Development), "進步" (Progress), "繁榮" (Prosperity), "昌盛" (Thriving), "幸福" (Happiness), "安康" (Peace and Health).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gray grid.

[illegible]

表 4：中共領導人於各紀念活動談話單詞 TF-IDF 權重值統計表

權重值 排序	辛亥革命					
	50 週年	70 週年	80 週年	90 週年	100 週年	110 週年
1	革命 (0.416)	革命 (0.300)	中國 (0.370)	中國 (0.424)	中國 (0.393)	中國 (0.435)
2	主義 (0.240)	中國 (0.256)	我們 (0.275)	革命 (0.345)	中華民族 (0.268)	人民 (0.260)
3	中國 (0.224)	我們 (0.256)	革命 (0.267)	人民 (0.239)	革命 (0.231)	革命 (0.232)
4	人民 (0.208)	人民 (0.198)	人民 (0.189)	兩岸 (0.181)	人民 (0.231)	中華民族 (0.214)
5	階級 (0.207)	先生 (0.185)	國家 (0.189)	統一 (0.162)	實現 (0.216)	歷史 (0.182)
6	我們 (0.192)	世界 (0.165)	社會主義 (0.120)	辛亥 (0.141)	發展 (0.177)	偉大 (0.175)
7	偉大 (0.176)	台灣 (0.141)	辛亥 (0.111)	對話 (0.127)	中華 (0.144)	偉大復興 (0.168)
8	民主 (0.176)	辛亥 (0.140)	統一 (0.111)	民族 (0.124)	辛亥 (0.138)	實現 (0.136)
9	帝國 (0.161)	和平 (0.134)	祖國 (0.111)	發展 (0.123)	先生 (0.131)	民族 (0.136)
10	社會主義 (0.160)	主義 (0.115)	現代化 (0.108)	先生 (0.115)	孫中山 (0.131)	先生 (0.126)

權重值 排序	孫中山誕辰					
	90 週年	100 週年	120 週年	130 週年	140 週年	150 週年
1	中國 (0.322)	革命 (0.410)	中國 (0.343)	孫中山 (0.348)	中國 (0.385)	中國 (0.384)
2	革命 (0.322)	先生 (0.307)	革命 (0.330)	中國 (0.334)	孫中山 (0.336)	孫中山 (0.287)
3	應當 (0.286)	孫中山 (0.279)	孫中山 (0.211)	革命 (0.305)	先生 (0.336)	先生 (0.281)
4	方面 (0.199)	主席 (0.241)	人民 (0.198)	先生 (0.305)	人民 (0.213)	人民 (0.276)
5	情況 (0.198)	中國 (0.233)	我們 (0.198)	我們 (0.174)	我們 (0.188)	我們 (0.189)
6	這樣 (0.174)	偉大 (0.186)	民族 (0.185)	人民 (0.145)	革命 (0.147)	革命 (0.168)
7	時期 (0.159)	主義 (0.167)	民主 (0.145)	愛國 (0.118)	中華民族 (0.144)	偉大復興 (0.135)
8	缺點 (0.154)	人民 (0.158)	合作 (0.138)	民主 (0.116)	實現 (0.124)	發展 (0.124)
9	謙虛 (0.154)	階級 (0.151)	勝利 (0.100)	統一 (0.109)	統一 (0.115)	實現 (0.122)
10	先生 (0.134)	帝國 (0.141)	抗日 (0.097)	偉大 (0.101)	和平 (0.114)	國家 (0.11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5：中共五代領導人於各紀念活動談話內容辭頻統計表（扣除停用詞後）

時間	活動	致詞人	調整後辭頻統計表
毛澤東時期	1956 年 孫中山誕辰 90 週年	毛澤東	應當、方面、一個、時期、紀念
	1961 年 辛亥革命 50 週年	周恩來	勝利、社會主義、民族、領導、共產黨
	1966 年 孫中山誕辰 100 週年	周恩來	鬥爭、社會主義、紀念、領導、列寧
鄧小平時期	1981 年 辛亥革命 70 週年	胡耀邦	奮鬥、民族、世界、台灣、建設、統一
	1986 年 孫中山誕辰 120 週年	彭真	民族、勝利、共產黨
江澤民時期	1991 年 辛亥革命 80 週年	楊尚昆	國家、祖國、現代化、統一
	1996 年 孫中山誕辰 130 週年	江澤民	建設、祖國、統一、共產黨
	2001 年 辛亥革命 90 週年	江澤民	統一、民族
胡錦濤時期	2006 年 孫中山誕辰 140 週年	胡錦濤	中華民族、民族、奮鬥
	2011 年 辛亥革命 100 週年	胡錦濤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奮鬥
習近平時期	2016 年 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	習近平	世界、中華民族
	2021 年 辛亥革命 110 週年	習近平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

備註：筆者依中國五代領導人主政時期的時序重新整理 12 篇文稿，並將出現頻率較高且不具分析價值的單詞停用（計有：孫中山、我們、中國、革命、偉大、人民、實現、發展、中國人、辛亥革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6：中共五代領導人談話內容與民族、辛亥革命等詞彙共現字詞表
(扣除停用詞後)

時間	活動	致詞人	民族	辛亥革命
毛澤東時期	1956 年 孫中山誕辰 90 週年	毛澤東	文中無出現民族 一詞	時期、共和國、 帝制、建立、推 翻、紀念、豐功 偉績、領導人
	1961 年 辛亥革命 50 週年	周恩來	奮鬥、一切、勝 利、團結、帝國 主義、民主、社 會主義、解放	紀念、事業、勝 利、崇高、敬意
	1966 年 孫中山誕辰 100 週年	周恩來	世界、修正主義、 列寧、十月革命、 合作、帝國主義	領導、建立、推 翻、紀念、民主 革命、共產黨、 列寧
鄧小平時期	1981 年 辛亥革命 70 週年	胡耀邦	國家、建立、歷 史、發展、鬥爭	建立、全國、力 量、推翻、獨立
	1986 年 孫中山誕辰 120 週年	彭真	勢力、困難、挫 折、推進、災難、 發展、解放、道路	三民主義、思 想、領導、民 主、共和
	1991 年 辛亥革命 80 週年	楊尚昆	出路、國家、沒 有、鬥爭、事業	國家、出路、沒 有、事業、奮鬥
江澤民時期	1996 年 孫中山誕辰 130 週年	江澤民	民主、事業、國 家、奮鬥、光輝、 功勳	侵略、列強、功 績、殖民地、封 建、帝制、愛國
	2001 年 辛亥革命 90 週年	江澤民	歷史、爭取、反 動、國家、幸福、 振興中華、獨立	先驅、紀念反 動、中華民族、 奮鬥

時間	活動	致詞人	民族	辛亥革命	
胡錦濤時期	2006 年	孫中山誕辰 140 週年	胡錦濤	獨 立、 革 命、 奮 鬥、傑出	三民主義、同盟 會、中華民族、 事業、信念、功 勳、專制
	2011 年	辛亥革命 100 週年	胡錦濤	進 步、 統 治、 發 展	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先驅、奮 鬥
習近平時期	2016 年	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	習近平	奮 鬥、 世 界、 偉 大復興	世 界、 中 華 民 族、推動、民主 革命、理念、領 導、共和
	2021 年	辛亥革命 110 週年	習近平	復 興、 世 界、 社 會	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近代

備註：筆者依中國五代領導人主政時期的時序重新整理 12 篇文稿，並將出現頻率較高且不具分析價值的單詞停用；與民族共現且停用的單詞為中國、實現、人民、孫中山、我們、中國人、中華民族、偉大、辛亥革命；與辛亥革命共現且停用的單詞為中國、中國人、實現、孫中山、革命、偉大、歷史、發展、人民、民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7：中共領導人於各紀念活動談話 TF-IDF 高權重值字詞表（扣除停用詞後）

時間	活動	致詞人	TF-IDF 高權重值字詞
毛澤東時期	1956 年 孫中山誕辰 90 週年	毛澤東	應當、方面、情況、這樣、時期、缺點、謙虛、民主派、研究、紀念、豐功偉績
	1961 年 辛亥革命 50 週年	周恩來	主義、階級、偉大、民主、帝國、社會主義、勝利、團結、民族
	1966 年 孫中山誕辰 100 週年	周恩來	主席、偉大、主義、階級、帝國、路線、列寧、民主派、鬥爭
鄧小平時期	1981 年 辛亥革命 70 週年	胡耀邦	世界、臺灣、和平、主義、民族、歷史、統一、霸權、民主
	1986 年 孫中山誕辰 120 週年	彭真	民族、民主、合作、勝利、抗日、偉大、主義、發展、歷史、國家
江澤民時期	1991 年 辛亥革命 80 週年	楊尚昆	國家、社會主義、統一、祖國、現代化、分裂、改革、民族、出路、主義
	1996 年 孫中山誕辰 130 週年	江澤民	愛國、民主、統一、偉大、建設、祖國、中華民族、現代化、國家
	2001 年 辛亥革命 90 週年	江澤民	兩岸、統一、對話、民族、發展、共產黨、實現、中華民族
胡錦濤時期	2006 年 孫中山誕辰 140 週年	胡錦濤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統一、民族、和平、奮鬥、關係、發展、世界
	2011 年 辛亥革命 100 週年	胡錦濤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發展、中華、兩岸、和平、民族、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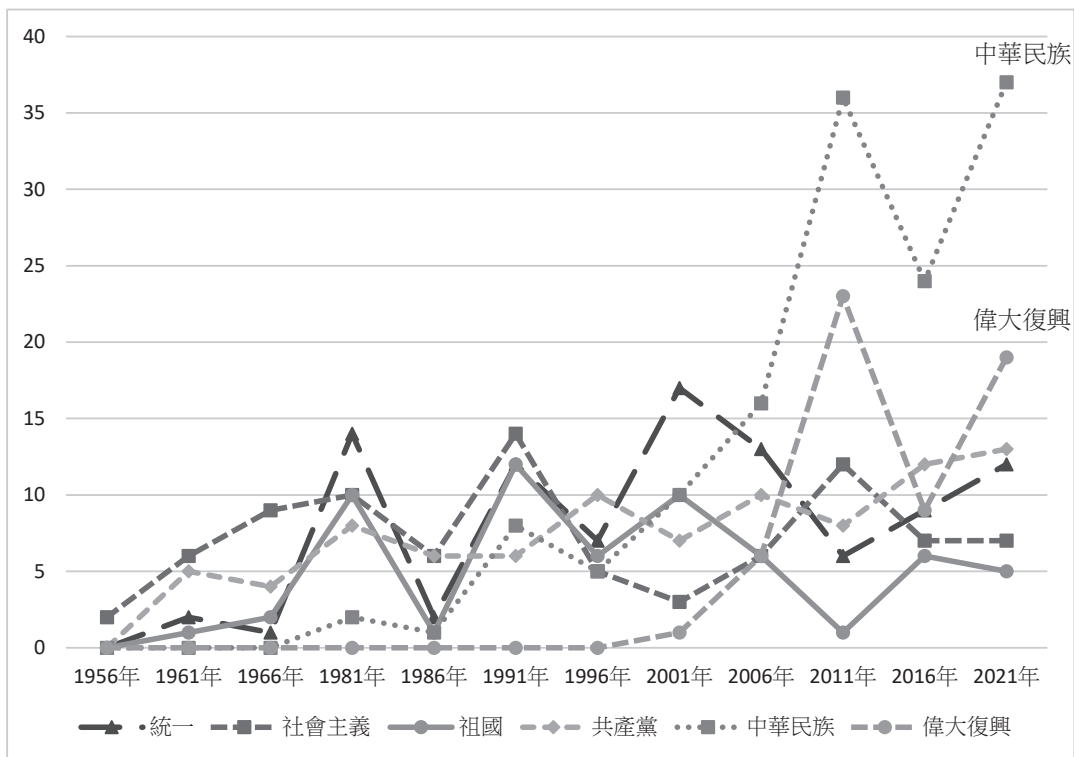
時間	活動	致詞人	TF-IDF 高權重值字詞
習近平時期	2016 年 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	習近平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展、實現、國家、民族、世界、堅定、奮鬥、歷史
	2021 年 辛亥革命 110 週年	習近平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大、實現、民族、中華、發展

備註：筆者依中國五代領導人主政時期的時序重新整理 12 篇文稿，並停用頻繁較高且不具分析價值的單詞（計有：中國、革命、先生、我們、人民、孫中山、辛亥革命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首先在辭頻統計結果方面，12 篇文稿出現頻率前 10 名的詞彙分別是孫中山（216 次）、我們（196 次）、中國（183 次）、革命（173 次）、中華民族（139 次）、偉大（137 次）、人民（132 次）、實現（122 次）、發展（118 次）、中國人（111 次）、辛亥革命（109 次）等，顯示文稿主軸與紀念辛亥革命與孫中山誕辰相切合，而偉大、實現、發展等詞顯示中共領導人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高度評價；另一方面，與「民族」及「辛亥革命」共現的字詞與高辭頻字詞相當類似，呈現一致的趨勢。此外與中共、兩岸、愛國相關的詞彙如中華民族（139 次）、統一（95 次）、共產黨（89 次）、社會主義（87 次）、祖國（60 次）、偉大復興（58 次）出現頻率也相對的高（如圖 13），且自 2001 年後，中華民族及偉大復興兩個單詞出現頻率顯著提升，值得進一步分析。

圖 13：中華民族、統一、社會主義、共產黨、祖國、偉大復興等字辭頻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前所述，停用詞是將頻繁出現且不具分析價值的單詞抽離，以萃取出每個文本的獨有特徵；而在抽離停用詞後，毛、鄧、江、胡、習的講話內容其實都具有特殊論述偏向與時代意義。透由辭頻、共現及 TF-IDF 能夠協助描繪文本的大致輪廓，然如果需要更深入、更精確的分析，仍須回到文本爬梳講話（撰稿）人的論理，以驗證電腦輔助工具統計結果並獲得更細緻的分析。基此，筆者重新檢視文本內容，並分別探討中共領導人「對孫中山之評價及論述」、「對辛亥革命之評價及論述」、「對民族及愛國精神之論述」，以及五代領導人的論述脈絡與時代意義。

二、對孫中山、辛亥革命、民族及愛國精神之評價及論述

除周恩來在 1960 年代的兩次紀念活動及楊尚昆在 1991 年的紀念大會，未提及孫中山是愛國主義者，餘歷次活動中共領導人均將其定義為偉大的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民主革命的先驅，顯見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並強調孫中山殫精竭慮為國奮鬥的高尚品德具有重要啟發性和教育意義。

周恩來亦於兩次講話中提及孫中山在絕望裡（應指 1913 年討袁失利及 1921 年陳炯明叛變等）遇到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並接受共黨思想與幫助，進而促進國共合作及實行聯俄、聯共、扶農三大政策，並重新詮釋三民主義。¹ 此後歷任領導人均持相同論調，強調中共傳承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並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亦重覆灌輸中共是其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且孫中山始終把中共當成親密朋友，藉以強化與共黨之鏈結。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毛澤東、周恩來、胡耀邦均在談話表示中共完成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但「繼承」兩字首次出現是 1986 年彭真於講話中提出「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江澤民亦於紀念孫中山 130 週年誕辰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就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繼承者」，接續的胡錦濤及習近平都使用相同的論述與詞彙至今，期間近三十年未曾改變。

另一方面，中共領導人對辛亥革命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辛亥革命是順應中國人民爭取獨立、振興中華、救國圖存的愛國表現；此外辛亥革命結束延續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是孫中山最具歷史意義的偉大功勳；然除給予讚揚外，自毛澤東起的歷任領導人均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指稱雖其推翻滿清政權，並無一舉掃除帝國主義及舊有封建思想。

如 1922 年《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指出，辛亥革命後帝國主義仍和封建軍閥勾結並壓迫人民，因此中國仍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2）；沿此脈絡下，中共認為唯有完全掃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資本主義後，才算真正完成民主革命。易言之，中共領導人認為辛亥革命為中國開展了民主道路，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民主革命才算完成。

在 12 篇文稿中，中共歷任領導人雖多次使用民族一詞，但並非評述民族思想，而是用於促進團結合作及愛國精神的段落。如胡耀邦在辛亥革命 70 週年紀念大會呼籲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推行全國愛國教育；此後歷任領導人都在談話內容刻意強調愛國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呼籲海內外尊敬孫中山的人民團結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6 年至 2006 年的 9 篇文稿中，中共領導人並未刻意將愛國精神與中共相連結，但自 2011 年起便特別將愛國精神與愛黨思想綑綁在一起，強調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是帶領中國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如習近平於紀念孫中山 150 週年誕辰談話中指出「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弘揚愛國主義就必須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長期堅持，不可動搖」；他同時在紀念辛亥革命 110 週年大會強調：

辛亥革命 110 年來的歷史啟示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堅強力量，這個堅強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

三、中共五代領導人 12 次談話內容的時代意義

接續以五代領導人時序區分 12 次談話內容進行分析，期能萃取出歷次談話獨具的時代意義。首先，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主要論述主軸係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對抗，期盼聯合受壓迫的被殖民國家展開革命與鬥爭；此外亦高度推崇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痛斥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

從歷史觀之，1950 年韓戰爆發，支持北韓的中共與美國為主的聯合國部隊展開激戰，使中、美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逐漸加深；另一方面，中共建國前便與史達林保持良好互動，1949 年後更是獲得大量工業、經濟與武器援助，直至赫魯雪夫接任後，認為蘇聯的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存在許多缺陷，主張「去史達林化」改革，然毛澤東擔憂此會導致中共治理危機，因此對赫魯雪夫修正路線展開批鬥（楊惟任，2013）。

沿此脈絡下，此時期的談話除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高度推崇，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提出強烈批評，後期更稱赫魯雪夫背叛社會主義，強調只有中共的社會主義路線才能將中國帶向國富民強。如周恩來在 1961 年辛亥革命 50 週年指出：

我們必須同偉大的蘇聯，同社會主義陣營各兄弟國家…，緊密地團結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為爭取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鬥！

但在 1966 年孫中山誕辰 100 週年紀念大會卻說：

今天蘇聯領導集團完全背叛了偉大的列寧，背叛了偉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們推行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路線，出賣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在資本主義世界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在社會主義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中共自 1966 至 1976 年歷經 10 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及浩劫，期間中共亦未舉辦紀念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大型活動，直至 1978 年鄧小平成為領導人後才恢復舉辦。此前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1979 年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內容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及 1981 年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表示國家統一後，臺灣可成為特別行政區；因此導致 1981 年的談話「臺灣」一詞出現頻率達 16 次。

此外，彭真亦在致詞時提及國共合作掃蕩軍閥、共同抗日，並呼籲再次合作才對民族及國家有利。由於這段時期中共提出多項與臺灣交流與合作的訴求，因此導致兩次致詞中，臺灣、統一、民族、抗日、合作獲得較高的 TF-IDF 權重值。同時，中國自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便開始實施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因此亦大量使用全國、建設、發展、力量等字詞，如胡耀邦在 1981 年的致詞中表示：

集中主要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是全國各族人民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我們做好第二件第三件大事的根本依靠。

我們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物質技術基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揚我們民族的創造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同時，還要盡量吸收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用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並且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發展同外國的經濟交往和經濟合作。

由前述字詞可知鄧小平主政期間論述主軸係開始關注臺灣統一問題、呼籲國共兩黨合作，以及宣傳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

接續進入江澤民主政時期，其中三次講話內容大抵延續鄧小平的主軸，除強調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持續經濟發展建設外，更多的是關注「臺獨」與「分裂」議題，在三次談話中「分裂」出現 13 次，「臺獨」出現 6 次，此外先前毛、鄧時期的 5 次談話中均未提及「臺獨」，顯見此時臺獨議題成為中共領導人關注的重點。如 1995 年江澤民提出八項推進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主張，惟李登輝隨後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並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主張，引發海峽飛彈危機，接續 1999 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2000 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因此江澤民時期的三次講話均使用相當嚴厲的字詞批評臺獨，惟考量兩岸關係已脫離本研究範疇，故不繼續深入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於 2001 年紀念辛亥革命 90 週年大會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詞，是歷次講話中首次出現，惟此時期亦僅出現一次。他說：

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再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孫中山先生及一切革命先驅們憧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景，必將得到實現！

胡錦濤主政時期的論述主軸係延續江澤民持續改革開放、反對臺獨基調，此外更讚揚中國的經濟表現並鼓勵加速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據統計 2010 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戴東清，2014）；此外內政、國防亦獲得顯著成長，因此在此時期的談話內容中，傑出、進步、發展、實現、偉大復興等單詞使用較頻繁且獲得較高的權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兩次的談話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現 29 次，此外亦常與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團結、鞏固、凝聚等詞共同出現。沿此脈絡下可以得知，胡錦濤希望透由活動時機，呼籲全球華人團結並將孫中山振興中國的期盼，與中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鏈結，達到支持孫中山就要支持中國共產黨、希望中國富強就要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目的。

習近平於 2012 年開始擔任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仔細觀察其與胡錦濤的 4 次講話，可以發現高辭頻單詞幾乎完全相同，在共現詞方面也有相同的趨勢，顯見習近平的兩次講話均未跳出胡錦濤時期的主軸；惟在用詞與論述方面，習近平更強調中共已經完成孫中山先生振興中國的期許，如在 2016 年的講話中便表示：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了一個又一個偉大飛躍，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今天，我們可以告慰孫中山先生的是，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頑強奮鬥下，孫中山先生當年描繪的這個藍圖早已實現，中國人民創造的許多成就遠遠超出了孫中山先生的設想…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建設的獨立、民主、富強的國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 2021 年的講話強調必須掃除中國前進的阻礙，他說：

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抓住歷史機遇，增強憂患意識、始終居安思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鬥志，勇於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以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意志品質，堅決戰勝任何有可能阻礙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重大風險挑戰，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由前述文字可以推斷，此時期習近平開始擔憂外部風險，並呼籲勇於對阻礙中國前進的對象進行鬥爭。此外習近平亦高度使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兩次談話中計出現 28 次，顯見大國敘事和民族復興受到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學者指出這類的論述除政治目的外，亦包含 5 個具有民族主義性質之目的（1）讓大眾相信中國文化始終優於西方文化，從而減少自卑感；（2）煽動反西方情緒，轉移對中國內部問題的注意力；（3）塑造中國崛起形象，讓公眾相信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4）建設統一的國家、中華民族與文化；（5）使習近平的民族復興願景合法化並贏得公眾支持（Lin, 2024）。沿此脈絡下，習近平的論述顯示其欲煽動人民鬥爭意識，以對抗外部勢力、掩飾治理不力並鞏固其執政。

肆、中共論述孫中山、辛亥革命、民族與愛國精神的脈絡與時代意義

本文綜整自 1956 年迄 2021 年中共領導人 12 篇講話（專文）稿，期能爬梳對孫中山歷史定位、辛亥革命價值、民族與愛國精神的立場與論述，研究發現雖然措詞、語氣和論調或有些微差異，但核心思想卻是自毛澤東至習近平均一以貫之；其中最重要且影響最為深遠，應是毛澤東於 1956 年所撰緬懷孫中山 90 週年誕辰專文。

毛澤東在文中以三個紀念讚揚其高揚革命旗幟、推翻滿清、發展新三民主義的貢獻，並盛讚其為改造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完成孫中山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此後，「孫中山推翻帝制具有偉大貢

獻」、「中國共產黨繼承孫中山未竟的志業」以及「孫中山促進國共合作及發展新三民主義」便成為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最重要的核心思想與論據。

此外在 12 篇文稿中，中共歷任領導人論述孫中山、民族及辛亥革命時，顯有特定鋪陳與脈絡。在講話開始時會先論述孫中山、民族及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內容大抵是推崇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貢獻；接續以孫中山在建立共和後仍面對各種險阻，受到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影響與幫助，因此促成國共合作以及聯俄、聯共、扶農三大政策，並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前言最後以辛亥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民主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任務，係由中國共產黨繼承孫中山遺志完成未竟之功。中共近年不斷強化話語權並透由主動解釋歷史的方式，企圖掌控中國近代史的詮釋權，繼承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歷史定位與價值，是欲強化其執政正當性和意識形態正統性（周陽山，2016）。

在講話中段，中共領導人會繼續論述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藉以達到形塑民族認同與人民共同體意識。如周恩來在 1961 年的談話強調：

全國人民的大團結，是我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依靠這個團結，中國人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2021 年習近平亦指出：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弘揚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共同書寫了抵禦外來侵略、推翻反動統治、建設人民國家、推進改革開放的英雄史詩。

此外自胡耀邦在辛亥革命 70 週年紀念大會提出愛國主義後，此後的中共領導人均在談話中刻意強調愛國主義是凝聚全球華人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自 2011 年起更將愛中國與愛中共綑綁為無法分割的共同體。吳瑟致認為當前中共除對內採取整頓肅清外，同時須塑造有利的政治氛圍，鼓動「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不但可以對外宣傳中國人民團結一心的意象，更能舒緩治理不力的壓力（吳瑟致，2022），故每當國際社會譴責中國侵害人權或極

權統治時，中共不但不會退卻，反而會透過操弄民粹的戰狼發言，激化彼此的對立。

談話的後段則以論述兩岸統一及呼籲全球華人大團結作為結尾，如胡錦濤在 2006 年的談話表示：

所有敬仰孫中山的中華兒女，包括大陸同胞、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緊緊抓住時代賦予的機遇，勇敢擔當歷史賦予的責任，共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而努力奮鬥！

由前述內容可以得知中共希冀利用兩岸人民對孫中山的共同景仰，打造一個鏈結彼此的紐帶。中共擴大慶祝辛亥革命百年的政治意圖之一，便是透過訴諸中華民族情感增進兩岸人民的「歷史共識」及「民族認同」，進而達成促進兩岸政治和解、統一的最終目標（蔡國裕，2011）。

伍、結語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係透過電腦輔助語料分析工具，就 1956 年至 2021 年間中共重要領導人在孫中山誕辰及辛亥革命紀念大會的談話文稿進行分析，期能爬梳歷代領導人對孫中山、辛亥革命的評價與論述，及對民族與愛國精神的詮釋與操作，藉以得知中共是否真心沿續孫中山革命及民族思想，抑或透過搶占話語權及詮釋歷史的方式，達成操弄愛國主義及民心之目的。

在研究發現方面，毛澤東撰寫的緬懷孫中山 90 週年誕辰專文有關「孫中山推翻帝制具有偉大貢獻」、「中國共產黨繼承孫中山未竟的志業」及「孫中山促進國共合作及發展新三民主義」，是歷代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核心，且自 1956 年至 2021 年均一以貫之、不曾動搖。此外雖然毛澤東、周恩來、胡耀邦等沒有在談話中提到「繼承」二字，僅表示中國共產黨完成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但中共欲繼承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歷史價

值遺產的想法是非常明確的，而自江澤民於 1996 年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就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繼承者」後，接續的胡錦濤及習近平都使用相同的論述與詞彙，迄今近三十年未曾改變。

接續在民族及愛國精神的詮釋與操作方面，中共領導人在 12 篇文稿中多會闡述孫中山的愛國與民族精神，藉以達到形塑人民共同體意識，同時將民族團結、愛國精神與熱愛共黨相聯結，並在談話最後以呼籲兩岸統一及全球華人大團結為結尾。如胡錦濤在 2011 年的講話中，提到「民族復興」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個詞共 23 次，2021 年習近平在同樣的場合也提到「民族復興」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9 次，且同樣都是引用孫中山的民族精神呼籲中國人民、全球華人共同團結奮鬥。

孫中山所提倡的是強調王道文化的民族主義，希望中國能夠恢復成為第一等強國，擔負更重要的責任，達到世界大同之目的，這是清末時期的知識份子均能認同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原因（傅瑩貞，2018）。反觀中共所提倡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雖然同樣希望中國恢復強國地位，但隱含希望人民愛國更要愛黨，以達鞏固政權之目的，顯非孫中山之初衷與原意。

此外儘管中共近年戮力提倡「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希望召喚海內外華人共同支持祖國以及共黨，但近年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人權指數及國家形象低落，與其聲嘶力竭地「喊口號」，不如真正的深化孫中山所提倡的民族、民生和民權主義，提升中國人民的幸福指數和國際地位，方能贏得全球華人甚至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尊重。

最後，如何將文字探勘及文本分析運用於政治學門仍屬磨合階段，同時隨著科技發展，各種新興研究方法與工具亦日新月異，除庫博外尚有 LDA 主題模型、BERT 文本分群及情感分析等工具。本研究僅以辭頻、共現詞與 TF-IDF 就中共歷任領導人在孫中山誕辰及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中的 12 篇文稿進行分析，如能嘗試透由不同的文字探勘工具與技術，續就歷任中共領導人論述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文稿進行分析，應是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

註釋

- 1、有關中共對於孫中山重新闡述三民主義的論述係源自毛澤東。毛澤東主張《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內容包含聯俄、聯共、扶農三大政策思想，故認為前述內容係孫中山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後對三民主義進行再詮釋；然三民主義是否應區分新舊？是否為孫中山原意？仍未有定論。

參考文獻

- 〈在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周恩來總理的講話〉（1966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報》，2 版。
- 〈在首都各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1981 年 10 月 10 日）。《人民日報》，1 版。
- 〈彭真在首都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大會上講話〉（1986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報》，2 版。
-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确道路〉（2023 年 2 月 14 日）。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站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214/c448544-32623399.html>。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20 日。
- 〈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 年 11 月 11 日）。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站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1111/c64094-28854791.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黨的二次：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2022 年 5 月 27 日）。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站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527/c443712-32431694.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9 日。
- 〈周恩來在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2011 年 9 月 14 日）。取自中國政協網網站 <http://www.cppcc.gov.cn/2011/09/14/ARTI1315964727713274.s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 10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1 年 10 月 9 日）。取自中國政府網網站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1-10/09/content_1964851.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胡錦濤在孫中山誕辰 140 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2006 年 11 月 12 日）。取自中國政府網網站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6-11/12/content_440200.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 11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21 年 10 月 9 日）。取自中國政府網網站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09/content_5641633.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在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國務院公報 2001 年第 31 號，2001 年 10 月 9 日）。取自中國政府網網站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1114.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江澤民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1996 年 11 月 13 日）。取自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站 http://www.gwytb.gov.cn/zt/zylszl/speech/jhzl/201101/t20110123_1725491.htm。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2010 年 1 月 22 日）。取自西藏政務服務網 http://www.xizang.gov.cn/xwzx_406/bmkx/201812/t20181216_16887.html。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26 日。
- 〈首都隆重集會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2010 年 7 月 22 日）。取自陝西省文史資料數據庫網站 https://www.sxlib.org.cn/dfzy/wszl/sxswszlsxg/zl_5157/qt_5170/201701/t20170122_608891.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 〈民族主義〉（無日期）。取自國父紀念館中山學術資料庫網站 <https://sunology.culture.tw/cgi-bin/g32/gswweb.cgi/ccd=.ecbvk/grapheviewer1?dbid=CF7777777779&initpage=141>。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13 日。
- 〈中華民國簡介—國父〉（無日期）。取自中華民國總統府網頁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49>。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27 日。
- 毛磊（2016）。〈孫中山掀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一國兩制研究》，4：163-170。
- 毛澤東（197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朱法源（1993）。〈再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325-356。
- 朴炳光（2013）。〈中國少數民族政策：擺盪於同化和融合之間〉，《全球政治評論》，41：25-44。
- 吳心晒、黃忠偉（2010）。〈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評價差異與民主支持：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政治科學論叢》，86：31-82。

- 吳瑟致（2022）。〈近年中共操作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意涵〉，《展望與探索》，20（4）：109-118。
- 汪宏倫（2014）。〈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19：189-250。
- 沈松橋（200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49-119。
- 那思陸（1994）。〈民族主義與民族關係〉，《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1-12。
- 周陽山（2016）。〈從「二民主義」到三民主義—習近平高規格紀念孫中山誕辰的關鍵意義〉，《展望與探索》，14（12）：21-28。
- 施正鋒（2016）。〈中國的民族主義〉，《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2（2）：47-71。
- 胡婉庭（201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詞的興起與演變—以 1901 至 1935 年為限〉，《東亞觀念史集刊》，2：219-260。
- 孫中山（1919 / 1989）。《國父全集—第 2 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近代中國。
- 戚嘉林（2012）。〈孫中山民族主義 /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海峽評論》，253：26-28。
- 曹清波、吳楚克（2016）。〈比較中俄民族問題的差別及啟發意義〉，《中國邊政》，205：77-90。
- 梁梓然（2023）。〈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新時代與舊傳統〉，《中國大陸研究》，66（3）：39-77。
- 傅文成（2020）。〈以語料庫分析方法檢驗新南向政策的政府與媒體風險建構策略〉，《中華傳播學刊》，37：189-226。
- 傅文成、黃琇戩、顏瑞宏（2021）。〈以資料科學方法輔助民意趨勢分析：戰略及戰爭風險感知的網路民意研究〉，《新聞學研究》，149：1-49。
- 傅瑩貞（2018）。〈從孫中山民族主義論習近平兩岸一家親理念〉，《發展與前瞻學報》，21：85-108。
- 黃信豪（2023）。〈民粹威權主義與習近平的民主話語：文字探勘方法的應用〉，《中國大陸研究》，66（3）：1-45。

- 楊惟任（2013）。〈中共外交戰略之變遷與「十八大」後的走向〉，《展望與探索》，11（8）：73-88。
- 楊開煌（2021）。〈和平促統與實力反獨—習近平辛亥革命紀念會講話之分析〉，《海峽評論》，371：46-50。
- 劉性仁（2009）。〈中國大陸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概念性研究〉，《復興崗學報》，93：133-149。
- 蔡國裕（2011）。〈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與辛亥革命百年—兩岸不同的紀念與慶祝方式〉，《展望與探索》，9（10）：1-8。
- 蕭亞譚（2007）。〈孫文的民族論述分析〉，《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15（1）：121-136。
- 戴東清（2014）。〈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從鄧小平到胡錦濤〉，《國家與社會》，16：83-109。
- 鍾道明（2012）。〈論孫中山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之實踐〉，《孫學研究》，12：91-124。
- 闕河嘉、陳光華（2016）。〈庫博中文獨立語料庫分析工具之開發與應用〉，《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頁 285-31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顏瑞宏（2021）。〈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研究與實踐》，11（1）：141-176。
- Chang, C. (2020, November 8). Four type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China Channel*. Retrieved from <https://chinachannel.larbpublishingworkshop.org/2020/10/02/nationalisms/>.
- Frommholz, I., & Roelleke, T. (2016). Scalable DB+ IR technology: Processing probabilistic datalog with HySpirit. *Datenbank-Spektrum*, 16, 39-48.
- He, B., & Guo, Y. J. (2000).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Farnham: Ashgate Pub Ltd.
- Hussaini, M. (2020).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Technium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Vol. 13, 536.
- Lin, J. C. (2024). The Rising China is Not a 'Sick Man' Anymore: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Xi Jinping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3(145), 83-100, DOI:10.1080/10670564.2023.2214513

- Wang, Z., & Tao, Y. (2021). Many nationalisms, one disaster: Categories, attitudes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6(3), 525-548.
- Wang, Y. (2020). ‘The Backward Will Be Beaten’: Historical Lesson, Security,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9(126), 887-900, DOI:10.1080/10670564.2020.1744387

復興崗學報

民114年6月，126期，41-66

論我國國防大學教育發展過程 與興革方向

陳秉賢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摘 要

本研究探討國防大學的歷史沿革與教育改革，涵蓋三個主要階段：聯參教育時期、三軍大學教育時期與國防大學教育時期。在冷戰背景下，國防大學初期重點是培養三軍聯合作戰的指揮與參謀人才，隨著三軍大學的建立，教育重心轉向戰略教育。國防大學進一步融合了戰略、指參、研究所及大學部的教育，應對現代戰爭的需求。本文引入 Ackerman 的觀點，強調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相結合，強調創新教學法與批判性思維，提升學員適應現代戰爭的能力。最後，建議國防大學應進一步重視緊跟時代潮流，積極掌握新興技術。

關鍵字：軍事教育、國防大學、教育改革

本文改寫自筆者之博士論文「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班 102 年班畢業論文：《中華民國國防大學教育改革（民國 38 年至 102 年：戰略化與學術化的進程）》」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form Directions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R.O.C.

Ping-Hsien Ch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DU), R.O.C., covering three main stages: the Joint Staff College period, the Tri-Service University period, and the NDU period.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NDU focused on training command and staff officers for joint operations among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military. The emphasis shifted toward strategic education as the Tri-Service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NDU further integrated strategic, command and staff,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warfare.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Ackerman's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 highligh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critical thinking to enhance students' adaptability to modern military challenges. Last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NDU emphasize keeping pace with current trends and actively master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Keywords: educational reform, military educati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壹、前言

一國的教育政策不僅塑造了其教育發展的方向，更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為了確保國家社會的持續繁榮，教育政策必須隨著時代變遷不斷進行改革。學校作為教育改革的核心載體，是推動和落實教育計畫的關鍵機構，因此，其各項制度也必須與政策的變革同步調整與適應（余民寧，2012）。隨著全球進入多元文化的 21 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推動各國積極推行教育改革。例如，美國推出了「21 世紀美國教育行動」；日本提出了旨在培養「具生存實力的下一代」的「教育改革計畫」；歐盟鼓勵成員國通過資訊社會中的學習來打造知識型歐洲；新加坡致力於建立「思考型學校，學習型國家」；而中國大陸則推出了「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計畫」，並推動軍事教育的改革（吳金雄，2001）。

在「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的時代，軍事教育正面臨著深刻的變革與挑戰。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與資訊的掌控已成為未來戰場致勝的關鍵要素。人的素質現已成為戰爭中的核心因素，因此，培養、獲取與運用高素質人力已成為國軍建軍備戰中的重大課題（Cohen, 1996）。人力的培養有賴於教育的有效實施，而國防大學作為國軍人才培養的核心機構，特別是在高級指揮、參謀幹部和管理、理工、政戰專業人才的培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瞭解國軍人才培育成效，必須對國防大學進行深入研究。本文將探討國防大學的歷史沿革和教育改革，涵蓋民國 38 年政府遷台後至民國 89 年國防大學成立的三個階段：聯參教育時期、三軍大學教育時期及國防大學教育時期。

另外，對於教育改革，根據 Ackerman（2003）所著的“Taproots for a New Century: Tappi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一文，強調了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之間的長期辯論，並倡導將兩者的最佳元素結合，以創建更全面且有效的教育系統。這一方法與國防大學的教育改革原則高度契合，國防大學需要既結構化又創新的教育方法。透過融合傳統和進步的教育理念，國防大學能夠創造一個強大而動態的學習環境，不僅準備學員應對現代軍事服務的複雜性，還能培養批判性思維、倫理領導力和終身學習能力。

貳、聯參教育時期

民國 38 年政府遷臺，「陸軍大學」隨之在新竹復校。而後，由於接受美國援助，我國軍事教育體制開始仿效美國，於 41 年將「陸軍大學」改制為「國防大學」（英文譯名為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41 年至 48 年）（國防部，1951a，1951b；蔣緯國，1976），而後於 48 年更名為「三軍聯合參謀大學」（英文譯名為 Armed Forces Staff College，48 年至 57 年），之後又於 57 年更名「三軍聯合大學」（英文譯名為 Armed Forces War College，57 年至 58 年）（蔣緯國，1976）。儘管校名更換，然而此時期的教育重點為聯合作戰的指揮參謀作業程序，因此將 41 年至 58 年此一時期歸為「聯參教育時期」。

要研究這段時期的軍事教育，首先必須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歐各國在蘇聯的控制下迅速共產化，這導致了共產主義的蔓延，並使希臘和土耳其局勢惡化，西歐也面臨日益加劇的蘇聯威脅。為了應對這種局勢，美國總統杜魯門（David Truman）依據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報告，採取了圍堵蘇聯的全球戰略，從而形成了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極對抗的國際體系（明居正，1992；胡為真，2001）。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中，亞太地區與歐洲同樣被視為關鍵的戰略據點。臺灣位於亞洲大陸東部，處於西太平洋島鏈的中心位置，北接日本與韓國，南連菲律賓與印尼。基於美國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圍堵政策，臺灣成為美國防止共產勢力進一步擴展至太平洋的重要據點，也是西太平洋防禦島鏈中的關鍵節點，其戰略地位不容忽視（羅際芳、林文清，2011）。

民國 38 年底，大陸淪陷，國民政府遷往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次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中共的參戰不僅使美國圍堵蘇聯的戰略構想受挫，更因中共與蘇聯締結盟約，使美國重新審視其對韓戰的態度，與之前對中國國共內戰的看法產生了差異。美國此前將國共戰爭視為中國的內部問題，但韓戰的爆發使美國認識到，這不再只是韓國或朝鮮的內政問題，而是「共產主義在亞洲發動總攻勢的一部分」（林添貴，2000）。美國意識到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計畫，擔心若任由共產大國在其他國家扶植共產主義勢力並進行武裝干預，將最終危及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與共同利益。基於這一認識，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了中共取代臺灣在聯合國中國席次的提案，並通

過了譴責北韓侵略的決議。美國與其聯合國盟國隨後出兵援助南韓，獲得了國際法的正當性（羅際芳、林文清，2011）。

民國 39 年 6 月 27 日，韓戰爆發後第三天，美國第七艦隊奉命開始協防臺灣。杜魯門總統的這一決策標誌著美國兩岸政策，尤其是對臺政策的重大轉變（胡為真，2001），這一變化打破了「美國普遍認為國民政府難以撐過民國 39 年」的觀點（陳毓鈞，1996）。隨後，民國 40 年 1 月 30 日，美國根據民國 38 年制定的《中美共同互助協定草案》，決定派遣軍事援助顧問團赴台，協助訓練國軍。美國駐華代辦藍欽（Karl Lott Rankin）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了軍援建議，並於 2 月 9 日正式簽署《中美共同互助協定》。同年 5 月 1 日，「駐台軍事援助顧問團」正式成立，由蔡斯少將（Major General William C. Chase）擔任首任團長。顧問團的組織架構、職責任務、聯絡機制及相關細節，經過國防部第二廳與美方多次協商後，最終達成共識（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a，1981b）。

國軍軍事學校於民國 37 年自大陸遷臺者，僅有 18 個校班，且多欠健全，經由美國軍援顧問團協助建立教育制度體系、逐次成立學校、培養師資、編定教材、充實設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b）。因此，在軍事教育部分，協助我國推動軍事教育的革新，也是美國軍援顧問團的重點工作。在軍事學校的校務改革方面，每個軍校都派駐有美軍顧問，協助我國改進軍事教育學制。國軍為了提高幹部素質，培養並提升幹部軍事學術與領導統御能力；增進帶兵、練兵、用兵學能，兼顧國情及配合美軍聯盟作戰需求，接受美軍顧問建議，參考美制，改進學校組織，採用美式教學法與技術，參考美軍作戰準則、教範，使用美軍提供武器裝備、教材、教具，並依照學校性質需要，派遣必要顧問，住校協助示範教學。「駐臺軍事援助顧問團」於民國 49 年 12 月更名為「美駐中華民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其主要任務包括協助中華民國進行軍隊整編與戰備強化，提升戰鬥能力，保衛台海戰略區域的安全，以及執行共同安全計畫中的軍事援助等事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a）。

在退守臺灣的初期階段，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寄望於經過整軍備戰後，能夠具備反攻大陸的軍事能力。因此，當時的軍事戰略以「創造機會反攻大陸」為核心原則，並以攻勢作戰為基本方針。蔣中正總統提出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強調反攻大陸的重要性。國內的各項建設也以支持反攻大陸的軍事需求為優先考量。在具體的軍事戰略上，著

重於建立兩棲登陸作戰能力以及海空軍的攻勢作戰能力（王崑義，2010）。

至於國防大學體制的變更，則必須追溯到滿清末年。當時，我國受到列強欺凌，乃有建立新軍救國之意，於民國前 6 年（光緒 32 年，西元 1906 年）在河北保定創設「陸軍行營軍官學堂」，由留德段祺瑞擔任督辦，延聘日本陸大畢業者主持計畫與授教。民國前一年改稱「陸軍預備大學」，適逢武漢起義，清政府無力照顧，學校於是解散。至民國元年（西元 1912 年）始定名為「陸軍大學」，改督辦為校長制，以胡龍驤為首任校長，並由保定遷校北平，惟仍以日籍教官為主導，學校逐具規模。此時成立「兵學研究會」，以培養留校同學為師資之用（潘光建，1996）。

民國 39 年，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以後，鑒於未來戰爭趨勢將是幾個軍種的聯合作戰，與幾個國家的聯盟作戰型態，必須重新整建武力，以為需要，並於當年 12 月 5 日指示創立陸、海、空軍聯合大學（國防部，1951c），作育三軍聯合作戰的將校。國防部乃於 40 年 3 月 1 日成立籌備委員會進行策劃，當時參謀總長陸軍一級上將周至柔將軍擔任主任委員，副參謀總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為副主任委員，下設行政、計畫、營繕、預財、總務等五組，積極進行準備工作（國防部，1951d，1951e）。至 12 月奉蔣中正總統核定將陸軍大學改為國防大學，並指示三項基本任務：第一、研究國家政策與國家安全之設施；第二、研究現代戰之趨勢及其指導之學術；第三、造就三軍聯合作戰之指參人員。國防部即遵照指示，責成前陸軍大學依照美式教育，研擬組織編制、教育計畫、教材準備，並遴選教官，限於 41 年 3 月籌備完成（國防部，1951f），6 月開學。同時於 4 月撤銷「陸軍大學」，以原有機構改稱「國防大學」，任命陸軍中將侯騰為國防大學校長（國史館，1952），指定臺北市大直臺灣省所建「生產教育實驗所」之新廈為校舍（國防部，1951g），於 5 月 1 日正式成立。由於校舍設施、教官人選、教材資料、教育設備等 10 月才告完成，因此於 10 月 6 日由國防部頒令召集第一期學員，11 月 3 日再改稱校名為「國防大學校」（國防部，1950；張玉法、陳存恭，1991），12 月 1 日正式開學，是中華民國國防大學教育的開始，亦接替原陸軍大學的地位，成為陸、海、空三軍教育之最高學府。原計畫國防大學（校）設國防研究及聯合作戰兩系，當時僅先成立聯合作戰系（國防部，1951h，1951i）。開學時，蔣中正總統親臨主持，並提出軍人五大信念為：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亦即國軍新觀念與新精神之指標（劉俊，1996）。

民國 48 年 9 月 1 日，國防部鑑於國防大學（校）僅召訓聯合作戰系，而非以國家戰略為著眼點，名稱與內容不符，且聯合作戰系的業務僅以聯合參謀作業為主，缺乏用兵之磨練，乃明令改名為「三軍聯合參謀大學」。57 年 9 月 1 日，奉令將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正規班及各軍種指揮參謀大學之研究班合併，而成立「三軍聯合大學」，並於 10 月 1 日起實施，以研究各種戰略及聯合作戰為主修課程（國防部，1959，1968；國防部史政局，1973）。58 年 12 月 1 日原「三軍聯合大學」改名為「戰爭學院」，各軍種指揮參謀大學改名為「陸、海、空軍指揮參謀學院」，四院聯編一校，合稱為「三軍大學」（施治，1996）。

當時政府仍積極欲反攻大陸，因此強調與美軍聯合作戰，以發揮優勢兵力。聯參教育時期強調聯合作戰的課程正好與國防建軍備戰的政策相融合。曾在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正規班第十三期受訓的陳守山上將指出，三軍聯合作戰教育在培育國軍聯合作戰部隊以上階層之指揮官、幕僚主管及參謀人才為著眼，置重點於三軍聯合（聯盟）作戰之指揮與參謀作業，其教育架構分為 3 個階段、16 個課程、10 個研究，使學員對於三軍聯合（聯盟）作戰與整個國防之關係有深刻的認識，並揉合三軍聯合作戰參謀與指揮之精華以及我國國防建軍備戰的政策，設計周延，體系完整。因三軍作戰教育多仿效美軍的制度，若不能與我國防及建軍備戰密切結合，則其教育意義將打折扣（陳守山，2001）。

韓戰的爆發，使臺灣納入美國在亞洲地區抵擋共產主義擴散的防禦體系內，因而讓美軍協防臺灣。尤其是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派駐臺灣，讓臺灣的一切軍制體系開始採取美軍制度，其中包括軍事教育體制。由於當時為建立反攻大陸的軍事能力，以攻勢作戰的「創機反攻大陸」為作戰用兵原則，加上與美國具有同盟關係，因此聯參教育時期的國防大學校（校）、三軍聯合參謀大學、三軍聯合大學均以培植與美軍聯合作戰人才為主之外，亦重視培育我國各軍種之間聯合作戰的重要幹部。

就聯參教育的體制所發揮的功能來看，由於強調聯合作戰的教育目標，在人才的培訓上對增進三軍聯合作戰階層之知識、方法，獲得相當豐富與深入之瞭解與認識，尤其與各軍種方面之聯合作戰計畫作為、技術、程序等，建立了良好之基礎。此外，由於所採用的教材內容、教學方法，均參考美軍，無形中使我國軍官瞭解美軍組織與各種計畫作為，對聯盟作戰之內容與作為，

獲得充分知識。因此，聯參教育時期的體制確實提高國軍將校對於聯合作戰所應具備的知識涵養

不過，由於國防大學（校）僅召訓聯合作戰系，而非以國家戰略為著眼點，名稱與內容不符，且聯合作戰系的課程僅以參謀作業為主，缺乏用兵之磨練，乃明令改名為「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正名的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所教的課程也只注重三軍聯合作戰的參謀作業格式，並未教「將軍之術」，即戰略傳授與磨練，因此更名為「三軍聯合大學」；更名後的「三軍聯合大學」雖納入戰略教育，但仍偏重於聯合作戰的參謀作業格式，為強化戰略研究，因此將三軍聯合大學改制為三軍大學的戰爭學院，另外併入陸海空指參大學為三軍大學的陸海空指參學院，使三軍大學成為融合戰略與戰術兩個階層的教育。

參、三軍大學教育時期

民國 58 年三軍大學成立，將戰略、指參教育連接一貫，開啟我軍事教育新局面。至 89 年改制為國防大學，經歷 31 個年頭，三軍大學一直扮演著國軍戰略、指參教育的龍頭地位，要晉升中高級軍官都要進三軍大學接受洗禮。相較於前一章所述的 3 個時期教育，主要以傳授聯合作戰參謀作業程序為主，所以稱為「聯參教育時期」，而三軍大學以教授戰略、指參教育為主，但在此未取名為「戰略、指參教育時期」，係因提及三軍大學，民間多知道該校為培育中高階軍官的搖籃，因此以「三軍大學教育時期」代替，凸顯三軍大學的校名在軍中與民間的重要地位。

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韓戰促進了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密切關係。然而，民國 50 年 1 月 20 日，民主黨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就任美國總統後，他認為美國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的立場既「不現實也不合理」，並試圖通過與中共接觸來解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然而，由於中共對甘迺迪推行的「兩個中國」政策懷有深深的憂慮與敵意，美國最終選擇繼續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並反對中共加入（陶文釗，1996）。美國的這一接近中共的嘗試，引發了蔣中正總統的警覺，促使他考慮引入第三

方勢力，以減少我國軍事發展對美國的過度依賴，這最終導致了「明德專案」的形成。

「明德專案聯絡人室」，簡稱「明德小組」，是一個隱秘的組織，沒有固定的編制、預算或營舍，成立於民國 52 年 7 月 2 日，並於 64 年 12 月 31 日解散，共運作了 12 年半。這個小組的唯一法律依據來自蔣中正總統的一道手令（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當時，臺灣已有兩個主要的軍事顧問團體：一是規模龐大的「美國軍援顧問團」，另一是隱藏在「實踐學社」名下的日本軍事顧問組。蔣緯國回憶，蔣中正總統清楚認識到，中美兩國的國力差距極大，美軍依賴豐富物資的作戰方式並不適合國軍；同時，由富田亮直領導的日本顧問組雖然致力於提升國軍的指揮與參謀教育，但其知識已經落後，無法滿足快速變化的時代需求。蔣中正總統回想起抗戰初期前的 11 年間（民國 17 年至 27 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在國軍的建設和戰備方面曾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德軍提倡的以少勝多和資源節約的戰略思想，正符合國軍的需求，這促使他重新考慮邀請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國軍（王玉麒，2011）。

民國 61 年明德案結束不久，參謀本部就核准陸軍所提的「進德案」3 年計畫，決定擴大德國顧問的組織與功能，並聘請德國考夫曼備役准將為首席顧問。按照陸軍總部的構想，為能使德國軍事顧問的工作成果落實、生根，把工作放在指參教育和幾個重點兵科上。為了保密與掩護上的理由，雇主則是「中國文化學院」，工作單位是該校的「明德學術小組」（Studiengruppe “Mungteh”），顧問們各自領有一張校長張其昀簽署的「客座教授聘書」，其中在三軍大學陸軍學院擔任顧問的是德國范包寧根（Konrad van Beuningen）備役上校（王玉麒，2011）。

強調三軍一體的國防體制整合，構想源自於蔣緯國將軍。這與現代軍事理論中的「聯合作戰」（Joint Operations）觀點不謀而合（Finlan et al., 2021）。該理論的核心是提升各軍種間的協同作戰能力，以在多元軍種的戰場中達到最高的作戰效能。蔣緯國向蔣中正總統建議，將陸海空 3 個指參大學，全部集中到臺北並正名為學院，授課範圍屬於戰術階層；另外，在 3 個學院之上成立戰爭學院，屬於戰略階層。4 個學院合起來，就是三軍大學。另外還有戰爭學院將官班，則是將官級的進修班。蔣中正總統考慮後，同意這個規劃（汪士淳，1996）。民國 58 年 5 月 19 日，蔣中正總統指示：「各

軍種參大與三軍大學之制度，應從速研究，由三軍大學統轄各軍種參大之擬議，應該整個合併統一之制度，似較合理，無論各軍種參大課程與行政皆歸其統一管理，則海空參大遷至臺北之政策方能符合（國防部，1978）。」

為統一國軍的軍事思想，促進軍種間的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以提升聯合作戰的計畫與指揮能力，並發揮三軍統合戰力，國軍決定精簡行政機構，實施集中管理，節約人力與物力，從而更有效地配置和運用師資與設備，提升教育效果。根據蔣中正總統的指示，制定了〈國軍深造教育體制合併研究草案〉。該草案構想將原三軍聯合大學更名為戰爭學院，將各軍種的指揮參謀大學更名為指參學院，並增設三軍大學校本部，使這四個學院合併為一所學校，命名為「三軍大學」（Armed Forces University），直接隸屬國防部。合併後，教育重點將分為兩個層次：戰爭學院側重戰略研究，各指參學院則以戰術研究為主。因此，新的三軍大學將融合戰略與戰術兩個層次的教育（蔣緯國，1976）。

上述草案，民國 58 年 9 月 6 日，國防部以（58）永俞第 18689 號令將草案呈報，並於 8 月 21 日獲得蔣中正總統以臺統（二）字第 213 號代電核准施行。依據這一核准的政策與構想，國防部制定了〈國軍深造教育體制合併案實施計畫〉和〈三軍大學編組案〉，並於 10 月 11 日正式以（58）純茂字第 1942 號令批准（國防部，1978）。隨後，三軍大學於同年 12 月 1 日正式成立，將各軍種的指揮參謀及戰略幹部教育進行統合，旨在強化平時的相互理解與教學協作，同時在戰時發揮三軍協同作戰的整體戰力，以適應現代戰爭的需求。

早在民國 57 年，三軍聯合參謀大學與各軍種指揮參謀大學研究班便已合併為三軍聯合大學，並將重點放在教授軍事戰略、軍種戰略、野戰戰略及聯合作戰等課程，提供更加全面的戰略教育。三軍大學在改制初期的核心使命包括培養國軍在戰略與戰術層級的指揮參謀幹部，訓練國防業務管理、高級情報及編譯外事人才，並推動國軍戰略與戰術思想及相關準則的發展。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國際與國內形勢及兩岸關係的發展，三軍大學還特別加強了對國家戰略的研究（施治，1996）。

三軍大學轄有 4 個學院，且先後配合國防部之精簡政策曾納編國防管理班、情報研究班與國防語文中心等單位，尤其因應武器科技之發展與戰爭型態之轉變，成立電腦兵棋中心，以充實電腦化教育。除政戰業務與政治教育、

電腦兵棋、行政支援、人事與主計業務、教務策定與管制及圖書、編譯與印刷等，皆集中校部直轄外，各院班均自承擔一教育體系。在整體構想下，分別執行，以收相互配合而達成指參人事需求之目的。政治教育方面，各政治教官組分別支援 4 個學院及各班特需之政治教育。研究發展方面，以任務編組之方式，納編各相關教職官，編成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該委員會除分別設有政策督導委員會、綜合審察委員會、行政支援組與秘書室外，其下有五個研究機構為：政治研究所、學術研究會、兵學研究所、戰史研究所、世界地區研究組。而後因狀況之發展與國防之需要，戰史研究所改編為「國民革命戰史組」，已編撰完成建國、北伐、剿匪、抗日、戡亂等多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兵學研究所亦於民國 72 年納入戰爭學院，遂行教學與研究之任務，該所更於 84 年提升研究領域而更名為「戰略研究所」（施治，1996）。

三軍大學之教育乃根據國防部所頒教育訓令，針對敵情發展與現代戰爭特質，設計戰略、戰術與相關之國防管理課程，務期與進修教育需求密切連接，使其脈絡一貫，體系嚴整，以培養武德與武藝兼修、用兵素質與管理學能並重的現代國軍中、高級指參幹部。為因應現代戰爭特質，教育內容係融合哲學、科學、兵學三者為一體，奉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以武力為中心的思想總體戰的軍事思想為目標。有關戰爭哲學方面，期盼學者堅定思想信念，培養忠貞志節，建立革命人生觀，陶鑄優良將校風範。在戰爭科學方面，令學員研習軍事科技，啟發創造能力，吸取新穎管理觀念，培養現代化科學之能力。關於戰爭藝術方面，使學者磨練思維理則，研究用兵指揮藝術，熟練指（聯）參作業能力，精實克敵致勝學養。三軍大學之教育重點，在陶鑄學員之精神武德，使其堅定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信念，啟發其思維理則，以增進其正確判斷狀況；培養下達健全決心之能力；磨練其表達技術，使具有明確表達其意見與思想之學養，以培養其將校風範，成為國軍中品學兼優之中、高級指參人才（施治，1996）。

自民國 58 年 12 月 1 日起至 89 年 5 月 8 日間，三軍大學扮演國軍軍事戰略指參教育的龍頭角色，其教育體系與專業內容以軍事戰略、作戰思想與指揮參謀作業為主，一般國防管理、科技資訊為輔。另外，政治作戰指參教育歸屬政治作戰體制，情報指參教育則直屬情報次長室，兩者均以研究班型態各自運作；國防管理教育的定位則多次變動，幾度在三軍大學與國防管理學院轉折分合，84 年 7 月 1 日至今則歸屬國防大學管理學院。不過，國防管理

的戰略班、指參班則於 102 年 7 月 1 日分別納編到戰爭學院與陸海空軍指參學院辦理。在上述近 31 年期間，國軍的戰略指參教育所呈現，係以軍事作戰為主導，推動「戰略一元，指參多軸（軍事作戰、政治作戰、情報、國防管理）」的模式，軍事指參則採陸、海、空軍分別實施，聯合指參的教育內涵一直缺乏組織與教育體系的結合。因此，自民國 58 年以來，國軍的軍事戰略指參教育的發展，雖有成果，但各指參體系仍為軍種主導，在現代化聯合作戰的發展與先進國家近年來的作法比較，仍有精進空間（曾章瑞，2006）。

就蔣緯國（1976）在《國軍深造教育之過去現在與前瞻》一書中所論述，三軍大學成立後最大的功能與影響就是建立起我國完整的戰略教育學府。他指出，國軍在大陸時期，缺乏完善之戰略學府，不但黨政幹部沒有修習大戰略與國家戰略之機會，即軍中將校亦無修習完整與徹底之軍事戰略、軍種戰略與野戰戰略的場所。至國軍隨中央政府遷駐臺澎金馬，美國軍援顧問團始來臺開始協助我國軍事教育訓練。從民國 41 年 5 月 1 日創辦「國防大學」至 57 年 8 月 30 日「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結束，共歷經 16 年。此期間始終偏重於戰術磨練與參謀作業程序與格式，尤其著重後者，對戰略之傳授完全中斷。不過以往各國之軍事深造教育，大都不僅有戰略戰術難分之憾，且一般國家對戰略磨練更是不夠完整亦不夠徹底。我國陸、海、空軍將校在大陸時之情況亦不例外。當時我國海、空軍更是缺乏戰略教育之學府。且我三軍高級幹部因頻年戰火，連想在軍官團教育獲得一連串完整戰略磨練之機會都不可得。

儘管我國曾聘各國顧問參與教學，但對所謂「將相之學」的戰略，各國皆認為是國寶，視之為機密，所以無外國政府准其所派之顧問傳授之。因而國軍及黨政之一般幹部缺乏戰略知識與磨練之學府。我國高級幹部如不從自己或別人或史料中研究，則其建國、治國與建軍、用兵知識只能止於戰術而已。換言之，我國軍事教育如僅賴外人傳授，則只能及於團級。我國政府屢欲興建戰略階層之軍種大學，始終因美援政策不支持，而來臺初期我國的經濟力與師資尚不足自力負擔，故遲遲未能實現。蔣中正總統決心自力創辦，下令由各軍種之指參大學兼理，乃於民國 50 年 7 月 1 日在各軍種指揮參謀大學中設「研究班」試辦。原期以補戰略教育之不足，但因教官及教材不足等事實，致其教育數年來雖以大部隊為對象，但仍偏於戰術性之傳授。而石牌實踐學社之高級兵學班亦僅止於大部隊之戰術而已，雖偶似有涉及野戰戰略之意，但總未盡「徹底」而離「完整」更遠。經過兩年之研究與準備，由陸

軍指揮參謀大學於54年5月3日研究班第五期開始試授野戰戰略之基礎磨練。至58年12月1日三軍大學成立後，擁有四個學院，分別傳授完整之戰略與聯戰教育，以及軍種之戰術指參教育（蔣緯國，1976）。

肆、國防大學教育時期

在順應國外軍事事務革命的浪潮下，民國89年國防大學成立，融合戰略、指參、研究所及大學部教育於一體，使國防大學成為符合大學法與軍事教育條例的一所綜合型軍事學校，開創我國軍事教育革新的另一個嶄新的局面。本章採取上一章的模式，取名為「國防大學教育時期」，而不以「戰略、指參、研究所、大學教育」為題，主要是凸顯國防大學為一所綜合型軍事學校。

1991年的波灣戰爭，讓世界首次目睹了一場由資訊、知識與高科技相結合的資訊化戰爭。1993年，美國淨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主任安德魯·馬歇爾（Andrew W. Marshall）在前蘇聯所倡導的「軍事技術革命」（Military Technical Revolution, MTR）基礎上，率先提出了「軍事事務革命」這一概念（Beaumont, 1995），並將其定義為：「科技創新運用所引發的戰爭性質變革，包含了軍事準則與作戰行動概念的劇烈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作戰行為」（Tilford, 1995）。

1991年波灣戰爭之後，美國積極推動「軍事事務革命」與「軍事轉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的概念，並且在隨後的幾場國際局部戰爭中，這些概念在資訊化作戰理論與軍隊建設中的應用成果得到了進一步驗證，從而加速了全球範圍內的軍事變革（彭錦珍，2005）。美軍為因應新世紀新戰爭型態的挑戰，以及面臨裁軍與削減國防預算的兩難困境下，選擇進行「軍事事務革命」，結合電腦資訊、高科技通信基礎，規劃出比任何一個敵人都要看得遠、動得快、打得好的精簡型兵力，以致世界各國競相師法，並蔚為新世紀軍事改革的潮流。

受到美國軍事事務革命以及現代戰爭型態變化的影響，我國在考量國情與軍事防衛需求後，採取了「革新與轉型」的理念，並通過「循序漸進」與「務實興革」的方法，推動國軍的軍事事務革新與轉型計畫。近年來，國軍針對內外環境變遷，配合國家整體戰略的調整，並考量民意需求，積極進行組織

改革，致力於軍事事務的革新與精進，旨在建構一個權責分明、專業分工、高效率的國防體制。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控制預算、精簡兵力」已成為各國建軍的重要方向之一。自民國 86 年起實施的「國軍軍事組織及兵力調整規劃案」（簡稱「精實案」）正式拉開了我國「軍事事務革命」的序幕。自民國 93 年開始的第二階段裁軍計畫（簡稱「精進案」）則配合立法院新通過的國防二法，重點在於組織簡併，旨在達成裁軍目標。至民國 100 年啟動的第三階段裁軍計畫（簡稱「精粹案」），同樣以「精簡高層、充實基層」為主要方向，期望透過這些措施來提升部隊的整體戰力（蔡政廷，2006）。

民國 88 年 6 月，立法院透過軍事教育條例，總統於 88 年 7 月 14 日公佈。在此之前，88 年 2 月，夏瀛洲已受令接任三軍大學校長，並依照當時參謀總長湯耀明一級上將政策指導，負責籌劃成立國防大學，積極展開國軍軍事戰略教育革新大計。國防大學成立專案，初期階段以「整併三軍大學、國防管理學院、中正理工學院及國防醫學院」為目標，將軍事深造教育（包含戰略、及指參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民國 88 年 10 月 1 日，三軍大學成立國防大學籌備專案室，展開為期 6 年 11 月包含「規劃、籌備、轉型及發展」4 個階段目標。由於軍事教育條例第 7 條已明確將深造教育中的軍事戰略指參及一般研究所進修深造教育融為一體，也因此為國軍軍事戰略指參深造教育及學位制度的軍事專業研究等兩種分段模式提供整合契機（曾章瑞，2006）。

民國 88 年 10 月，國防大學啟動了改革計劃，目標是結合時代需求，全面提升教育品質。此次改革設定了四大核心目標。首先，國防大學旨在打造一所基於全民國防理念，專業培養國防人才並研究國防事務的一流軍事高等學府。其次，為滿足國軍建軍備戰的需求，改革強調培養精通戰略指揮與軍事專業的職業軍官和社會領導等高階人才。此外，國防大學還針對國軍軍官養成教育需求，致力於培育具備軍人素質和卓越學識的優秀軍事幹部。最後，為應對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整合的需求，改革計劃提出建立研究國家戰略和重大決策事務的機制，並將國防大學打造成為國防智庫，進一步鞏固國防體系的整體實力（曾章瑞，1999）。

在民國 88 年提出規劃及執行的全程發展策略，係以「一役、二目、三高、四段、五化」為指導，當時的政策意涵為「以畢全功於『一役』為戰略目標，設定『建立一流大學及人力精實』為『雙執行目標』，並採『高起點、高效

能及高水準』為校務推動原則；採取『規劃、籌備、轉型、發展』4個階段推動，並以『專業化、特色化、未來化、資訊化及國際化』為整體發展目標（曾章瑞，1999）。」

國軍為因應時代環境及戰爭型態的改變，積極推動「精實案」，致力於人力精簡與組織再造，於民國 89 年 5 月 8 日由三軍大學整併中正理工學院、國管理學院及國防醫學院等四院校而成為「國防大學」。整併後的組織體系主要分為四院：軍事學院（戰略學部、陸軍學部、海軍學部、空軍學部、國防戰略研究所、國防科學研究所、決策研究所）、中正理工學院、國防管理學院、國防醫學院。同時，整併後的國防大學成為服膺大學法與軍事教育條例的學府，從此扮演國防體系的教育總監的角色外，並成為兼具軍事專業（戰略、指參）教育體制與大學學位教育體制的大學（曾章瑞，2006）。隨著精實案的推動，國防大學於民國 95 年進行了組織調整。調整後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國防大學下設戰爭學院、陸軍指參學院、海軍指參學院、空軍指參學院、理工學院、管理學院及政治作戰學院等重要軍事教育單位。其次，原屬於政治作戰學校的政研班及情報學校的情研班，兩班整合併入各指參學院。最後，國防醫學院因性質特殊，有別於其他軍事教育單位，自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起脫離國防大學，改為獨立學院。

回顧國防大學組織變革，原規劃 6 年 11 個月的專案目標，由於主要人事異動而未能畢竟全功，其未竟之軍事戰略指參教育精進作為，主要包含三項：第一，3 個軍種的指參教育體系整合成為三軍聯合指參學部，建立支持國軍網路化聯合作戰指揮機制所需的聯合作戰教育體系；第二，以軍事學院為主體，建立符合國家教育體系的軍事學門與研究所，將「戰略一元，指參多軸」的體制改為「戰略指參一元」體制，並依大學法，以嚴謹的「學分、學位」制度保障師資及教育品質，並開放文官參與戰略指參教育；第三，依國家教育體制及法規，完善化符合大學法的教育行政機制及作業品質。國防大學於民國 89 年 5 月 8 日掛牌後，軍事戰略指參教育形式上雖已納入國家教育體制，其推動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及「文人武化，武人文化」教育的作法已逐漸成為共識並有實質作為。不過「設立三軍指參聯合教育體系」、「軍文一體施行學制化戰略指參教育」、「戰略研究交流國際化」與「精進大學制教育行政體制」等的時機似乎尚未成熟。

至於國防大學成立後的改革成效而言，目前國防大學的施政績效報告僅至民國 111 年，由於 109 年至 111 年的施政績效評估報告中缺乏具體的達成率分析，因此本研究以《108 年施政績效評估報告》（國防大學，2019）為基礎進行分析。在該報告的關鍵策略目標中，特別是「整合各校區教育資源及裝備妥善，提升整體教學實務」部分，兩項分項績效目標的達成率均為 100%，即「兵力整建計畫」和「三軍聯合作戰訓練」均完全實現。此外，針對關鍵策略目標「前瞻國防科技發展趨勢，支援建軍備戰目標」，績效目標「提升研發能量」也顯示達成率為 100%，表明國防大學在研發及支援國防建設方面具有強勁的發展能力。在「增進交流作為，廣拓交流管道」的關鍵目標下，兩項績效指標「固定邀、來訪」及「國內、外研討會」的達成率同樣為 100%，進一步強調了國防大學在促進國內外學術與軍事交流上的成就。這些績效數據表明，國防大學在提升教育質量、推動國防科技發展及擴大國際影響力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果。透過分析《108 年施政績效評估報告》，可以看出國防大學在各項關鍵策略目標中均展現了卓越的執行力，尤其在資源整合、聯合作戰訓練、研究發展以及國際交流等領域的持續進步。

伍、Ackerman 觀點對國防大學教育改革之啟示

哲學上，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和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在教育領域，傳統主義則強調以教師為核心的教學模式，強化教師的權威與課堂的紀律。傳統主義的教育體系以結構化的學習過程及嚴格的學術標準為基礎，認為知識應透過規範化的教學方法傳授，課程內容則圍繞核心學科與事實性知識展開，旨在維持學術的一致性與穩定性。相較之下，進步主義主張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強調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此一理念重視學習過程中的經驗與社會互動，認為教育應具備靈活性，能根據學生的個別需求與興趣進行調整，進而促進自主學習與探索的動力（Kerlinger, 1958）。

由 Ackerman（2003）所著的“Taproots for a New Century: Tappi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一文，強調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

之間的長期辯論，倡導將兩者的最佳元素結合起來，以創建更全面且有效的教育系統。這一方法與國防大學的教育改革原則高度契合，因為國防大學既需要結構化的教育，也需要創新的方法。**Ackerman** 認為，不應將傳統和進步教育視為互不相容，而是應將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以增強學習體驗。以下是文章中的一些見解，可以應用於國防大學的教育改革：

一、教導深刻的價值觀

傳統教育強調傳授具有深刻價值的知識內容，如經典文學、歷史事件和基礎科學原理，這些構成了學術與文化的核心。同樣，在國防大學的背景下，這一理念可以應用於軍事教育中，將其轉化為包括現代軍事策略和技術的系統化課程設計。這不僅涵蓋了當前軍事科技的最新進展，還包括戰爭的歷史背景，讓學員能從歷史中汲取領導力教訓，理解歷代軍事領袖的決策過程與行為模式。此外，傳統教育中的倫理觀念也能在軍事教育中發揮作用，幫助學員在學習軍事技術的同時，考量戰爭中的倫理問題，培養他們在複雜作戰情境中的道德判斷力。這樣的課程設計不僅注重技能和知識的傳授，更強調對軍事行為背後深層次價值觀的理解與反思，從而使學員能在現代戰場上應對技術挑戰的同時，具備成熟的倫理素養與歷史視角。

二、嚴謹和卓越

Ackerman 強調教學中的嚴謹性和保持高標準的重要性，這一觀點對國防大學尤為關鍵。軍事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學員具備精確性、紀律性和追求卓越的精神，這些都是現代軍事領導者所必須具備的素質。因此，國防大學的課程設計應當具有挑戰性，促使學員進行深入的批判性思考，並在學習過程中積極參與。這不僅要求學員掌握複雜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還應達到高標準的表現和誠信。教學應鼓勵學員在應對艱難情境時展現卓越的解決問題能力，同時保持專業的紀律與責任感。這樣的教育環境不僅促進了學術成就，也培養了學員在實際軍事行動中的領導力和道德判斷力，使他們能夠勝任未來的複雜挑戰。

三、有效利用時間

專注於不浪費時間並選擇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對國防大學的成功至關重要。由於軍事訓練和教育通常在嚴格的時間限制下進行，確保每一刻的學習都能產生最大化的效果至關重要。因此，國防大學應採用多樣化且針對性的教學方法，根據不同的教學目標選擇最適合的方式。講座可以為學員提供系統化的理論基礎，幫助他們建立扎實的知識框架；模擬和實地演習則讓學員能在逼真的戰爭情境中實踐所學，增強他們的應變能力和戰術操作技巧；而案例研究則透過分析真實的軍事行動，幫助學員學習如何將理論應用於實際情境中解決問題。這種靈活的教學策略不僅能夠提升學員的學習效率，還能確保他們能在短時間內掌握關鍵技能，為未來的軍事任務做好充分準備。

四、學科整合

儘管傳統教育強調學科本身的重要性，進步教育則更注重知識的整合與跨學科的應用。對國防大學而言，這種跨學科的教學方式尤為重要，因為現代軍事行動的複雜性要求學員具備多領域的知識與技能。因此，國防大學可以設計跨學科課程，將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工作學、新聞學、資訊管理和運籌管理等多個學科領域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全方位的學習體系。這樣的課程不僅能幫助學員理解現代軍事行動的多層面挑戰，還能提升他們的分析能力、領導力與戰略決策能力。通過融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學員將具備更廣泛的視角，能夠更靈活地應對動態且不可預測的戰場情況。此外，這種跨學科的學習模式還能增強學員的批判性思維和協作能力，使其在面對未來軍事行動中的複雜局勢時，能夠運用多種知識和技能進行綜合判斷與有效行動。

五、全面看待學生

進步教育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將學生視為具有獨特背景、經歷和學習需求的完整個體，這一觀點在國防大學的教育設計中至關重要。根據每位學員的先前經歷、優勢以及需要改進的領域量身定制教育方案，不僅能促

進學員的個人發展，還能顯著提高他們的學習效率和軍事素質。這種個性化教學方法能夠靈活應對不同學員的需求，通過提供針對性的支持和資源，幫助他們在具體技能和領導力上取得突破。此外，針對個別需求進行課程設計，還有助於強化學員的學習動機，促使他們更積極參與學習過程，從而在短時間內實現整體能力的提升。這種因材施教的方式不僅能夠培養出符合現代軍事需求的優秀人才，也為學員的長期軍事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確保他們在面對未來挑戰時具備更加全面的準備和應對能力。

六、靈活的標準

進步教育的核心原則之一是不強求所有學生遵循單一標準，承認並尊重學生在能力、學習速度和興趣上的多樣性。這一原則在國防大學的教育設計中同樣適用，因為學員之間存在不同的學術背景和專業技能。在這樣的情境下，國防大學應該針對那些在某些領域表現優異、但在其他方面需要更多時間和資源的學員，提供額外的支持與替代的學習路徑。這可以包括定制化的輔導計畫、額外的實踐機會或專業技能培訓，以確保每位學員都能在其個人能力範圍內充分發揮潛力。同時，這種差異化的教學方式不僅促進學員的全面發展，還能讓他們更靈活地應對未來軍事行動中的複雜局勢，從而培養出既具有卓越專業技能，又能在面臨挑戰時表現出色的優秀軍事領導者。通過這種方法，國防大學能夠確保每位學員獲得適合他們需求的教育資源，並達到整體教育效果的最佳化。

透過融合傳統和進步的教育理念，國防大學可以創造一個強大而動態的學習環境，既準備學員應對現代軍事服務的複雜性，又培養批判性思維、倫理領導力和終身學習能力。

陸、結論

從聯參教育時期開始，國防大學的設立強調聯合作戰與指揮參謀培訓，與當時冷戰背景下的全球軍事需求相契合。這一時期的教育目標主要是培養

具備聯合作戰能力的軍官，適應美國援助下的作戰需求。其重點在於培養三軍聯合作戰的指揮和參謀人才，使國軍在聯合作戰中具有更強的協調與作戰能力。隨著三軍大學的建立，教育重點逐漸轉向戰略層面的深造，強調戰略與指參教育的融合。這一變革反映出國防大學不僅重視戰術與參謀作業的培訓，還強化了戰略思維的養成，進一步提升了軍事教育的深度與廣度。此時期的改革不僅為國軍中高級軍官提供了進一步的戰略教育，還推動了三軍聯合作戰的深度協同。

到了國防大學教育時期，學校進一步整合戰略、指參、研究所及大學教育，成為符合大學法與軍事教育條例的綜合型軍事學校。這一創新舉措為我國軍事教育開啟了新的篇章。1991年波灣戰爭展示了科技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促使美國推動「軍事事務革命」，並引領全球軍事變革。受其影響，學校採取「革新與轉型」的策略，並進行軍事組織與兵力調整，強化國防體系。此時期的改革在於結合時代需求，推動軍事教育與研究的進步，持續提升我國國防能力。

本文引入 Ackerman 的觀點，強調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的結合可以創建更全面的教育體系，這一觀點對國防大學的教育改革有重要啟示。國防大學的教育應結合傳統教育的紀律性和進步教育的創新性，以結構化課程傳授軍事核心知識，並以創新教學法增強學員在現代戰爭中的應變能力。通過嚴謹的學術標準、靈活的跨學科課程設計以及個性化的支持，國防大學能夠培養出既具有專業技能，又具備批判性思維和靈活應變能力的優秀軍事人才，適應未來戰場的複雜需求。

國防大學的改革展示了軍事教育在全球化和現代戰爭背景下的深刻轉型。隨著全球戰略格局的變化，國防大學每個階段的改革都緊密圍繞國家戰略需求，致力於提升國防體系的教育質量。這些改革從傳統的聯合作戰訓練到現代的戰略思維培養，均旨在應對新型戰爭模式和技術發展帶來的挑戰。這些舉措不僅有效培養了國軍高素質的指揮人才，也對維護國家安全和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威脅做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隨著未來戰爭中技術的飛速發展，國防大學應更加重視新興技術在軍事中的應用，例如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無人機（drone）技術、量子（quantum）技術以及太空戰（space warfare）等領域的

研究。這些技術正在快速改變現代戰爭的形態，為了應對這一趨勢，國防大學需要將這些技術融入其課程設計中，讓學員不僅能掌握其理論基礎，更能在實際操作中應用這些技術。例如，AI 可以用於增強戰場數據分析，無人機則可以大幅提升偵察與攻擊的效率，量子技術則可能徹底改變通訊加密與信息傳輸方式，太空戰則將成為爭奪戰略制高點的重要戰場。因此，國防大學應該持續更新規劃設計各類新興技術在軍事中應用的課程，通過模擬演練、實際操作和案例分析，幫助學員理解和應用這些技術，進一步強化未來作戰的效能。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玉麒（2011）。《明德專案-德國顧問在臺工作史實（1963-1975）》。臺北：河中文化。
- 王崑義（2010）。〈非傳統安全與臺灣軍事戰略的變革〉，《臺灣國際研究季刊》，6（2）：1-43。
- 余民寧（2012）。《教育政策與發展：理論、模式與實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吳金雄（2001）。〈軍事院校實施多元課程學制之研究〉，《國軍九十年軍事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D 組：精進課程研究規劃》（頁 1-40）。臺北：國防部。
- 明居正（1992）。《國際體系的變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林添貴（譯）（2000），陶涵（Jay Taylor）著。《蔣經國傳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施治（1996）。〈國軍深造教育第四時期——三軍大學之成立與教育概況〉，《國防雜誌》，11（11）：28-34。
- 胡為真（2001）。《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轉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國史館（1952）。〈蔣中正指示聘徐永昌為總統府資政侯騰為國防大學校長〉，《籌筆 - 戡亂時期（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400-0019-021）。臺北：國史館。
- 國防大學（2019）。《108 年施政績效評估報告》。桃園：國防大學。
- 國防部（1950）。〈核定該校改稱為國防大學校由〉，《國防部直屬學校印信》。（檔號：39_1735_6015-3_1_31，總檔案號：0051470）。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a）。〈設立國防大學及陸軍參謀大學〉，《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11，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b）。〈國防大學與各軍種指揮參謀學校〉，《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48，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c）。〈三軍聯合大學及陸軍參校之設立〉，《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9，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d）。〈設立國防大學及陸軍參謀大學〉，《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11，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e）。〈為籌辦國防大學請派員協助由〉，《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31，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f）。〈對國防大學籌備之簽擬〉，《國防大學編制案》。（檔號：40_1932.1_6015_1_3，總檔案號：00056528）。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g）。〈一、本部急需籌備成立國防大學所需校舍以臺灣省政府正在圓山建築之生產教育訓練所之房屋為最適宜此房屋已經省府吳主席同意撥交使用但須先徵得安全分署同意同時該校顧問談蒙上校急須進駐該處以便展開籌備工作。二、請惠充同意將該項建築改為軍方使用並請見〉，《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36，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h）。〈為決定國防大學及各軍種指揮參謀學校應設班次與教學範圍請惠示意見由〉，《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45，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1i）。〈為籌設國防大學校之國防研究系請惠示卓見並予協助由〉，《國防部與美顧問團文件副本彙輯》。（檔號：40_062.32_6015_15_85，總檔案號：00003187）。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59）。〈奉核定國防大學及三軍參校更改新名希遵照〉，《空軍指揮參謀學校組織編制案》。（檔號：48_582.4_3010.19_3_2，總檔案號：00028552）。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68）。〈國防部核定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更名為三軍聯合大學自五十七年十月一日起實施希遵照〉，《軍制及裝備》。（檔號：57_1954_3750_2_2，總檔案號：00057303）。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1978）。《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 - 第二次：民國六十年至六十五年》。臺北：國防部。
- 國防部史政局（1973）。《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 - 第一次：沿革及民國五十九年》。臺北：國防部史政局。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明德專案工作紀實（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a）。《美軍在華工作紀實（協防之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b）。《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美國顧問團在臺工作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張玉法、陳存恭（1991）。《劉安祺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陳守山（2001）。《臺灣首位上將總司令 - 陳守山口述歷史（上）》。臺北：國史館。
- 陳毓鈞（1996）。《「一個中國」與臺北—華府—北京》。臺北：環宇出版社。
- 陶文釗（1996）。〈美國、賴伊與中國在聯合國的付表權—寫在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二十五周年之前〉，《美國研究》，4：30-46。
- 曾章瑞（2006）。〈從現代化戰爭探討國軍戰略指參教育作為〉，《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1：267-304。
- 劉俊（1996）。〈國軍深造教育第二時期——國防大學教育之回顧〉，《國防雜誌》，11（11）：16-20。

- 潘光建（1996）。〈國軍深造教育第一時期——陸軍大學之回顧〉，《國防雜誌》，11（11）：9-15。
- 蔡政廷（2006）。〈新世紀國軍政治作戰的轉型與革新〉，《復興崗學報》，88：233-254。
- 蔣緯國（1976）。《國軍深造教育之過去現在與前瞻》。臺北：三軍大學。
- 羅際芳、林文清（2011）。〈美國的中國政策（1949～200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20：48-76。

英文部分

- Ackerman, D. B. (2003). Taproots for a new century: Tappi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 *Phi Delta Kappan*, 84(5), 344-349.
- Beaumont, R. (1995). OMTE: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to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Defense Analysis*, 11(3), 322-325.
- Bell, H. H., & Reigeluth, C. M. (2014). Paradigm change i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3), 52-57.
- Cohen, E. A. (1996). A revolution in warfare. *Foreign Affairs*, 75(2), 37-54.
- Finlan, A., Danielsson, A., & Lundqvist, S. (2021). Critically engaging the concept of joint operations: Origins, reflexivity and the case of Sweden. *Defence Studies*, 21(3), 356-374.
- Kerlinger, F. N. (1958). Progressivism and traditionalism: Basic factors of educational attitud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8(1), 111-135.
- Sookermany, A. M. (2011). Learning in doing - Skills acquisition in [post-] modernised military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Defence Studies*, 11(4), 615-635.
- Tilford, E. H. (1995).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Prospects and caution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當代孫學研究主題大數據分析： 以《孫學研究》期刊為例^{*}

蘇義倫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博士

羅駿慈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博士

摘 要

本研究運用 TF-IDF 與 LDA 模型分析《孫學研究》213 篇期刊文章之篇名關鍵字與摘要，揭示其研究主題與趨勢演化。結果顯示內容可歸納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與思想史哲學四大類。透過數據可視化輔助分析，展示關鍵字變化與主題分佈，驗證數位文本分析在孫文思想研究中的應用潛力並提供研究框架以供後續參考。

關鍵詞：中山思想、文字探勘、主題分析、孫學研究

^{*}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與編輯委員會的修正意見，使本文內容更臻完善，同時感謝王信力老師在本文初始數據分析部分所提供的指導。本文第一作者為蘇義倫，通訊作者為羅駿慈。

Big Data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Themes on Sunology: A Case of Sunology Research

Yi-Lun Su

Doctoral,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Chun-Tzu Lo

Doctoral,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F-IDF and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models to analyze the titles, keywords, and abstracts of 213 journal articles from Sunology Research, aiming to uncover the thematic struc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trend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ontent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major themes: nationalism, democracy,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philosophy. Through the aid of data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keyword shifts and topic distributions are presented, validating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text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Sun Yat-sen's thought, and offering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Sunology Research, Dr. Sun Yat-sen's Thought, Thematic Analysis, Text Mining

壹、前言

孫中山（1866-1925 年），原名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人，因在日本推廣革命時以「中山樵」為筆名，後世尊稱為中山先生。他的一生致力於民主革命與國家建設，其思想深深植根於實踐與理想的結合。1917 年他完成了《民權初步》的譯作，並於護法運動中強調憲政的重要性；嗣 1919 年，發表《孫文學說》與《實業計畫》，並合編為《建國方略》，為中華民國的建設藍圖奠定基礎。隨後 1923 年中國國民黨改進黨宣言進一步闡釋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主張以民主制度為治國之本，以實現國家的富強與人民的幸福（中華民國總統府，2024 年 6 月 23 日）。進而從《國父全集》內文自序中，敘明孫中山其三十餘年的革命生涯，展現出他為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所秉持的堅韌信念。

然而，國父面對清廷的強權與困苦的環境，始終不屈不撓，以堅定的理想與實踐精神，鼓舞風潮，推動時勢，最終完成推翻專制、創建共和的偉業（中央社，2016）。他提出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不僅是當時民主制度的核心構想，也為中華民國的長遠發展奠定了方向。他認為，順勢推行這些建設，必能促進國家富強，人民安樂，充分體現了其內心深處的理想主義與實踐精神。換言之在現代語境下，孫中山的思想依然具有啟發性，無論面對任何困境，他的堅韌精神提醒國人信念與毅力的重要性；更強調群眾力量唯有團結與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真正的改革與進步（廖和永，1994，頁 37-60）。基此；孫中山的理念不僅是歷史的瑰寶，也是後代應對當代挑戰的重要參考。

毋庸置疑，孫學作為孫中山全部學術思想的總稱，體現了其在中國民族解放與國家建設中的核心地位。在北伐之前，孫中山的思想通常被稱為「孫文主義」，如戴季陶在其著作《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所探討的，或「孫中山主義」等稱謂。在孫中山逝世後，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接受其遺教，並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其思想體系亦正式定名為「國父思想」。該思想以三民主義為核心，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系統構建了關於民族自主、民主政治與社會公平的理論框架（趙立彬，2022，頁 105-136；孫中山，1919）。當代學術研究中，孫學不僅是一套整體性的國家發展理論（廖舜右，2013，頁 239），更

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特別是在兩岸關係與歷史脈絡中的獨特意涵。在臺灣學界，孫學研究因其歷史、政治與經濟層面的特殊相關性，占據了顯著的地位。臺灣學者憑藉其語言優勢與西方學術訓練背景，形成了知識生產與學術影響的核心力量。同時，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軍事、經濟及社會變遷，孫學在兩岸學術中的重要性更顯突出。整體來說，深入探討孫學及其相關研究，不僅有助於理解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亦能深化相關理論與實踐，為兩岸中華文化的學術交流提供寶貴資源。正如前總統蔣中正所言：「繼承國父革命遺志，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隨之相承」，孫學研究不僅在學術層面具有高度價值，也在文化與政治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王昇，1997，頁 12）。

此外審視國內研究機關層面而言，國父紀念館所出版的《孫學研究》期刊被廣泛視為臺灣地區「孫文研究」的學術代表，主要原因在於其兼具官方性與專業性的特質，專注於孫中山思想的多元面向研究，並得到學術界的積極參與。更重要的，該期刊在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憑藉長期穩定的出版傳統與卓越的學術定位，成為孫文研究的重要標竿。整體而言，《孫學研究》以其官方權威性、學術專業性、國際影響力及穩定發展，充分體現了臺灣地區在孫文研究領域的學術實力與特色，堪稱該領域的代表性平台。

綜合上述，本研究旨在探討「孫學研究」的主題演變及其發展趨勢，並藉助文字探勘方法提升分析效率，減少人工處理的繁瑣工作。具體而言，本研究以國父紀念館中山學術資料庫中歷年「孫學期刊」之文獻為研究核心，運用數位探勘工具對相關語料進行分析與組織，進一步提供結構化的資訊，作為後續學術研究之參考。研究問題包括：

- 一、系統分析臺灣學術界對「孫學研究」的主題變遷與發展趨勢，揭示其歷史演進與當代關注焦點。
- 二、提取研究語料中的主題關鍵字、作者資訊及摘要內容，為研究者提供便於檢索的知識資源，並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價值參考與改進依據。
- 三、通過對特定語料的文字探勘與自動化知識組織，從數據驅動的角度深入解析「孫學期刊」，拓展對該領域的研究視野與方法論探索。

貳、文獻探討

自西元 1990 年代起，臺灣社會科學學界中各種方法論與研究途徑之盛起，在爬梳國內外學術界共同關注課題下，不再局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傳統學術框架，漸而探討「草根」性歷史色彩及社會問題，尤更需加強與國際學界交流互動，開展「孫學研究之再研究」，諸多學者亦稱為「學科典範變遷」或「知識社群研究」（黃克武，2006，頁 10-17）。然而期刊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載體，承載著不同領域內學術成果的發佈與傳播功能。在社會科學領域，期刊不僅記錄研究的歷史脈絡，還反映出學科發展的動態與趨勢。（方瑀紳、李隆盛，2014，頁 121-132）。隨著數位技術的進步，文本挖掘（Text Mining）逐漸成為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文本挖掘技術通過對大量非結構化數據進行處理，能夠提取隱藏的模式與關鍵資訊（Feldman & Sanger, 2007, pp. 21-35）。審視近些年來，Python 等編程工具與相關的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被廣泛應用於文獻分析，這些技術可以快速處理篇名、摘要及關鍵字等文本內容，識別主題分布並揭示知識演化（Pereira, Basilio & Santos, 2023, pp. 16-25）。因此；對於《孫學研究》這類聚焦於特定主題的期刊，文本挖掘不僅能梳理多年的研究主題演變，還能夠為學術研究提供系統化與可視化的資料基礎。

有鑑於文字探勘與分析方法在其他學科領域中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數位人文學科（Digital Humanities）相關研究亦蓬勃發展，成果豐碩，數量眾多（項潔、翁稷安，2011），相較而言，美國已經有相關領域的學術期刊專門討論其發展演變及應用研究的範疇。許多學者的首要研究議題集中於探討該技術能否有效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並進一步拓展至認識論的範疇（Schreibman & Siemens, 2004）。進一步而言，根據美國學者 Grimmer & Stewart 所提出的「Text as Data」觀點，兩位學者將政治相關文本視為可被分析的資料，並運用各種文字處理與統計分析方法對文本進行分類與歸納，這些技術通常被稱為文字探勘技術。透過這些方法，他們能對大規模文本數據進行自動化的信息組織與主題分析，從而揭示出相關聯性及先前未被關注的有用資訊（Grimmer & Stewart, 2013）。

那麼在現代網路科技、數位經濟的蓬勃發展下，面對大數據時代，以大量數據的擷取，並藉助人工智慧分析蕪蔓龐雜的數據，擷取有用的知識與智慧，扮演各個領域的創新價值與模式的關鍵技術（張益誠、張育傑、余泰毅，2021，頁 87），文字探勘技術雖最初應用於圖書分類，隨後逐步發展至非結構化文本資訊的萃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在此發展過程中，該技術融合了來自資料庫檢索、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計算語言學及圖書資訊學等多個領域的知識與方法，形成了跨學科的研究框架與應用模式（**Miner, 2012, pp. 32-36**），如上所述，非結構化文本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自然語言文本，這些文本尚未經過專門的分類或人工關聯處理，呈現為未經結構化的自由文字形式（陳文華、徐聖訓，2003，頁 37-58）。

誠然大數據技術已經改變了學術研究的方式，特別是在跨領域與大規模資料處理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研究主題的大數據分析主要包括主題建模（如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關鍵字分析、作者合作網絡等方法，這些工具能夠揭示學科內部的主題結構與研究趨勢（**Amado & Moro, 2018**）。在孫學研究領域，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探索研究者對孫中山思想的多角度解讀，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等核心議題。此外，主題分析的結果還可用來識別隱藏的研究熱點，為未來研究提供方向。

再者，就文字探勘層面而言，大多開源碼語言工具（例如 **R/Weka**、**OpenNLP**、**LingPipe**、**FreeLing**），例如 **Corpro** 中文語料庫及 **Python** 語言工具，臺灣社會學科近年使用快速的大數據分析工具，其處理網路巨量資料上極具優越性。因此，若可藉強大網頁擷取與數據能力分析，並結合文字探勘的功能模組，透過文字截取及資料視覺化方式呈現，將能夠使網路上的資料，更有系統化的整理出來，進而使得研究者在蒐集資訊時能更加清楚明瞭（李書政、楊凱文、蘇培元，2024）。進一步而言，大數據文字探勘技術的主要流程包括資料檢索與處理、詞彙斷詞（**word segmentation**）、特徵萃取（**feature extraction**）、分類與聚類（**clustering**）、以及文本表示與詮釋等關鍵步驟（曾元顯，2002，頁 62-83）。因此，文字探勘技術可以說是以資料探勘的方式來進行文件的文字資料分析，自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的文字中，透過分析來取得文字間的關聯性，發掘出之前未發現或隱含於文件中有用的資訊（潘彩君，2018，頁 7-8）。

更精確地說，本文利用 Python 程式語言，其具備物件導向特性及直譯式計算方式，這些特性提供了一組功能全面的標準庫，能夠高效地執行各類數據分析任務。此外，Python 也廣泛應用於系統管理和網路程式設計，適合處理各種複雜的高階任務。（林柏宇、謝邦昌、廖佩珊，2016，頁 48）。相較之下，庫博（Corpro）中文語料庫是一款專為中文語境設計的語料庫語言學基礎上的計算輔助文本分析軟體工具。它能夠處理大量文本資料，進行詞頻統計分析、關鍵詞脈絡索引，並探索詞彙之間的共現關係及其他文本內容的比較，以識別顯著常用詞彙和低頻詞彙等特徵（闕河嘉，2018）。

歸結上述，孫學研究作為一個聚焦於孫中山思想及其影響的領域，隨著兩岸關係的變遷及時代需求的不同而不斷發展。然而，目前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多以歷史與政治分析為主，缺乏數據驅動的研究框架。特別是在國內研究者具有語言與文化的優勢，但其對於研究趨勢的系統分析仍有需求之處。因此；運用大數據與文本挖掘技術的研究雖然在其他學科已見成效，但在孫學研究中的應用仍屬研究階段。因此，開展基於大數據分析的孫學研究主題挖掘，不僅是對當前研究方法的補充，也有助於推動整個學科的現代化與數據化發展。整體來說期刊作為知識載體，記錄了孫學研究的主題演變，為學者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基礎。本研究透過文本挖掘與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可更加精確地梳理孫學研究的主題結構與發展趨勢，進而揭示其學術價值與未來方向。這些方法不僅能填補研究方法的不足，也為孫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框架與實證依據。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首先在資料分析前，本文整理自國立國父紀念館 2006-2023 年之《孫學研究》刊載 213 篇期刊中，自主題、關鍵字及摘要內容分析下，有關所刊登之期刊內容研究概分為五種研究方法，如表 1 所示：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比較研究法、跨學科研究法及實證研究法等，其分析說明如下：

- （一）文獻研究法（**Document Analysis**）：通過閱讀孫中山的著作、演講、信件等原始文獻，可以直接接觸到孫中山的原始思想和理念。廣泛閱讀關於孫中山的評論、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以獲得不同學者對其思想的解讀和評價，如 2015 年第 18 期陳世岳的〈孫中山思想與兩岸憲法〉及 2015 年第 19 期趙勳達的〈逝世前的呼籲：孫中山赴日演說的用意與日方的對應（1924）〉等期刊。
- （二）歷史分析法（**Historical analysis**）：對其時代背景的深入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這包括清末民初的政治局勢、社會狀況、經濟發展以及中華民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等。如 2007 年第 3 期尚明軒的〈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來孫中山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便於理解孫中山思想形成的背景、動因和發展過程。
- （三）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將孫中山的思想與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進行比較，以揭示孫文學說的獨特性和創新之處。如 2015 年第 18 期林志龍的〈民生主義經濟發展在近代社經思潮的綜合性：比較觀點〉及 2019 年第 27 期，龐建國的〈孫中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期刊。
- （四）跨學科研究法（**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孫中山的思想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如 2008 年第 4 期翁嘉禧的〈從互賴觀點評析全球化下的兩岸經濟交流模式〉，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評價孫文學說。
- （五）實證研究法（**Empirical Research**）：通過蒐集和分析孫中山思想在實踐中的應用和效果，如 2019 年第 26 期邱啟瑗、游正鈿的〈從孫中山王道思想論：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驗證孫文學說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歸結上述研究法，筆者蒐整國立國父紀念館《孫學研究》期刊及「知識社群」，卓有見地。基此，本研究皆奠基於學習歷程經驗累積與論文閱讀微觀視野，藉以博學審問研究淺薄之經驗，形塑如表 1 學科期刊研究途徑之框架。

項次	研究途徑	資料來源分類	主題環境變遷因素
一	文獻研究法	原始文獻 次級文獻 解釋性和評論性文獻 相關歷史文獻	政治環境的變化 學術視野的擴展 資訊科技的發展 社會需求的變化
二	歷史分析法	孫中山著作和演講 同時代人的記載和評論 官方檔案和文獻 歷史學家和學者的研究著作 媒體報導和大眾評論	學術環境的變化 研究範疇的擴展 科技進步與資料獲取 社會需求的轉變
三	比較研究法	孫中山著作和演講 近代政治家的著作 學術著作和研究報告 專題研究和會議論文 研究者國際視角評論和分析 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學資料	學術環境的轉變 研究者視角的拓展 跨學科方法的融合
四	跨學科研究法	孫中山原始文獻 歷史文獻與檔案 政治學與社會學資料 經濟學文獻 文化研究與哲學文獻 現代媒體與網絡資源	時代背景的變化 學術研究範式的轉變 學科界限的詼諧模糊 新技術的應用
五	實證研究法	孫中山的文獻資料 官方、非官方歷史檔案 近代報刊雜誌 訪談、回憶記錄 學術研究與著作 相關的統計數據	研究範疇的擴展 研究視角的多元化 研究方法的創新 學術環境的變化 研究主題的深化

表 1：國立國父紀念館 2006~2023 年《孫學研究》期刊主要研究途徑一覽表

資料來源：取自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學術資料庫 <https://sunology.yatsen.gov.tw/search/journalpaper/>，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利用庫博中文語料庫的詞彙編輯、詞頻分析、關鍵詞脈絡索引及詞彙搭配關係等功能（闕河嘉、陳光華，2006），將其應用於《孫文學說》的分析，進而開展內容語料庫的探索性研究。因此，本文針對國立國父紀念館在 2006 至 2023 年間發表的《孫學研究》期刊，通過分析期刊的篇名、關鍵字及摘要，旨在識別顯著的研究主題及其關鍵字，並觀察這些主題的發展趨勢。

一、庫博（Corpro）中文語料庫

政治學科學者在進行研究分析時，利用文本資料的範圍非常廣泛。隨著大量數位文本資料的出現，使用軟體進行文本分析已成為一個成熟的發展趨勢。這種方法與傳統質性研究文本分析軟體不同，後者通常需要經過編碼過程以組織資料（闕河嘉、陳光華，2016），「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是一款基於「語料庫語言學」的計算輔助文本分析軟體。該工具通過計算機運算來分析大量文本資料，具備以下技術功能：（1）詞彙編輯（包括自建詞頻和同類詞編輯）；（2）詞頻分析（涵蓋詞彙頻次和文件詞頻）；（3）關鍵詞脈絡索引；（4）詞彙搭配關係分析（傅文成，2020）。「庫博語料庫分析工具」的優勢在於突破了傳統質性研究中僅依賴人工編碼過程來組織資料的局限。該軟體能夠自動處理中文斷詞後進行分析，並設計有編輯停用詞、辭典以及同類詞清單的功能，以支持多層次的累計分析，從而有利於研究者進行華語語料的功能性分析（祝平次，2017）。其次，庫博語料庫分析工具是一套專為中文語境設計的計算機分析軟體，適合用於文本數據的深入分析（傅文成，2020，頁 189-226），通過對不同文本語料庫的比較，能夠突顯文本中的顯著詞彙。這些輔助工具將有助於政治學者克服傳統研究方法在處理大量文本資料分析方面的局限性，並適合本研究對「孫學研究」主題趨勢進行深入探索的需求。

二、Python 程式語言

Python 具有其豐富的程式庫且具備多種語言且可擴充性模組，亦是一個物件導向、直譯式的電腦程式語言（楊仁和譯，2015，頁 3-15），其流行度

近年來持續上升，成為較受歡迎的編程語言之一。而它在學術和工業界的應用越來越廣泛，特別是在快速增長的人工智能領域（陳冠榮，2024），其次，文字探勘是資料探勘中的一環，但文字探勘有別於傳統資料探勘在於它處理的資料都是沒有特殊結構文字，因此無法直接使用資料探勘的演算進行分析。文字不像數值具有統一的單位，因此必須將文字進行量化，並從量化後的文字找出字詞之間的關聯性，藉此從多量文本挖掘隱含資訊，即是文字探勘技術所望達成目標（謝元晟、程美華、張光昭，2016，頁 112-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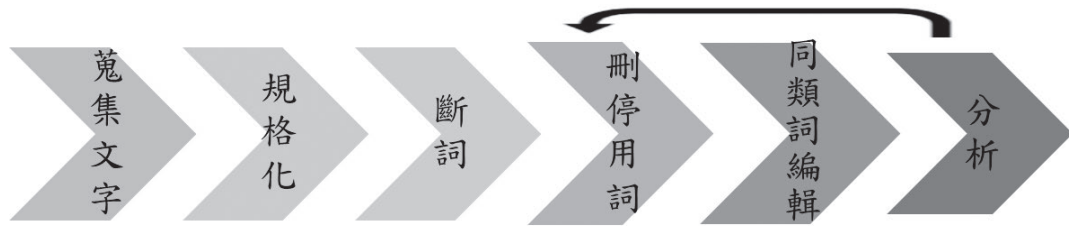
然而，Python 是一種高階的程式語言，它具有簡潔且易於理解的語法，及豐富的函式庫和工具生態系統，使得開發人員可以輕鬆地進行各種任務，例如數據分析、機器學習、網路開發和自動化等。另外，它也常被廣泛運用於人工智慧領域，如自然語言處理和計算機視覺（石泓昇，2023，頁 2）。Python 是個「優美、簡潔、簡單」的語言，現今主要的作業系統都支援其系統，使得應用層面更加廣闊。而在大數據的領域支援的相當廣泛，如雲端基礎設施、DevOps、網路爬蟲、在資料處理上更支援多種格式，成為大多研究學者廣泛運用（張哲章，2018，頁 9）。基於此，本研究依據文本分群結果，選擇四個主題數，並透過分析關鍵字出現頻率及其與語言結構、組合規律和概念的關聯，來詮釋每個主題所突顯的焦點與框架。因此，本研究所收集的 213 篇文本經過 LDA 模型進行分群，研究者根據關鍵字進行整理，最終確定並構建出四個主要研究主題。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應該如何應用論述與文字探勘技術、以及本研究的流程（如圖 1）簡要說明。首先自國立國父紀念館《孫學研究》期刊資料下載後，讓格式資料統一規格化俾利後續斷詞分析。其次將所蒐整國父紀念館《孫學研究》期刊文字檔，置於網頁文字雲生成器（HTML5 Word Cloud）¹ 分別進行斷詞，且將斷詞結果依序列在 Excel 檔案有利後續進行「半自動主題式詞庫彙取演算法」² 判別。而本研究以「主題、關鍵字及摘要」為核心加以萃取，透過詞彙萃取技術，將在《孫學研究》期刊數位資料中，有關的關鍵字加以分析。此外，共現字（Co-occurrence word，簡稱 Co-word）指的是當兩篇文章中使用相同的詞彙時，這些詞彙即形成共現字關聯。若兩篇文章中出現的共現字

越多，則表示它們之間的共現字關係越強，討論相同主題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邵軒磊、曾元顯，2018）。

圖 1：文字探勘研究程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如前所述，本研究採用程式語言相關科技進行輔助，旨在幫助研究者探索各種研究主題及其脈絡。通過將資料規範化為可分析的關鍵詞，以確保分析資料的質量與後續分析結果的準確性（王界人、沈民新，2015）。具體的研究方向有兩個。首先，探索是否可以應用「共現字分析」（Co-word Analysis）技術。此技術的基本概念簡單直觀，主要通過計算不同文件中相同詞彙的共現來衡量任意兩個文件的相似度，從而將相似的文件進行歸類（Clustering）。該方法在科學計量學（Scientometrics）、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及文字探勘（Text Mining）等領域均有相關應用。其次，若上述分析產生合理結果，則進一步探討近年來《孫學研究》的主要關鍵字與主題，並對其進行解讀。通過使用橫條圖、折線圖等可視化圖表展示資料，可以使分析結果更加直觀易懂，提高理解能力與溝通效率，幫助研究者在複雜信息中節省時間，進而推動更深入的研究。

肆、資料分析

一、主題篇名「詞頻列表」分析

經由庫博中文語料分析《孫學研究》刊載 213 篇期刊主題「詞頻列表」資料，頻率較高詞彙，計「思想」（43）、「臺灣」（25）、「發展」（22）、「研究」（20）、「孫中山思想」（17）、「兩岸」（13）、「觀點」（12）、「中山先生」（11）、「主張」（11）、「實踐」（11）、「比較」（11）、「文化」（10）、「中國大陸」（9）、「分析」（9）、「啟示」（9）、「大亞洲主義」（9）、「中山」（8）、「憲政」（8）、「民主」（8）等部份，結果呈現前 4 個以「思想」、「臺灣」、「發展」及「研究」等頻次較高，第 5 至 16 個則為「孫中山思想」、「兩岸」、「觀點」、「中山先生」及「主張」等詞彙。基此，從表 2 中便可勾勒《孫學研究》刊載 213 篇期刊主題中，主要以思想、臺灣、發展等題詞為主要標意識，接續則以「孫中山思想」、「兩岸」、「觀點」及「實踐」等主題，以履行國父孫中山偉大人格及革命行誼並發揚其思想學說。解析中山精神與傳統文化互相結合，以窺探中山精神與傳統文化真諦，達成中華文化的再出發、再發揚（國立國父紀念館，2024）。

表 2：《孫學研究》刊載 213 篇期刊主題詞頻統計表

次序	詞彙	頻次	次序	詞彙	頻次
1	思想	43	10	實踐	11
2	臺灣	25	11	比較	11
3	發展	22	12	文化	10
4	研究	20	13	中國大陸	9
5	孫中山思想	17	14	分析	9
6	兩岸	13	15	啟示	9
7	觀點	12	16	大亞洲主義	9

次序	詞彙	頻次	次序	詞彙	頻次
8	中山先生	11	17	憲政	8
9	主張	11	18	民主	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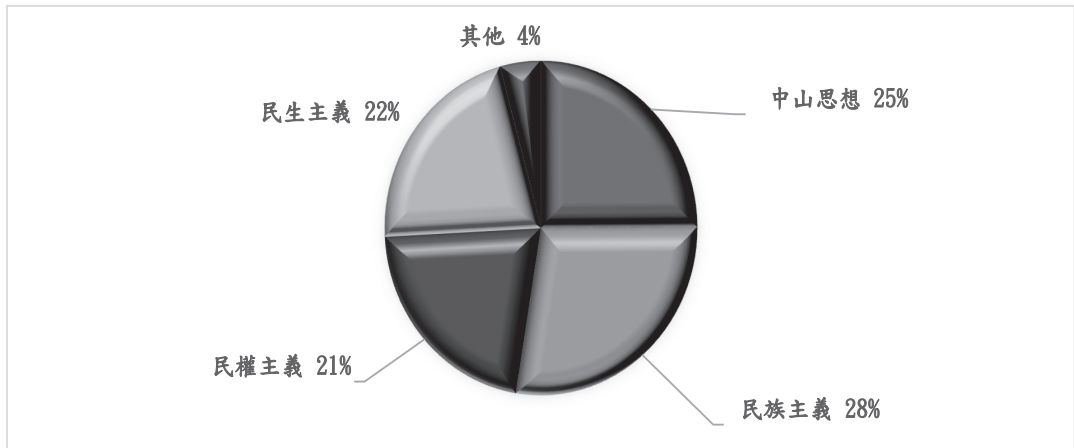
二、「主題篇名」內容類別分析

其次，針就期刊主題內容，經由本研究檢視 2006-2023 年刊登 213 篇期刊，經審視從各項篇名主題內容，區分中山思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及其他等五大類（如圖 2）。其中 213 篇主題比重依序以民族主義 59 篇（28%）、中山思想 53 篇（25%）、民生主義 47 篇（22%）、民權主義 46 篇（21%）及其他 8 篇（4%）。其分析說明如下：

- （一）民族主義占比最高：以 59 篇文獻，占總數的 28%，顯示在這個樣本集中，《孫學研究》期刊在民族主義思想是被討論得最多的主題。反映出國內外研究學者對於民族認同和民族國家建設有著高度關注。
- （二）中山思想次之：占 25%，約 53 篇文獻。同理，中山思想是指孫中山的政治哲學，強調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大原則，是中國現代歷史上重要的思潮。這表明孫中山思想仍對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有著相當的影響力。
- （三）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接近：分別占 22%（47 篇）和 21%（46 篇），這兩種主義的文獻數量接近，顯示在研究中的關注度相當，也反映出在關注民族建設的同時，民生的改善和民權的保障也是重要的討論主題。
- （四）其他類別相對較少：僅占 4%，約 8 篇文獻。這顯示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幾個主要主題上，其他思想或主義相對較少被探討。

綜上，2006-2023 年 213 篇期刊主題數據，反映了在「孫學研究」領域或特定文獻集中，民族主義和中山思想是主要的研究主題，而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關注。這可能表明研究者對於國家建設、社會公正和民生改善等議題有著廣泛的興趣。

圖 2：2006-2023 年《孫學研究》期刊主題比重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三、「歷年主題篇名趨勢」分析

再者，本研究更進一步剖析國父紀念館《孫學研究》期刊歷年主題趨勢走向發現（如圖 3），從「歷年主題篇名趨勢」逐年的數據中，本研究可以觀察到各主題在 2006 年到 2023 年間的研究或討論趨勢。基於此，為了更加探討這些趨勢走向，其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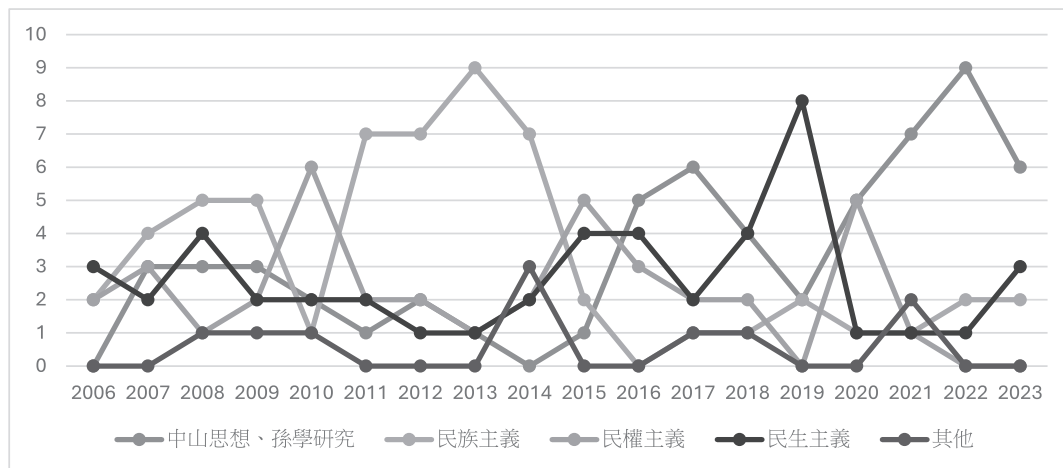
- （一）中山思想、孫學研究：從圖 3 顯示 2007 年開始有了研究數量，並從 2015 年開始，顯示出顯著成長，特別是從 2015 年到 2021 年，從 5 篇增加到 7 篇，之後在 2022 年達到高峰（9 篇），2023 年略有下降（6 篇），就本研究理解而言，2021 年 10 月 10 日國慶就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紀念日，對於國家都具有紀念的意義，因此，研究者對於辛亥革命初心及價值使命，展望中山思想經驗為投書主要趨勢（劉性仁，2021）。
- （二）民族主義：這一主題的討論在研究期間內相對穩定，但沒有明顯的增長趨勢。而到了 2011 年達到最高峰（7 篇），就本研究理解而言，2011 年為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而時任總統馬英九先生當年前往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總統府，2011）出席各項藝文活動高達 5 次（國立國

父紀念館，2011），由此可見，政府重視建國百年各項紀念活動，漸而吸引學者對民族主義議題為投書主要趨勢。接續活動之後呈現波動但整體趨勢下降，到了 2022 年和 2023 年穩定在 2 篇。

（三）民權主義從 2006 年到 2020 年，研究數量總體呈現波動，其中 2010 年達到一個高點（6 篇）。2020 年後顯著下降，到了 2022 年和 2023 年無任何研究，顯示近年來對此主題的關注可能有所減少。

（四）民生主義研究數量整體較為平穩，但在 2019 年達到一個顯著的高點（8 篇），就本研究理解而言，2019 年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經濟開始受到嚴重的衝擊，對我國總體經濟亦受到相對應的影響下，相對的學者對國家發展民生議題為投書主要趨勢。隨後數量有所下降，但到了 2023 年有所回升（3 篇），這可能表明對民生主義的關注在某些年份特別高。其他此類別的研究數量相對較少，整體趨勢不明顯，但可以看出在 2014 年和 2021 年有較為突出的研究（分別為 3 篇和 2 篇）。

圖 3：2006-2023 年《孫學研究》歷年期刊主題內容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整體而言，對中山思想和孫學的研究在近年有明顯增長，民族主義研究相對穩定但無明顯增長，民權主義的關注在近兩年減少至無研究，民生主義的研究呈現波動但有一定關注度，而其他類別的研究較少且分布不均。綜上，

這些趨勢可能反映了國內社會科學領域對不同主題的關注變化，也可能受到社會、政治、經濟等外部因素影響，值得後續研究學者持續關注。

四、「主題篇名、關鍵字」分析

首先，關鍵字分析是一個從大量文本中提取有價值信息的有效方法，最終將分析結果轉化為有實際意義的見解（陳世榮，2005）。對此，本研究針對「主題篇名、關鍵字」藉由庫博「詞頻列表」分析數據顯示（如圖4），各篇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從中我們可以進行一些分析和解讀，以「孫中山」（94次）出現次數最多，「孫中山思想（19次）」次之，而「思想」（16次）與「民主」（15次）、「國家」（14次）、「民族主義」（14次）。顯見這些頻次接近的關鍵詞表明，對「孫學研究」範疇而言，其國家建設、民族主義以及對亞洲及中國未來的願景，也是特定文本集或研究中的相對重要性和關聯性研究核心。

圖4：主題篇名關鍵字「詞頻列表」分析數據顯示圖

標的語料庫		詞頻列表		關鍵詞脈絡索引		搭配詞		關鍵詞分布		共現頻率		共現分析		共現組合		參照語料庫		詞語顯著性		
詞頻																				
回到完整列表		☒ 啟用停用詞		☒ 啟用同類詞		☐ 忽略變形														
#	詞	詞頻	文件頻率	同類詞																
1	孫中山	94	1																	
2	孫中山思想	19	1																	
3	思想	16	1																	
4	民主	15	1																	
5	國家	14	1																	
6	民族主義	14	1																	
7	中山	12	1																	
8	大亞洲主義	12	1																	
9	發展	12	1																	
10	三民主義	11	1																	
11	辛亥革命	10	1																	
12	現代化	9	1																	
13	革命	9	1																	
14	中國	8	1																	
15	政治	8	1																	
16	政策	8	1																	
17	文化	8	1																	
18	民主化	8	1																	
19	民權主義	8	1																	
20	民生主義	8	1																	
21	治理	7	1																	
22	監察院	7	1																	
23	兩岸關係	6	1																	
24	社會	6	1																	
25	認同	6	1																	
26	中國大陸	5	1																	
27	人權	5	1																	
28	全球化	5	1																	
29	公民	5	1																	
30	學研	5	1																	
31	實業計劃	5	1																	
32	平等	5	1																	
33	改革	5	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其次，在「搭配詞」及「關鍵詞分布」分析方面（如圖 5、6），承接上述各篇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前 10 排序，並以「孫中山」、「中山思想」、「思想」、「民主」、「國家」、「民族主義」、「中山」及「三民主義」等關鍵字分析，反映了「搭配詞」配對及其頻次描繪「主題篇名關鍵字」其字義從民主理念鞏固與深化，到國家的發展，再到對孫中山學術研究的探討，這些配對突顯特定主題的關聯性和重要性。

圖 5：主題篇名關鍵字「搭配詞」配對顯示圖

標的語料庫 詞頻列表 關鍵詞脈絡索引 搭配詞 關鍵詞分布 共現頻率 共現分析			
搜尋：孫中山 中山思想 思想 民主 國家 民族主義 中山 三民主義			執行
總數或左數：2		右數：	句子 ☒ 啟用停用詞 ☐ 忽略變形
#	Freq.	N-gram	
1	15	中山 思想	
2	5	國家 發展	
3	3	孫中山 研究	
4	2	民主 鞏固	
5	2	民主 深化	
6	2	均富 思想	
7	1	中山 學說	
8	1	民主 社會	
9	1	企業 民主	
10	1	三民主義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圖 6：主題篇名關鍵字「關鍵詞分布」顯示圖

標的語料庫 詞頻列表 關鍵詞脈絡索引 搭配詞 關鍵詞分布 共現頻率 共現分析 共現組合 參照語料庫 詞語顯著性 字串分析									
搜尋詞：孫中山 中山思想 思想 民主 國家 民族主義 中山 三民主義									搜尋
☒ 啟用同類詞 ☐ 啟用停用詞 ☐ 忽略變形									
分布圖：國家 民主 中山思想 思想 民族主義 中山 孫中山 三民主義						出現次數	文章總詞數	檔案來源	
						176	2304	關鍵詞.docx	
						166	2435	題目.docx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再者，主題篇名關鍵字「共現組合」層次來看（如圖 7），以「國家發展」和「中山思想」作為共現組合分析，本研究可從 T 分數（t score）³ 指數發現，「國家發展」和「中山思想」分數分別是 7.363 和 6.345。而「國家發展」的 T 分數為 7.363，強調了國家發展的主題領域相對於其他主題更為關鍵。反之，「中山思想」的 T 分數為 6.345，雖然低於「國家發展」，但仍顯示出「中山思想」在「孫學研究」相關文本或研究中相對於一般討論的特殊重要性特別關注和重視。

圖 7：主題篇名關鍵字「共現組合」顯示圖

標的語料庫	詞頻列表	關鍵詞脈絡索引	搭配詞	關鍵詞分布	共現頻率	共現分析	共現組合
開始尋找	句子	詞頻門檻： 5	t_score	分數門檻： 5	顯示與觀察詞相關		
#	詞組			t_score			
	1 國家發展			7.363			
	2 中山思想			6.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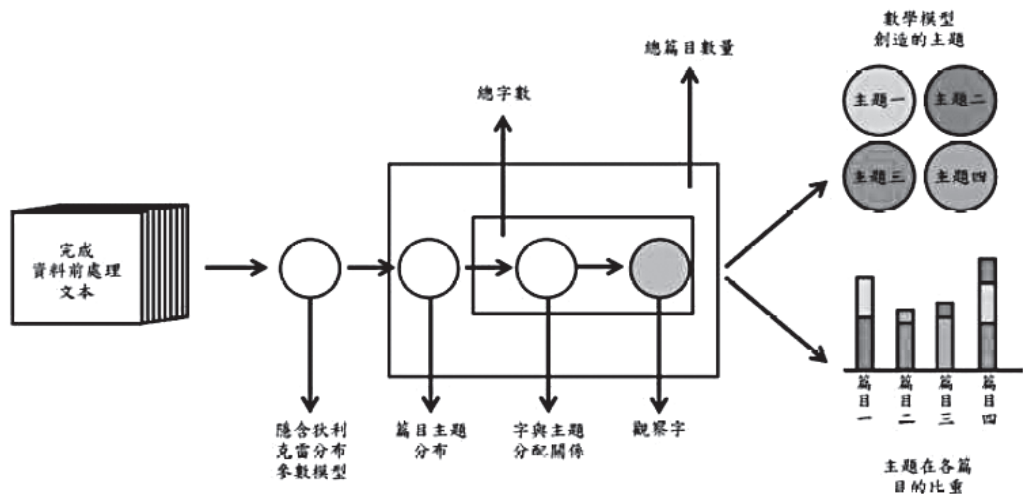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整體來說，針對「文字雲」部分，將「主題篇名關鍵字」文字雲顯示了文字中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而這些關鍵詞涵蓋了各種主題，包括孫中山、孫中山思想、中山思想、主義、民主思想、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憲政體制、經濟發展、學說、民主化等。透過這個文字雲，可以快速了解整個文本的主題和重點詞彙，以理解對國立國父紀念館 2006~2023 年《孫學研究》刊載之期刊關鍵詞句（如下圖 8）。



相形之下，為進一步瞭解國立國父紀念館 2006~2023 年《孫學研究》刊載之期刊文本的內容主題。在本文研究中，我們利用 Gensim 套件中的 Mallet LDA 工具來進行演算，其目的是計算詞彙與主題之間的一致性分數（Coherence Value）。要點在對於進行主題建模（Topic Modeling）時，選擇適當的主題數量是非常關鍵的。如果設定了過多的主題數量，可能會造成主題過於細碎，無法集中表達；換句話說，這會把原本應該屬於同一類的資料，不當地細分成更小的群組。反之，如果主題數量設定得過少，則可能難

圖 9：LDA 計算原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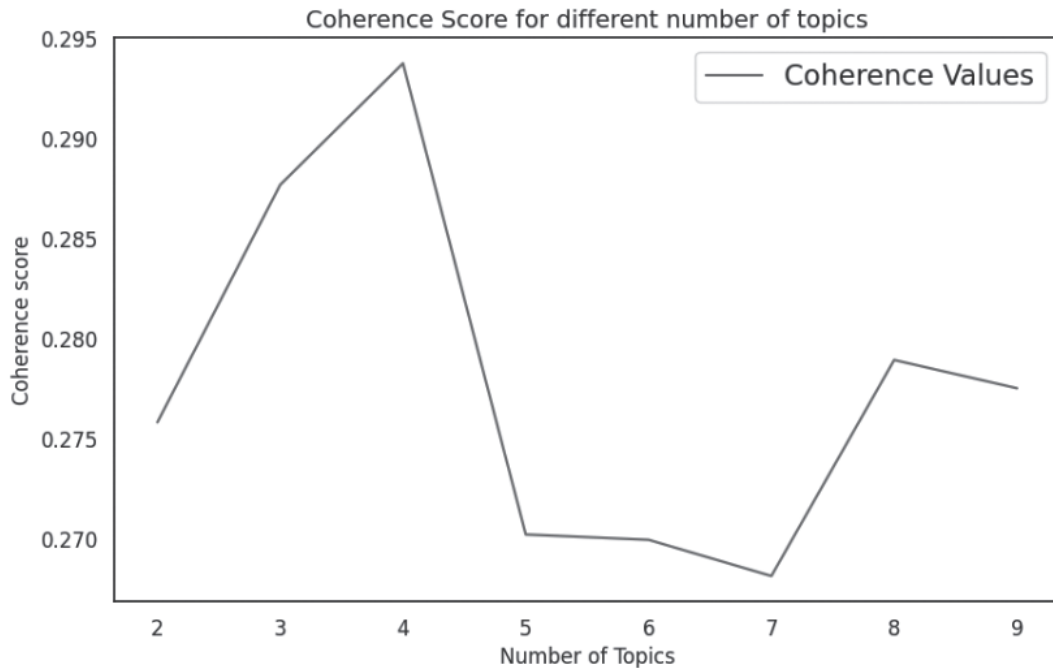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以資料科學方法輔助民意趨勢分析：戰略及戰爭風險感知的網路民意研〉，傅文成、黃琬戡、顏瑞宏，2021，《新聞學研究》，149：1-49。

以將具有不同特徵的資料區分開來；簡而言之，這導致原本不應該分在同一類的資料被歸入同一主題。因此，在開始文本分群分析之前，本研究根據不同的主題數進行預先計算和建模，然後基於模型的表現（一致性分數）來決定最終選擇的主題數量。

本研究首先預設 4 個主題數為分群之最小值，以每次增加 1 個主題的幅度逐步進行運算，直到完成 216 個主題摘要的計算，模型運算結果以區分 4 個主題為最佳，CV 值⁴達 0.294（分析結果如下圖 10）。

圖 10：LDA 運算詞彙與主題一致性分數（Coherence Valu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 LDA 主題模型 CV 值達僅 0.294（如圖 10），其意味著主題模型在詞彙相關性或一致性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相關性，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個數值指出，雖然模型能夠一定程度上捕捉到詞彙間的關聯性，生成具有相關性的主題，但這種相關性並不是非常強。換句話說，模型生成的主題中仍可能包含一些相對不那麼相關的詞彙。為了提高模型的質量和主題的一致性，研究人員可能需要考慮調整模型的參數，例如主題的數量、迭代次數、詞彙選取的標準等。此外，也可以進一步檢查數據預處理的過程，是否有更好的方式來清洗和過濾文本數據，以提高主題模型的性能。

本研究據此採用 4 個主題數之文本分群結果透過觀察關鍵字出現的頻率，以及與文字的話語結構、組合規律和概念，研究者便能解釋每個主題所強調的和框架。本研究蒐集的 213 篇文本經 LDA 分群，並由研究者參照關鍵字後整理出 4 個主題（如下表 3）。

表 3：2006~2023 年《孫學研究》刊載文章主題高占比分群之關鍵詞使用列表

主題分群	關鍵詞
主題一 (中山思想)	中山、思想、國家、民主、革命、社會、啟蒙、理想、孫學、教育
主題二 (民族主義)	民族、發展、殖民、自尊、文化、愛國、社會、政府、革命、團結
主題三 (民權主義)	平等、政權、權利、公權、思想、民主、政治、國家、權益
主題四 (民生主義)	福祉、社會、發展、經濟、政治、資源、公平、貧富、生活、分析
註：各期刊主題權重占比關鍵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結論

本研究以國父紀念館 2006~2023 年之《孫學研究》的主題趨勢顯示了外部環境變化與政府政策對學術方向的明顯影響。無論是在重大歷史節點、國際交流需求，還是在當代臺灣內部的文化政策推動下，該期刊逐漸形成了以孫中山思想回應當代議題、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融合的學術特徵。此外；《孫學研究》期刊語料做為資料核心，並使用數位探勘工具來研究這些語料，進而將汲取到的資訊，提供研究者分析檢視。進而我們能夠深入探討孫中山思想研究的主題趨勢、研究重點的變遷，以及學術界對於孫中山思想各方面的關注程度。就以下五點說明：

一、就主題趨勢層面言

孫中山思想研究主題部分，隨著時代發展而有所變化。早期的研究著重

於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解讀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近年來，研究逐漸向孫中山思想在當代的應用與實踐、對外政策思想，以及孫中山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係等方面拓展。

二、研究重點變層面言

隨著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的深入，孫中山思想的研究重點也出現了變遷。從最初的政治理論分析，到對經濟發展觀點、民族主義、社會變革等方面的探討，孫中山思想的多元性和實踐性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

三、就學術界關注程度層面言

通過數位探勘工具分析《孫學研究》期刊的語料，可以發現學術界對於孫中山思想的關注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傳統領域外，近年來對於孫中山與性別平等、環境保護思想的探討也逐漸增多，反映了孫中山思想在當代社會中仍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和啟示意義。

四、研究方法的創新層面而言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孫中山思想的研究方法也出現了創新。這些數位文本分析技術不僅揭示了《孫學研究》期刊的主題演變，還能深入分析每個主題的內涵與結構。特別是，通過關鍵字和語言結構的頻率分析，研究者能夠追蹤到孫文思想研究中不同時期的焦點轉變，從而豐富了對該領域的學術理解。

五、研究建議

（一）拓展資料範圍與分析深度

本研究基於《孫學研究》期刊的 213 篇文章進行分析，展示了孫學研究的主題演變與關鍵關注點。然而，未來研究可考慮擴展至其他學術期刊或會

議論文，形成更加全面的資料集，從而進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普適性。此外，可補充質化分析以補足量化技術可能忽略的細微文化與歷史脈絡，提供更深入的解讀。

（二）多元方法的結合應用

本研究採用 Corpro 與 Python 進行關鍵字詞頻與主題建模分析，已證實數位工具在學術研究中的價值。未來研究可進一步融合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與語義分析（Semantic Analysis）方法，探討研究者之間的合作網絡與學術社群動態，並挖掘文本中的深層語義，提供更具綜合性的分析框架。

（三）橫向與縱向比較分析

為進一步深化孫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建議進行跨期刊的橫向比較，分析其他政治思想相關期刊與《孫學研究》的異同。同時，透過比較不同時期的主題趨勢變化，探索歷史與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周年、建國百年等）如何影響孫學研究的發展，揭示研究主題與社會背景間的交互關係。

（四）關鍵字與篇名分析的實證應用

本研究通過關鍵字詞頻與篇名主題的分析，梳理了研究焦點。然而，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將這些分析結果應用於研究策略制定，例如設計針對「民族主義」或「民生主義」的深度研究計畫，並探討關鍵主題的未來發展方向。同時，將 LDA 模型分析應用於文本細節的解讀，可揭示更多隱藏議題。

（五）加強對「低頻主題」的關注

研究中發現「民權主義」等主題在近年來的關注度有所下降，但其學術與實踐意義依然重要。建議研究者針對低頻主題展開專題研究，挖掘其學術貢獻與當前社會議題的聯繫，避免這些主題在學術界逐漸被忽略。

總結來說，本研究運用文本挖掘與主題分析技術，有系統地梳理了《孫學研究》期刊的主題演變與關鍵詞發展，成功展示了數據驅動方法在政治思想與歷史文化研究中的應用潛力。研究成果不僅呈現了孫學研究的核心主題，更為學術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工具與分析框架。此外，通過數據分析，研究

發現孫學研究的學術重心與政治事件具有顯著關聯性，例如辛亥革命周年與建國百年引發了相關議題的研究高峰。這表明學術研究不僅是一種知識積累的過程，還是與社會脈絡高度互動的產物。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高頻主題如「中山思想」與「民族主義」占據了研究的核心地位，但低頻主題的潛在價值不容忽視。例如「民權主義」的研究雖然近期減少，但其對民主政治與國家建設的啟發性依然具有重要意義。未來應加強對這些主題的關注，避免因趨勢偏向而忽略多元視角的探索。

綜上，本研究不僅揭示了孫學研究的發展脈絡與學術價值，還展現了數位化技術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前景。期望未來更多研究者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研究領域，挖掘孫學研究的多層次意涵，助力中山思想與現代社會發展的融合與再現。本研究雖然利用數位探勘工具對《孫學研究》期刊的語料進行文字分析和主題提取。並通過這些工具，我們可以快速地識別和整理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和主題，以及它們的變化趨勢。其次，利用文本挖掘技術對語料進行關聯性分析，從中發現不同主題之間的關聯性和相互影響。這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孫中山思想研究中各個主題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發展脈絡。研究者可以利用數位探勘工具對孫中山思想研究相關的學術文獻進行視覺化分析，以圖表的形式呈現出不同主題的變化趨勢和研究熱點。這有助於研究者直觀地理解孫中山思想研究的發展脈絡和重要性。這些發現則豐富了我們對孫中山思想的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對未來研究提供新視角及方法論啟示。

陸、註釋

- 1、HTML Word Cloud：<https://wordcloud.timdream.org/#wikipedia:Cloud>
- 2、詞彙萃取是指從文章中提取研究者所需關鍵字詞的一種技術。該技術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提取所有詞彙而不進行分類，另一種則根據特定主題或研究需求，提取與該主題相關的詞彙。參考謝育平，〈同位詞夾子：主題式分類詞庫萃取演算法〉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辦「2010 數位典藏語述為人文國際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0 年 11 月 29-30 日）。

- 3、**T 分數 (t score)** 指數分析在關鍵詞研究或文本分析中，可以用來衡量某個詞彙或詞彙組合在特定文本或文本集合中的顯著性或重要程度，高 T 分數表明該關鍵詞在研究語料庫中顯著高於在參考語料庫中的出現頻率，這意味著該關鍵詞對研究語料庫來說具有較高的特定性或重要性，引自〈庫博中文與料庫分析工具的數位人文價值〉，闕河嘉，2018 年，《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19）：118-123。
- 4、**CV 值**的範圍在 -1 到 1 之間，值越高表示主題的一致性越好，即主題內的詞彙彼此之間相關性越強，主題模型的質量也就越高。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專書

- 王昇（1997）。《領袖與國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 何光國（2019）。《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三民書局。
- 孫中山（1919 / 1989）。《國父全集—第1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近代中國。

（二）專書論文

- 張益誠、張育傑、余泰毅（2021）。〈探討環境教育論文的文件自動分類技術——以 2013-2018 年環境教育研討會摘要為例〉。《環境教育研究》。臺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 項潔、翁稷安（2011）。〈導論——關於數位人文的思考：理論與方法〉，《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楊仁和譯（2015）。《高效能 Python 程式設計》。臺北：歐萊禮出版社。
（原書 Gorelick, M., & Ozsvald, I. [2014]. *High Performance Python* form Sebastopol CA, US: O'Reilly Media）
- 闕河嘉（2018）。《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的數位人文價值》。臺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
- 闕河嘉、陳光華（2006）。〈庫博中文獨立語料庫分析工具之開發與應用〉，收錄於《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三）期刊論文

- 方瑀紳、李隆盛（2014）。〈數位學習平臺 Second Life 研究的知識結構與發展趨勢〉，《科學教育學刊》，22（4）：331-362。

- 林柏宇、謝邦昌、廖佩珊（2016）。〈基於 Python 之文字探勘平臺〉，《數據分析（Journal of Data Analysis）》，11（6）：35-61。
- 邵軒磊、曾元顯（2018）。〈文字探勘技術輔助主題分析——以《中國大陸研究》期刊為例〉，《問題與研究》，57（1）：29-62。
- 祝平次（2017）。〈搭起數位與人文的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1）：84-89。
- 陳文華、徐聖訓等（2003）。〈應用主題地圖於知識整理〉，《圖書資訊學刊》，1（1）：37-58。
- 陳世榮（2005）。〈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文字探勘應用：以文意為基礎的文件分類及其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4）：683-718。
- 傅文成（2020）。〈以語料庫分析方法檢驗新南向政策的政府與媒體風險建構策略〉，《中華傳播學刊》，37：189-226。
- 傅文成、黃琬戩、顏瑞宏（2021）。〈以資料科學方法輔助民意趨勢分析：戰略及戰爭風險感知的網路民意研究〉，《新聞學研究》，149：1-49。
- 曾元顯（2002）。〈文件主題自動分類成效因素探討〉，《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8：62-83。
- 黃克武（2006）。〈臺灣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典範變遷〉，《史學月刊》，5：10-17。
- 廖和永（1994）。〈中山先生民權思想與現代政治思潮之研究〉，《復興崗學報》，51：37-60。
- 趙立彬（2022）。〈中國大陸的孫中山研究（2017-2021 年）〉，《孫學研究》，32：105-136。
- 蔡佩玲（2009）。〈近年來海峽兩岸有關電子資源與圖書館服務研究成果分析——以期刊論文為例〉，《國家圖書館館刊》，2：59-84。
- 謝元晟、程美華、張光昭（2016）。〈運用 R 建立文字探勘平台應用於電視收視率預測〉，《數據分析（Journal of Data Analysis）》，11（3）：109-134。

（四）學位論文

- 石泓昇（2023）。《資料庫大數據分析結合 Python 系統控制》。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李健平（2019）。《電子商務文獻回顧：利用書目計量學探討 2003 ～ 2017 年之文獻》。義守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博士論文。
- 張哲章（2018）。《應用 Python 網路爬蟲技術於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PM2.5 即時動態資料分析》。義守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潘彩君（2018）。《以「文字探勘」法檢證習近平時期之中共國際話語權（2012 ～ 2017）》。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戰略暨國際事務碩士班碩士論文。

（五）研討會論文

- 王界人、沈民新（2015 年 10 月）。〈運用關聯分析探勘民眾關注議題與發展方向：以環保議題為例〉。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2015 計算語言學與語音處理年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
- 廖舜右（2013 年 10 月）。〈中山思想與兩岸未來之發展〉。「2013 年孫文論壇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國際政治研究所。
- 謝育平（2010 年 11 月 29-30 日）。〈同位詞夾子：主題式分類詞庫萃取演算法〉。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2010 數位典藏語述為人文國際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六）網際網路

- 〈中華民國簡介—國父〉（無日期）。取自中華民國總統府網頁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49>（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3 日）
- 〈主要紀事〉（無日期）。取自國立國父紀念館網頁 https://www.yatsen.gov.tw/News_Toggle.aspx?n=6499&sms=14546（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24 日）
-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無日期）。取自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學術資料庫 <https://sunology.culture.tw/cgi-bin/g32/s1gsweb.cgi?o=dcorpus&s=id=%22CS0000000020%22.&searchmode=basic>（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3 日）

-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2 年 10 月 6 日）。〈總統出席「無限一倩玉的版畫世界」翁倩玉畫展開幕典禮〉【新聞稿】。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7027>（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4 日）
- 王崇德（2022）。〈文獻計量學 Bibliometrics〉，《中國大百科全書》。取自 <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134122&Type=bkzyb&SubID=104418>（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6 日）
- 李書政、楊凱文、蘇培元（2019 年 6 月 14 日）。〈大數據分析語言 Python 網路社群文字探勘（Text Mining）—以 PTT 論壇網購版為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2019 管理創新與行銷專案研討會」論文。取自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網頁 <https://dba.nkust.edu.tw/uploads/asset/data/62382e2c2e6356240dbf3492/25.pdf>（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24 日）
- 陳冠榮（2023 年 8 月 24 日）。〈微軟 Excel 引進 Python 語言，執行進階分析、資料視覺化〉，《科技新報》。取自 <https://technews.tw/2023/08/24/microsoft-announcing-python-in-excel/>（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6 日）
- 彭慰（1995 年 12 月）。〈書目計量法 Bibliometrics〉，《國家教育研究院—樂詞網》。取自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87d91ccc52ab7d56a5590a57b51bcc44/?startswith=zh&seq=2>（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6 日）
- 劉性仁（2021 年 2 月 22 日）。〈從辛亥革命 110 周年看待兩岸中山思想〉，《Yahoo 論壇》。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yahoo%E8%AB%96%E5%A3%87->（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6 日）

二、外文部分

- Amado, A., Cortez, P., Rita, P., & Moro, S. (2018). Research trends on big data in marketing: A text mining and topic modeling based literature analysis. *European Research 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conomics*, 24(1), 1-7.
- Blei, D. M., & Lafferty, J. D. (2007). A correlated topic model of science. *The 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1(1), 17-35.
- Blei, D. M., Ng, A. Y., & Jordan, M. I. (2003).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The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3, 993-1022.

- Broadus, R. N. (1987). Toward a definition of 'bibliometrics'. *Scientometrics*, 12(5-6), 373-379.
- Feldman, R., & Sanger, J. (2007). *The text mining handbook: Advanced approaches in analyzing unstructured da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immer, J., & Stewart, B. M. (2017). Text as data: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automatic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for political texts. *Political Analysis*, 25(1), 1-31.
- Miner, G. (Ed.). (2012). *Practical text min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non-structured text data applications*. Waltham, MA: Academic Press.
- Pereira, V., Basilio, M. P., & Santos, C. H. T. (2023). pyBibX—A Python library for bibliometric and scientometric analysis power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arXiv preprint arXiv:2304.14516*.
- Potter, W. G. (1981).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Trends*, 30(1), 5-8.
- Schreibman, Susan; Siemens, Ray; Unsworth, Joh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humanities computing: An introduction.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2004, xxiii-xxvii.
- Sengupta, I. N. (1985). Bibliometrics: A bird's eye view. *IASLIC Bulletin*, 30(4), 167-174.

當女人成為女兵： 從軍教片《中國女兵》探討女性軍人 之身體政治學

吳依屏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嘗試開啟以女性為主角的軍教片的深入討論，檢視 1981 年以女兵為主題的商業國片《中國女兵》，分析劇中女兵的身體如何被收編於制度之中。本文指出女性的女性身體，疊加軍人的政治身體符號，成為表演身體，共同為中國 /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家身體服務。本文分析以下幾點：一、《中國女兵》中女性身體的身體政治，女性身體如何與男性機關制度接觸合作，將自身放置於陽剛的政治場域之中；二、女性身體的陰性特質如何被放大、強調，成為文化榜樣，使女性身體轉化為表演身體，為國族主義登上舞台擦脂抹粉。

關鍵詞：女兵、中國女兵、身體政治、國族主義

When Women Become Female Soldiers: Exploring the Body Politics of Female Soldiers in the Military Education Film The Women Soldiers

Yi-Ping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adio & Televis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itiate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films with female protagonists by examining the 1981 commercial Taiwanese film *The Women Soldiers*. It analyzes how the bodies of female soldiers in the film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female body, overlaid with the symbolic political body of the soldier, becomes a performative body, collectively serving the national body of 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the body politics of female bodies *Chinese Female Soldiers*, examining how female bodies interact and cooperate with male-dominated institutions, positioning themselves within a masculine political field. Second, how the feminine qualities of the female body are magnified and emphasized to become cultural models and transform the female body into a performative body that helps to glamorize nationalism on stage.

Keywords: female soldier, *The Women Soldiers*, body politics, nationalism

壹、緒論

軍事及戰爭相關的電影（military & war film）在好萊塢電影產業中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受歡迎的一種主流分類。觀眾熱愛觀看大螢幕裡的戰爭英雄如何拯救弱小、贏得勝利，更沉醉於好萊塢電影中美國軍隊投身世界各地維持和平，彷彿正義化身。自然，這樣熱血激情的電影更有大量男性觀眾願意買票進場支持。而相較於好萊塢戰爭片的龐雜多產，台灣國產的戰爭片更傾向於歷史戰役的寫實翻拍以及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由於戒嚴統治（1949~1987）時期的高壓箝制，國民政府大舉「反共抗俄」之旗，黨國意識型態主導藝文政策，因此電影題材及劇本必須經過審核，符合國家政策走向。

軍教片的模式可以說從《成功嶺上》（1978）開始定型，在嚴肅的題材中增添幽默詼諧的笑料，使其莊重中帶輕鬆，感人外加逗趣，已經逐漸成為票房大賣的固定配方。相較於更為嚴肅深沈的歷史戰爭片，如《忠烈圖》（1975）、《碧血黃花》（1980）、《古寧頭大戰》（1980）等，詼諧逗趣的軍教片則更受國人青睞。葉龍彥（2017）對此現象有以下整理描述：

之後1981年軍教片傾巢而出，計有《海軍與我》、《特種訓練》、《天將神兵》、《大笑將軍》、《中國女兵》、《蛙人敢死隊》、《神勇突擊隊》等，延續到1987年朱延平的《大頭兵》、金鰲勳的《報告班長》，在嚴肅中添加笑料，成為受歡迎的新類型電影（2017，頁212）。

而不論是好萊塢的戰爭片，或者是臺灣的軍教片，女性擔任主角的劇本題材都僅占少數。臺灣軍教片中以女軍人作為主要角色的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軍中芳草》（1952），講述鳳山女青年大隊的故事。¹1975年則有汪瑩導演，改編自謝冰瑩小說的《女兵日記》。而之後出現《中國女兵》（1981）、《金門女兵》（1983），以及十年後商業資本走向的《報告班長5：女兵報到》（1997）。女性主角領銜的臺灣軍教片為數不多，但自有其值得研究關注之

¹ 《軍中芳草》（1952），黑白片。導演王珏、徐欣夫，編劇羅家駒。戴啟霞主演。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

處。可惜的是，這些以女性軍人為主角的電影，卻少有學術專書或者期刊論文針對女軍人之戲劇化角色進行書寫分析。

貳、國內外學者對女兵議題之研究

一、文獻回顧

話雖如此，實際上學界中其他領域有許多以新聞傳播、法學面向、社會學觀點分析討論女性軍人的新聞框架形象、法律層面脈絡詮釋、以及性別社會學角度的文章。² 而在國防軍事體系中，更有諸多相關期刊的論文討論分析，直接利用體系中的數據資料剖析解讀，可供讀者了解女性軍人從軍問題及性別議題如何在軍隊體制中發揮影響。³

² 參見陳宜倩（2010）〈「姊姊媽媽真偉大！」女性從軍議題之比較法脈絡觀察〉《女學學誌》第26期，頁135-191。謝純雅、邊明道（2013）〈新聞報導中的女性軍人框架—以四大報為例〉，《復興崗學報》，103期，頁25-52。嚴巧珊（2018）〈是「機會」還是「侷限」？我國軍隊之性別化操作現況分析〉《社會發展研究學刊》第21期，頁71-92。嚴巧珊、許雅惠（2021）〈隱形圍欄：軍隊中的性別主流化實踐〉《女學學誌》第49期，頁1-44。

³ 參見李培齊、徐宜輝（1998）〈職業軍官個人屬性、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關聯性研究〉，《人力資源學報》第3卷，頁88-103。沈明室（1997）〈女性軍人研究的內容與發展〉，《國軍八十六年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5-226。沈明室（1997）〈戰爭與女性軍人〉，「三軍官校第四屆基礎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沈明室（1999）〈女性軍人擔任戰鬥性職務之研究〉，《軍事社會科學半年刊》第4期，頁45-62。沈明室（1999）〈女性軍人擔任戰鬥性職務之研究〉，《第二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8-178-22。沈明室（1999）〈女性軍人擔任戰鬥職之探討〉，「國軍八十八年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沈明室（1999）〈各國女性軍人發展概述〉，《國防雜誌》第15卷第5期，頁33-53。鍾武（1994）〈對女性軍人遂行軍事任務之研究〉，《國防雜誌》第10卷第3期，頁20-25。孫立方（1998）〈陸軍女性軍、士官部隊適應狀況之研究〉，《陸軍學術月刊》第34卷第399期，頁48-57。孫敏華（1998）〈現職軍士官對女性軍人態度之研究〉，《軍事社會科學半年刊》第3期，頁1-30。莫大華（1996）〈美國女性官兵擔任戰鬥職務政策之探析〉，《美歐月刊》第11卷第10期，頁43-59。莫大華（1997）〈美國軍中防治性騷擾問題之研究——兼論對國軍的啟示〉，《國軍八十六年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04-124。廖國鋒、梁成明（2000）〈國軍女性軍官工作特性、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關係之研究〉，《國防管理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頁18-29。蕭維民（2001）〈本軍女性軍、士官人力運用之研究〉，《海軍學術月刊》第35卷第1期，頁24-39。

關於女軍人電影形象分析的中文學術論文可參見姚羽捷與邊明道（2014）在〈現代「花木蘭」＝體力＋美麗？從美國軍事電影中的女性角色省思女性軍人處境〉中以女性主義觀點探討軍事電影中女性角色的再現。此文提出女性必須在軍中展現出男子氣概的陽剛面才能得到肯定，但同時卻又因女性身體特質難逃被窺視的下場。兩位學者在另一篇論文〈軍事題材電影中女性軍人角色研究—以 1980 至 2010 年好萊塢電影為例〉（2017）更為詳盡的分析 1980 年至 2010 年的好萊塢軍事題材電影中的女性軍人角色。此研究以內容分析及敘事分析法，得出受制於性別偏見，電影依然存在以男性窺視的方式支配女性形象的結論。女性軍人始終被視為單獨個體而非軍隊成員。雖然，這種現象在波斯灣戰爭及 911 恐怖攻擊後已有改變。除了這兩篇分析好萊塢戰爭片女性軍人形象的中文論文外，王美玲（1998）著有一篇碩士論文《臺灣電影中的女兵形象研究》。以上三篇為臺灣目前為止少數針對電影中女性軍人角色的學術研究成果。

而西方學者則各自從不同角度討論女性軍人或者女性電影形象之議題

Molly Haskell（1987）利用女性主義觀點，分析電影中女性形象的轉變與當時社會的歷史脈絡緊密相連。Marjorie Rosen（1973）從情節著手，討論電影中的女性如何被安排，成為反映美國夢興衰破滅的一種幻影。Stacie R. Furia & Denise D. Bielby（2009）則在期刊中收集探討了 1940 年至 2005 年間，好萊塢軍事電影中女性角色的性別刻板印象，並分析這些刻板印象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情境與軍事文化。

二、研究方法與問題

本篇文章聚焦於女兵的身體政治論述展開討論，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解釋何謂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再者，提出相關的身體理論來佐證分析電影中的女兵身體意象。這些身體政治學的相關理論不僅僅存在於西方理論體系中，在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析中也是十分受歡迎的討論面向之一。

身體政治學意指以人的身體作為隱喻（metaphor），所展開的針對諸如國家等政治組織之原理及其運作之論述。黃俊傑相信，這種「身體政治論」的論述中，身體是政治思想家負載意義的隱喻。思想家藉由作為「符號」的身體注入意義與價值（2004，頁 341）。順此脈絡，女性軍人的身體自然有

其作為文化符號的隱藏寓意。本文計畫挪用中西方相關理論家之觀念分析爬梳此軍教片《中國女兵》中女兵的身體政治意象。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83/ 吳叡人譯，2007）曾在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提出民族是被想像出來的、有限的、有主權的共同體。雖然他陳述了想像的共同體如何建構而成，而在過程中，人民的犧牲無法避免；然而，他的討論並未聚焦於性別的影響及差異。安德森表示的同志情誼及人民一員等說法看似無關性別，實際上帶有男性團結的隱藏意涵（Linda McDowell, 1999 / 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而這其中不足則仰賴諸多女性主義理論等加以延伸完善（Marina Warner, 1985; Nira Yuval-Davis & Floya Anthias, 1989; Judith Butler, 1990; Catherine Nash, 1993）。

思想家華納（Warner, 1985）認為身體是人類用來展示意義的地圖，是我們照見自我並加以呈現的最主要隱喻之一。在各種意象無所不在的當代社會中，女性身體的出現頻率遠高於任何其他意象。男性以他們自身的個體模樣出現；相反地，女性身體卻被用來展現別人或者其他東西的身份與價值。從她的話語可以理解，所謂的其他東西，國族認同感是其中的關鍵核心。因此，勇敢無懼，身著軍服的女兵身體，或者懷抱嬰兒、生養眾多子女的母親形象，都難以逃避成為被用來展現國族認同的形象之一。本篇論文即是意圖爬梳女兵之陰性身體與中華民國國族認同感間的多重意象。

此外，女性主義者尤弗一戴維斯與安錫亞斯（Nira Yuval-Davis & Floya Anthias, 1989）就曾總結女性在國家建立中常常扮演的七種角色，其中提及社群中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傳送者功能，也包括國族認同、經濟、政治、及軍隊中的掙扎奮戰的參與者身份。實際上，女性於建構國族性同的扮演角色通常是多重豐富的。如此的多重身份可能也驗證女兵形象的複雜性及矛盾性，為本文論證女兵之身體如何同時表演女性身體的天生陰性柔軟，卻也在穿上軍服後，成為象徵愛國精神及奮勇殺敵的花木蘭形象，被賦予慷慨報國的政治身體形象。

同時，巴特勒（Butler, 1990）曾在 *Gender Trouble* 一書中表述性別表演是建構性別認同的實踐過程，她指出「性別」是個體「性」（sex）、「別」（gender）、「欲」（desire）三者聯合的持續行動表現。在這樣連續強迫性的重複過程之中，個體逐漸建構其性別認同，這種實踐過程即為性別表演。

性別更像是一種行為。「……是在表達性別的過程中，操演出自己的性別身份。」巴特勒的詮釋則是將女性身體的呈現方式追溯回某種本質式的討論，而將其放置於本文之中，則有利於理解女兵是如何從生理性別之「女性」（陰性身體）著手，於突破傳統社會習性建構的標準女性形象之時，完成愛國統一之「女兵」（政治身體）展演。總體而言，女性主義理論學者們已就女性身體與國族主義之關係展開多方討論。根據她們的分析，女性之身體似乎容易失去能動之可能，而被迫成為陽剛男性的工具，失去主要敘述之權力，僅僅淪為龐大國族建構中的破碎、片面的文化象徵。然而，這些被迫如此定義及窺視的女性身體是否確實缺乏反抗叛逆的能動性？而如果女性確實意識並試圖奪回其身體意象的主動詮釋性，她們的表演行動是否又淪為單調片面的性別二元論分界而缺乏性別多重流動之可能？

除了西方學者之外，亞洲學者對於身體的政治學討論同等重要。黃俊傑（2004，頁 344-345）在著述中提出中國古代身體政治學的三個特殊面向：（一）、在具體的脈絡中展開論述；（二）、將身體以及作為身體的延伸或擴大的國家，視為一個具有內在整合性的有機體；（三）、將身體當作隱喻或符號來運用，以解釋國家的組織與發展。在這三項面向中，不難理解中國古典有機式的身體內在理解方式與西方機械式的身體政治學解讀有所區別。古代中國的身體政治論是將身體 / 國家視為有機體，並將身體視為符號以傾注大量意義。這正與 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身體政治論展現的機械論形成鮮明對比。而中國特有的政治觀點：政治過程就是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的延伸過程，除了可作為輔助我們分析女兵身體形象的有效途徑，也恰恰證明女性軍人的身體形象自有其重要的政治意義。

總結而言，本文嘗試以文本分析爬梳女性軍人於台灣軍教片之戲劇形象，檢視 1981 年的商業國片《中國女兵》，以電影內文及角色形象塑造作為分析文本，分析劇中女兵的身體如何以個人、家庭、國家的角度放置於制度之中。本文認為女性身體，由於成為軍人的政治化傾向，轉化為表演身體，共同為中國 /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族主義宣傳服務。女性的陰性特質不僅被馴化，同時也被凝視，既被父權體制 / 軍隊收編，但同時又被排除於核心之外。女性軍人的個人主體性自我犧牲更被合理化為凝聚母國整體性的必經之路。然而，女性也同時利用跳脫傳統父權制度的選擇，進入標準男性建構下的軍隊

制度，在表演國族認同象徵之女兵形象的同時，也反向產生衝撞刻板男性軍隊形象的能量。因此，矛盾的是，女兵之政治身體同時轉化為建構國族認同之表演身體，也同時化身為損害陽剛軍隊制度（masculinity）之陰性身體。

本文分析以下幾點：一、《中國女兵》中女性身體的身體政治，女兵身體如何與機關制度接觸融合，將自身放置於陽剛的政治場域之中，同時卻也藉此衝撞動搖男性固化的軍隊體制；二、本片如何特寫聚焦於女性之身體形象，使其標籤化，成為文化偶像（cultural icon），並且完成將女性身體轉化為表演身體，為國族主義（nationalism）搖旗吶喊的重要任務。

參、《中國女兵》的政治身體

一、電影背景介紹及情節概要

《中國女兵》的劇情內容為富家女溫靜儀（林青霞飾）與好友劉小慧（應采靈飾）、彭碧桃（夏玲玲飾）克服困難從軍的故事。其中溫靜儀說服反對她從軍的奶奶媽媽，而劉小慧則必須面對白血病的病魔打擊，堅持完成訓練。彭碧桃則大大咧咧負責製造笑料。她們三人的好友方淑（江玲飾）則考上了醫學院，陪伴她們追逐夢想。在這過程之中，她們的排長（湯蘭花飾）與連長張淑梅（歸亞蕾飾）負責訓練督促她們完成軍事訓練項目。而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之中，她們三人也對排長從一開始的調皮不服到最後的信賴服從。最後一幕則是她們出色地完成閱兵儀式的表演。觀眾從頭到尾觀看女學生如何從開始的天真無知，轉而兢兢業業地在操練中學習各種軍事訓練項目，最終成為出色的女性軍人。其中主要情節可以歸納為：離家從軍，入營剪髮、基本教練、夜間受訓、實彈射擊、內務檢查、不假外出，軍紀處分、護理訓練、協同演習、五百障礙、閱兵分列等。

《中國女兵》為 1981 年由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的彩色國語片，劉維斌導演，張永祥編劇。當時紅極一時的林青霞擔任主演，主要角色由應采靈、夏玲玲、江玲、湯蘭花、歸亞蕾等演出，並邀請陶大偉、張小燕、孫越、方正、陳今佩客串，演員陣容十分豪華。

此片由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與金門影業公司所合製，得到軍方大力支持拍攝。《民生報》曾在六月十九號的報導中提到開鏡典禮於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並由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主持。此片由國防部協助拍攝，其中的火炮射擊及實習參觀項目在彰化田中及岡山空軍官校拍攝。而閱兵典禮則在政治作戰學校拍攝，更動員了官生一千兩百多人參加閱兵典禮，協助拍攝（1981.6.19: A7）。政府當局對於電影產業的影響深遠，正如同焦雄屏（2018，頁 52）在討論戒嚴時期政治情勢如何影響電影型態時戲謔地稱，「電影等媒介被視為與槍枝大砲等武器一樣需要管制的戰鬥宣傳工具」。

從軍方的支持拍攝中可以看出軍方利用軍教片宣傳愛國思想的想法。當時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也在《民生報》的訪問中證實了這種想法：「近年來由於觀眾的愛護，軍事片才受到普遍重視和喜愛。在這種有利情況之下，今後軍事片的攝製，取材要更嚴謹，內涵要更擴大，才能保持軍事片的水準，以及讓觀眾看見國軍的精良壯大軍容。」整部片可以看出背後國家力量的支持，不論是官校宿舍的使用、醫護課程的學習、無線電操作、海軍軍艦的參訪，都能看出國家意圖展現強大軍事力量的用心。而這種主張正是軍教片一貫的用意。至於選擇女兵作為拍攝主要題材的原因也可從當時參謀總長受訪的話中聽出端倪：「《中國女兵》的主題正確，充分表現現代花木蘭的豪情壯志。」（民生報，1981. 6.28: A7）軍方大力支持軍教片的前提可從國民黨政府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召開第九屆五中全會時通過的「當前文藝政策案」一窺端倪。這些文藝政策基本重申「反共抗俄」、「促進文藝與武藝合一，軍中與社會一家」等國家所揭櫫的意識形態（當前文藝政策案，1967）。

二、國族認同與母土（mother-land）想像

《中國女兵》展演服膺國家力量的方式不僅在於形式及主題上的「正確」，也展現在其內容的政治正確：不僅於語言之中表現自我的國族認同主張，也表現在思想上的愛國奉獻精神。片名被命名為《中國女兵》就能理解當時國民黨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信念，臺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他們認同的中國為中華民國。這種中國在臺灣的觀念於本片中清晰可見。吳怡靜（2019）在討論冷戰時期歷史時就曾經直言，冷戰時期的國民黨政府自認為

自由中國，需要國際的認可，以阻擋中共成為中國的代表。彭碧桃在一幕高中籃球校隊坐車的場景中，詢問同車的女教官，是否為政戰學校畢業，有無參加過閱兵。當得到教官肯定的答案時，羨慕的說：「好好喔，我們都好羨慕妳喔！我們指的是我、溫靜儀和劉小慧。我們都想穿上軍裝做個中國女兵。」電影一開始就奠定主角們嚮往軍裝的基調，並且清楚表明這個國家為中國。接下來的家庭爭執戲中，溫靜儀的母親也戲謔地說道，「幸虧我們中國沒有女太空人」。對於國族認同為中國的定位十分明確的由語言台詞的確認加以宣告。

這部電影中並未出現將國家認同表明為臺灣的時刻，而片中的演員也反覆於台詞中提及自身的中國人身份。而這最明顯的中國認同表現在女兵們於浴室一起洗澡高歌的片段。畫面聚焦於馮碧桃邊洗澡邊唱「光芒萬丈照華夏，個人榮譽小」，接著轉向劉小慧接唱「民族存亡大」。再切換近景，群演唱著「頂天立地，繼往開來」，最後鏡頭轉向邊洗頭邊歌唱「自立自強堅忍不拔，山川壯麗美如畫」的溫靜儀。這首歌曲為江玲（飾演方淑）演唱的《中國女兵》，由左宏元作曲、莊奴作詞。演員們在電影中演唱的只是部分歌詞，而這首歌詞的重點部分則是「中華兒女愛國家，我以熱血保衛她。青天白日滿天下，我用生命擁抱她。」。陳儒修（2013）提及歌詞裡使用的國家指稱是「她」，將女性與國家結合，暗示祖國＝母國。相較於祖國母土的宏大象徵，電影中女兵們的個人之軀渺小一致，被國家收編成為軍隊身體。這種將國族認同的隱喻透過母性身體的隱喻形成理論，卻將女性個人身體完全排除於國家政治實體之外的情況，鄭斐文（Cheng Fei-wen, 2003）的論述中談及相似論點。她表示，母性軀體，是一種理想的忍痛女性，正是「國族象徵」與「國族夢想」的所在地，藉此自然而然地凝聚起「國族認同」。歌詞中反覆唱著中華、國家、青天白日，傳達歌曲中的愛國思想。另一段歌詞則是「寶島響起自由鐘，唱我巍巍大中華，」將臺灣稱呼為寶島，表達這塊土地的物產豐饒。而大中華正是指稱中華民國，也同時指涉自身為中國／漢文化的正統代表。

而軍隊實力的展現也同時成為確認國家力量的有效方式以及表演手段，更能藉此鞏固連結國家中的人民兄弟情誼（brotherhood）。電影中運用軍校單位實習的橋段讓觀眾看見中華民國軍隊的人員設備以作為宣傳軍隊實力的表演方式。導演安排主角們參觀海軍軍艦，並實際近距離觀察砲火指揮雷達

以及雙雷管五寸砲。以上武器由雷達及指揮儀控制，其中的海軍艦長還強調「射速快，命中率高」，並且介紹攻潛魚雷，以及欣賞砲火射擊。緊接著，依序前往空軍官校實習，了解飛行訓練、戰鬥機飛行，並由雷霆小組實際示範飛機向上竄升、炸彈開花、以及空對地炸射表演。劇中的飛行教官解釋：「唯有這種嚴格的訓練才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武器的實際展演，藉由電影這種強大的傳播媒介，成為宣傳國家力量的有效手段。

除此之外，一系列的參訪實習透過導演的安排一一展現於觀眾眼前，包括陸軍實彈操作、無線電操作、旗號訓練、密碼傳輸練習、護理課，這些軍隊武器展現及課程內容表演在電影中足足佔據約二十分鐘。雖然導演藉由主角參訪實習的理由將這些展演軍隊武器訓練的內容合理化，但如此漫長的電影時長安排可以從政治層面加以理解，畢竟國防部出資並協助拍攝，自然帶有為軍隊宣傳的意圖。Homi Bhabha（1990）曾經提及，國族大一統是透過國族敘事建構出來的，用故事、形象、象徵與儀式再現國族的「共享」意義。《中國女兵》這部電影的建構可以看出運用女性奮勇報效國家的決心，塑造對於中華民國的強烈認同感。在這樣的故事基礎之上，添加從女孩完美蛻變成女軍人的角色形象，配合充滿國族意識的符號，如國旗、雕像、標語、軍服等，以及軍隊操演、步戰演習、閱兵儀式等展現國家強大武力的儀式，共同確認並分享對於中華民國的國族認同及忠誠意向。換句話說，中華民國的國族意義藉由《中國女兵》的傳播製作強調自我的存在與意義。此一國族的建構必須得益於實際的軍隊武器力量，但也仰賴文化上的宣傳表演以求人民集體的共同國族認同。

三、軍隊的身體政治學

除了軍事武器之外，軍人及軍隊同樣是建立國族認同的重要基石。在電影中，藉由劇情鋪陳，觀眾可以親眼目睹軍隊是如何藉由規律的操練、嚴格的規範將所有軍人的差異不合磨合成一個標準一致的群體。小至個人生理身體上的統一，如制服、剪髮都必須符合軍隊規範並且眾人一致。連長清楚的表達了藉由衣著重新鑄造標準統一的群體可能，「各位穿了軍裝就是軍人。」如同彼得柯睿耿（Peter Corrigan, 2008/ 陳玉慈譯，2010）在討論衣著與身體的意涵時所指出的那樣，「衣著暗示著所有的事情：只要檢視一下衣裝，就

能確定任何與個人有關的社會重要事件。」穿上軍服等於成為軍隊中的軍人，個人的差別獨特性皆被去除，而為軍隊的團體意志服務。這種團體政治身體／軍隊的統一正如同黃俊傑論述中國古代身體政治學時提及的「治身」比附「治國」，都是道德修持由內而外發展之過程。個人身體一致性自然向外擴散發展成軍隊身體的統一性。這也反映軍隊如何運用瑣碎重複的規範要求，成為消除個人差異的有效手段。這些要求貫穿整部影片之中，例如：站軍姿、基本操練、內務檢查。在片中，連長也對這些細瑣要求的背後目的做出解釋：

軍人要求整齊劃一，最注重每一個小節。所以訓練的時候難免會吹毛求疵，因為大家每個人生活環境不一樣，所以要求各位一些刻板的重複的小事。這樣才能夠因為外在的整齊而達到內在的整齊。表現出來的就是團隊精神（《中國女兵》）。

她解釋了軍隊如何利用刻板重複的小細節來重新打造相同標準且互相配合的團體，並且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達成共同意志。而大至武器體能操演訓練也同樣利用重複、嚴格、標準的要求，完成將個體鍛造成軍人的過程。歸功於這些操練：體能訓練、射擊訓練、到各官校軍種參觀實習、步戰協同演習、五百公尺障礙超越，個人的生理身體被重新賦予了軍人身份的政治意涵，成為了象徵軍事力量的政治身體。這種藉由瑣碎、重複、標準、集體以訓練軍人個人身體的意義在於：馴服其個人獨特人格的特質而轉變成服從於軍隊體制的集體政治身體。這樣的概念從一段排長詢問溫靜儀的台詞中可以看出端倪：

排長：「作為一個軍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溫靜儀：「服從。」

排長：「軍隊的命脈是什麼？」

溫靜儀：「紀律。」

排長：「戰勝敵人最大的武器是什麼？」

溫靜儀：「鐵的紀律。」（《中國女兵》）

而這種身體政治的含義可以在溫靜儀被處罰的情節中藉由針對身體的處罰清楚地看出其背後身體意涵的流動。溫靜儀起初跟連長請假，表達想參加好友方淑的慶生會。連長拒絕之後，溫靜儀與馮碧桃決定私自離營前往參加，而劉小惠則為她們把風。最後三人因此受罰：因為違反軍紀不假外出，所以三人必須接受軍紀教練：劉小惠罰站衛兵，而溫馮兩人則必須在暴雨之中在外操練。電影固然藉此表現三人因此體會軍紀的重要性，成為合格的軍人。但此事件也明示觀眾，軍隊操練及運作的機制十分重視團體精神，強調標準統一。即使細瑣嚴苛，但這種絕對的統一及標準也造成個人意志的抹殺及差異性的不復存在。這種細微瑣碎的嚴苛程度可以從排長於訓練新兵們時描述如何演練「立正」這個動作的解釋中呈現其特質：

立正、稍息、立正，兩腳跟靠攏並齊，腳尖向外分開四十五度，上平正值，微向前傾，體重平均落於腳跟及腳掌上。小腹稍向後收，胸部自然前挺。兩肩宜平，微向後張。兩臂自然下垂，手心向內。兩手五指併攏伸直，手掌及指與腿相接，中指貼於褲縫，手肘微向前移。頭要正，頸要直，口要閉。下顎微向後收。兩眼凝神，向前平視。收下顎，挺胸、收小腹（《中國女兵》）。

解釋一個動作的執行包含如此複雜且細緻的身體運動，固然是為了傳達此動作的具體標準為何，但不可否認的是，藉由如此瑣碎的訓練磨去所有個體的獨特身體特質而達到一種共性的同質表現。因此，主角三人的團隊服從性一旦顯現動搖，就造成其政治身體意涵的損害，而必須再度強調鞏固。因而，對於個人身體的體罰就成為必要手段。同時，讀者也不難將此理解為：當女性試圖於體制中找尋個人獨特經驗之時，便注定與龐大簡化的父權體制發生衝撞，自然女性只能被迫放棄自我意圖以求機構之接納。由此可知，個人的個別身體注定服從於軍隊體制之下的政治身體意涵，為其服務。

黃金麟曾在其著作《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中探討，身體觀念在近代中國如何從傳統的禮法身體，經由新公民運動轉變為國家身體及法權身體。其中提及蔡鍔發起的軍國民運動如何經由將近二十年的身體改造運動（1902-1919）將「國家」概念塑造成身體忠誠的唯

一對象（2000）。本文如果借鑒其身體觀念重新塑造的理論來觀看《中國女兵》中軍隊的成形，可以理解，這些女兵的個人身體，經由軍隊的規範訓誡轉變為對國家忠誠的政治身體。對國家忠誠的要求不僅體現在生理身體的操練之中而使其遵守集體政治身體的統一化，也表現在文化精神的具象化象徵之中，如銅像及標語。在本片中，銅像的近景特寫正是導演傳達此國族認同的範例，包括蔣經國撫慰兒童的銅像、女兵英勇奮戰的銅像。而隨處可見的牆上標語也含有相同意涵，如吃飯食堂牆上所寫的標語：「懷最深的感恩，抱最大的胃口」，強調必須感恩賜給軍人食物的國家。除了隨處可見的銅像及標語外，片尾的閱兵儀式也是鞏固及確認國家權力實行於個人身體上的一種有效方式。透過軍事身體的操作，輔以隆重的閱兵式、分列式，激發參與者的集體記憶與國家想像（吳佩芳，2019）。因此可以說，銅像、標語、及閱兵儀式集體成為形塑及鞏固國族認同的途徑。「國族敘事強調國族傳統及其一脈相承的連續性，連同集體根源的國族肇造神話，以有如「事物本質」的方式再現。」這種國族神話的編織可以從偉人形象的銅像以及意識形態灌輸的標語中，清楚察覺政府試圖建構的國族傳統如何被形塑、傳遞、理解。而這樣的認定因此生產製造出國族認同。我們因而了解：懷抱著國族認同的軍人身體不再只是個人身體，而成為具有政治意涵的政治身體，為其信仰的國族認同奮戰到底。

肆、《中國女兵》的表演身體

本文嘗試將電影中的角色表演與文化社會中的性別表演並置分析，藉由劇中角色的論述展演，剖析角色認同所傳達、暗示，甚至企圖建構的表演身體。劇中利用主角 / 女性意圖進入軍隊 / 男性權力場域的行為來勾勒當時臺灣社會普遍對性別越界的看法。溫靜儀的祖母表達反對的說法透露對於女性軍人的偏見，「當女兵有什麼好？把臉曬的黑黝黝的，一身的肌肉。別嚇唬奶奶了，乖。」她的話語中透露對於肌肉、黝黑，這類女性傳統認為「不美」形象的不喜，也傳達了傳統中國父權社會下要求女性溫馴聽話的一貫要求。而之後與孫女的爭執之中，她依然誠實地表達了父權社會對於女兵存在的普

遍意見，奶奶：「女人該不該去當兵，這個我也不懂嗎？小靜，妳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妳不像我的孫女了。」透過祖母的台詞，我們理解在社會的眼光之下，女性的身體有其正確標準的形象及規範應當遵循。這樣的社會規範導致父權社會中的女性過著矛盾的生活：作為人類，她是一個自由的主體，具有超越性；但作為女人，她的處境又否決其主體性與超越性。這是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 2005/ 何定照譯，2006）在討論女性身體經驗時的觀察。而這種女性身體遭受的社會壓制不僅使女性喪失能量，甚至閹割其他方面的女性能量。

如此的女性身體標準形象也可以從電影最後閱兵大典的女兵服裝看出端倪。女兵一律穿著藍衣白裙白皮鞋，身背小包，走木蘭步。⁴ 左手放置皮包上，右手整齊擺盪。女兵的著裝與其說是打仗殺敵的軍人，更像是優雅高貴的仕女貴婦。劇末閱兵典禮的女兵們強調的並不是其勇武彪悍、擊殺敵人的實用性，而是作為與男性士兵對比而展示出來的女性愛國從戎的表演性。女性身體的婀娜多姿成為閱兵儀式的展演焦點。我們由此發現：女性看似已能突破性別限制，但依然被限制於性別框架的範疇之中，看似越界，實則侷限。這種政治性限制女性選擇職業的壓力，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1970/ 宋文偉、張慧芝譯，2003）深有所感。她認為女性的有限角色使女性只能停留在生物性經驗之層面上，例如料理家務、照管嬰兒（這也是溫靜儀在劇中拒絕的女性天職）。男性則可以進行人類成就、興趣和抱負等人類行為。而屬於政治範疇的地位問題造就男性往往擔任統治者的角色。這三者相互依存，形成一條明確的鏈結，使父權制從古至今順利運行。

女性如何理解國族主義規範，以及力圖追尋自我獨立的自由表現，其中的重要觀察指標之一無疑是女性職業的選擇考量。而女兵作為一種職業選擇，

⁴ 政戰學校早期招收女學生時，校方特地建立獨立營舍，命名為「木蘭村」。這些女學生的軍事訓練項目中自然包含閱兵，分列步伐不同於男性，稱為「木蘭步」。木蘭步是一種小快步的步法。女兵部隊受軍隊校閱時行進間所用，每分鐘一百四十二步。木蘭步第一次出現，是在民國49年的國慶典禮，當時政戰學校、國防醫學院和女青年工作隊，走出了第一次的木蘭步，這一走，走了將近半世紀，但現在的政戰學院，因為組織調整，女學生人數少了，不再編成獨立連隊，而是和一般男學生混合編組，特色的木蘭步，隨著時代的腳步，走入歷史。參見楊鎮全〈獨家不背皮包拿步槍 女兵木蘭步成絕響〉（2011年6月3日）。《TVBS新聞網》，政治版。<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56480>

其身體意涵的複雜度自然值得深入討論。女兵的女性身體必須呼應國族主義的要求，被迫將其女性身體政治化，成為表演身體以宣傳國族主義，如此的女性自我內化國族主義可從劇中人物的言語之中察覺。溫靜儀回應祖母的反對，「我們要去當女兵並不是因為一時的衝動，也不是為了好奇，而是我的志願。我覺得一個女人不光是嫁人和生孩子。女人同樣可以成為對社會國家有用的人。女人同樣可以擔任保衛國家的責任。」劉小惠也如此相信：「沒有一種榮譽比保衛國家更光榮的。」馮碧桃同樣驕傲的表示：「其實，要當一個女軍人哪並不難。只要有毅力完成。而且中國女軍人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這些女性主角們表現對於女性軍人身份的高度認同，讚揚其保衛家國的實質性價值，她們認可軍人的政治身體意涵，並接受將自身女性身體疊加為軍人身份的政治身體服務。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轉化奉獻是自我選擇而完成的。實言之，《中國女兵》中的女兵選擇將女疊放於兵之下，更重要的意義是為國家意識形態服務。

女性身體除了完成政治身體的政治性工作之外，同時也必須在電影螢幕上成為吸引觀眾目光的表演身體。編劇及導演在《中國女兵》中運用標準好萊塢通俗劇（melodrama）的敘事模式及大牌女星為主角的選擇以確保本片吸引觀眾買票進場。這種標準通俗劇通常由主角面臨一個困境（動機）展開敘事，經過種種衝突，情節矛盾，最後角色克服自身性格缺陷，達成困難的理想或任務（Dancyger, 1991）。本片中以林青霞等三人飾演的主角，面對家人反對、長官磨難、自身健康等挑戰，必須以自身體能訓練、紀律操守、心理狀態改變來應對。最後，以主角們完成訓練成為女兵，參加光榮的閱兵大典作為圓滿結局。其中種種吸引觀眾目光的笑點通常集中於男女性別角色的衝突及女性身體放置於軍隊陽剛場域的矛盾之中。理髮一幕中，理髮師（明星陳今珮客串）幫女兵們剪髮，女兵捨不得自己的長髮而哭泣，主角馮碧桃在旁搞怪。此幕中女性因陰性象徵的長髮被剪去而難過，此番情境不僅在電影中幫助女性角色處理向陽剛氣質過渡的任務，同時也提醒觀眾注意傳統女性特質與軍隊男性規範的衝突。

而在另一場女兵基本操練的場景中，女性身體的不同再度成為逗樂觀眾的笑點來源。排長訓練時要求軍人抬頭挺胸，但總有人無法做到。因此，排長怒吼：「胸在哪裡？」這讓許多女兵當場笑出來，使排長更加生氣。排長

說的胸指的是生理身體上的胸膛，但引發笑點的卻是女性與男性不同，特別突出的女性性徵一胸。這種女性身體特質與男性軍人身體不同，並且引發帶有性色彩的笑點場景，並不只限於此處。在主角們前往參加實彈操作時，長官（明星方正客串）及他的部下，一群男性軍人，與女兵們的相處橋段同樣圍繞於性別話題的操作。方正要求部下們，「在女兵面前，你們要做出好的榜樣。要拿出精神，要像個男子漢大丈夫。在女兵面前，你們要大大方方…」他對部下強調的是作為榜樣，像個男人。針對遠道而來實習的女性軍人，他並不討論互相學習、競爭、兄弟情誼等軍人之間的袍澤之情，而是關注於以男性優越者姿態吸引女性目光。這些女兵與其說是以作為軍人的政治身體吸引他，實際上是以女性的女性身體奪取他的注意力。而這群軍人示範操作，卻在女兵面前害羞的橋段，成為引發觀眾捧腹大笑的笑料。觀眾看到男性阿兵哥色眯眯的眼光，觀看他們如何被女性軍人嫣然一笑迷得昏頭轉向，實砲射擊都失敗這種喜劇色彩的表現，以及對比之下女性軍人們合作無間、完美完成實彈射擊。這種顛覆傳統男強女弱，卻又強調女性身體的被慾望特質如何掩蓋其軍人政治身體並擾亂陽性軍隊秩序的安排，再度提醒觀眾，女性軍人在螢幕上被凝視強調的是其女性身體的表演性而非其軍人身體的政治性。

雖然《中國女兵》在劇中運用女性身體作為製造笑料的商業策略有其意義；然而，電影強調的大中國意象及愛國思想更有待女性軍人所象徵的政治身體及女性身體相結合，轉化為表演身體，完成宣傳國族認同的最終目標。這種確認犧牲個人身體的獨特性而為大國族身體的整一性貢獻的觀念也在強調軍人軍隊的一致性及紀律性中可窺一斑。這些女兵試圖透過軍人身體完成自我理想的投射，於自身建立一套等同於軍隊陽性身份的獎懲核可，規範並決定如巴特勒（1990）所言之陰性身份自我認同。這種對於軍人政治身份的歌頌讚揚可從電影主題曲《我願是個女兵》歌詞發現思想上的一致性：「不要小看我是一個小女孩。我有一個心願你來猜一猜…我要勇敢地奔向藍天，我要勇敢地征服大海。…我願是個女兵，跟我一起來」。⁵ 歌詞強調不要小看、勇敢、征服、一起來等，這些詞語形塑的是一個堅強勇敢的女性軍人形象。

⁵ 電影主題曲由江玲主唱，作曲左宏元、莊奴，作詞柯銅墻。歌曲收錄於1998年《歌林小百合精選輯12》

藉由如此果敢堅毅的軍人形象，女性彷彿突破傳統社會賦予女性的居家、溫柔的社會角色，獲得進入陽性場域 / 軍隊的權力。連長一番對新兵們的訓話也聽出軍隊對於軍人的要求基準為何，「各位穿了軍裝就是軍人。……現在我要送各位幾句話，請各位牢記在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忍人家所不願忍的氣，負人家所不肯負的責，冒人家所不敢冒的險。」

同時，服裝的統一性使個人的獨特性被初步掩蓋，軍裝象徵的國家集體形象時刻附身於穿著軍服的軍人之上。連長要求的是吃苦、忍氣、負責、冒險，這些行為都清楚標示軍人所負擔的責任與危險為何。從長官們的語言中可以了解她們對於女兵的期待並不與其他男性軍人有何差異。對軍人而言，重點在於軍人政治身體的任務，而非強調女性女性身體的脈絡。戴錦華（2006）在分析花木蘭代父從軍故事時的討論也可挪用來理解女兵概念，她提到傳統中國思想的「孝」便是「代父」的意義所在，由「孝」及「忠」，意指由「家」及「國」。木蘭故事中「國家興亡匹夫（匹婦）有責」的潛在「忠君」意涵，藉由電影形式，自然轉化為現代的國家民族認同。而這種女性犧牲自我而服膺家國思想的表現跟《中國女兵》的意識形態可謂一脈相承。

值得思考的是：即使溫靜怡等主角們驕傲自豪地選擇進入軍隊，這並不意味並確保她們能在軍隊這樣的男性環境中愉快生存。《中國女兵》中的女兵們與花木蘭不同的是，花木蘭身上負擔了女扮男裝的包袱，她必須將自己去性慾化（de-sexualized）以防堵她為軍隊引來的去勢焦慮（castration anxiety）（余君偉，2001）。而《中國女兵》中的女兵則不同，她們將自己的陰性特質作為承接國族要求的容器，並將自我的犧牲轉化為表演的身體。雖然兩者對於女性身體及性慾的處理態度看似截然不同，然而不能否認花木蘭及《中國女兵》面臨相同的挑戰：如何在男性體制中存在。花木蘭一旦被揭露女性身份，只能被驅逐離開軍隊。可以說，生理構造是女性的花木蘭，無法摧毀異性戀父權體制建構的男性價值與陽剛特質，她的命運就是永遠被趕離屬於男性的軍中社會（趙庭輝，2010）。而《中國女兵》相反的是將女性特質作為以此立基於男性軍隊的「賣點」，她們憑此獲得擠身陽剛軍隊的門票，卻以奉獻自身陰性特質作為被觀看的客體作為代價。

伍、結論

《中國女兵》憑藉著政治正確的影片類型與主題、知名巨星主演與諸多知名客串藝人、逗趣輕鬆的劇本語言，成為商業上極為賣座的文化產品。然而，電影中的女兵形象卻缺乏系統性的詮釋分析。女兵作為同時兼具女性身體，以及軍人政治身份的一員，她們投身於軍隊這種男性場域中的戲劇形象如何被描繪剪輯，正是此篇文章中所欲爬梳整理的。首先，經由剖析劇中的內容台詞，可以看出女性的身體如何藉由紀律的要求、服裝儀表的統一、及訓練的瑣碎仔細，來達成個人獨特性的抹除而完成軍隊整體性的塑造。軍人政治身體的鍛造成功成為這些女性自豪的另一層象徵。再者，國家利用收編這些女性的身體作為軍人的政治身體，使其自願的奉獻帶有忠君愛國的色彩，將女性身體轉化為表演身體，甚至壓倒性的成為國族主義璀璨的裝飾品。當這些女性個人身體加掛上軍人政治身體的名銜，而成為中華民國國族主義招兵買馬的表演身體時，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女兵究竟是追求個人獨立意識的成功典範，抑或算是國族認同養成之路上的慘淡養分。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余君偉（2001）。〈從樂府詩到迪士尼動畫：木蘭故事中的敘事、情慾和國族想像〉，《中外文學》，29.8: 38-69。
- 何定照譯（2006）。《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臺北：城邦文化。（原書 Young, I. M. [2005].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宋文偉、張慧芝譯（2003）。《性政治》。新店：桂冠圖書。（原書 Millett Kate. [1970]. *Sexual Politics*. Doubleday.）
- 吳佩芳（2019）。〈閱兵儀式與身體政治〉，《復興崗學報》，115：161-184。
- 吳怡靜（2019）。〈性別、勞動身體與國家：台灣商展小姐，1950s-1960s〉，張晉芬、陳美華編《工作的身體性：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演》，頁 3-58。高雄：巨流圖書。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原書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姚羽捷、邊明道（2014）。〈現代「花木蘭」＝體力＋美麗？從美國軍事電影中的女性角色省思女性軍人處境〉，《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6：133-137。
- 姚羽捷、邊明道（2017）。〈軍事題材電影中女性軍人角色研究—以 1980 至 2010 年好萊塢電影為例〉，《復興崗學報》，110：57-93。
- 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性別、認同與地方》。臺北：群學。（原書 McDowell, L. [1999]. *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陳儒修（2013）。《穿越幽暗鏡界—台灣電影百年思考》。臺北：書林。

- 陳玉慈譯（2010）。《衣裝的社會：衣裝與身體的意涵》。永和：韋伯文化。（原書 Corrigan, P. [2008]. *The Dressed Society: Clothing, the Body and Some Meanings of the World*. SAGE Publications Ltd）
- 黃金麟（2000）。《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
- 黃俊傑（2004）。〈中國古代思想史中的身體政治論〉，《東亞儒學史的新史觀》，頁 341-368。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焦雄屏（2018）。《映像台灣》。臺北：蓋亞。〈當前文藝政策案〉（1967 年 12 月 16 日）。《中央半月刊》，359-360：72-77。
- 葉龍彥（2017）。《圖解臺灣電影史》。臺中：晨星出版。
- 趙庭輝（2010）。《敘事電影與性別論述》。永和：Airiti Press。
- 戴錦華（2006）。《性別中國》。臺北：麥田出版。

英文部分

- Bhabha, H. K. (1990). *Nation and Narr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heng, F. W. (2003). *The “Wounded” Nation: Taiwan,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Identity*,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Institute for Women’s Studies,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 Dancyger, K. & Rush, J. (1991). *Alternative Scriptwriting: Writing Beyond the Rules*. Waltham: Focal Press.
- Haskell, M. (1987). *From Reverence to Rape: The Treatment of Women in the Mov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n, M. (1973). *Popcorn Venus: Women, Movie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 Stacie, F. R. & Bielby, D. D. (2009). Bombshells on Film: Women, Military Films, and Hegemonic Gender Ideologies, *Popular Communication*, 7(4), 208-224.
- Warner, M. (1985). *Monuments and Maidens: The Allegory of the Female Form*. London: Picador.

Yuval-Davis, N. & Anthias, F. (eds) (1989). *Women-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

報章雜誌及媒體資料

〈中國女兵昨天開鏡典禮宋總長親自主持〉(1981年6月19日)。《民生報》，7版。

〈中國女兵昨拍閱兵實景林青霞演戲秦祥林探班〉(1981年6月28日)。《民生報》，7版。

田文光（製作人），劉維斌（導演）（1981）。《中國女兵》【影片】。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K1E617itQ&t=16s>）

2023年「以哈衝突」爆發的必然性研究： 地緣政治因素與宗教因素的探討

楊嘉智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本文聚焦於 2023 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瑪斯）衝突中的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探討上述因素交錯糾纏造成衝突的持續與複雜化。地緣政治因素包括領土爭端、大國介入及地區權力博弈，而極端宗教教義進一步激化了矛盾。此外，以色列的屯墾活動與巴勒斯坦內部分裂了和平進程，且宗教極端主義及地區權力變化仍對和平前景構成挑戰。際此，呼籲國際社會重視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的綜合作用，並提出政策建議，為以哈衝突的和平解決創造有利條件。

關鍵字：以哈衝突、地緣政治、宗教極端主義、哈瑪斯、兩國方案

A Study on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2023 Israeli— Hamas Conflict: An Exploration of Ge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Chia-Chih Yang

Doctoral studen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KU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ge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Israel Palestine (Hamas) conflict in 2023 and explores how these intertwined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conflict's persistence and complexity. Geopolitical factors include territorial disputes, great powers interventions, and regional power games, while extremist religious doctrines further exacerbate the tensions. In addition, Israel's settlement activities and Palestine's internal divisions have undermined the peace process, while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shifts in regional power continue to pose challenges to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In this regard, we ur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give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combined impact of ge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and to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at foster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Israeli-Hamas conflict.

Keywords: Israeli-Hamas Conflict, Geopolitics, Religious Extremism, Hamas, Two-State Solution

壹、前言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簡稱以巴）之間的衝突是中東地區最為持久且複雜的國際衝突之一，已持續超過一個世紀。這場衝突的起源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期，猶太復國運動（Zionism）誕生，主張猶太人在聖經中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也就是當時的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這一運動促使大量猶太移民移居該地，引發了與當地阿拉伯居民的矛盾和對抗（Shafir, 1989; Chomsky & Pappé, 2015）。1920 至 1940 年代，英國作為託管國，管理「巴勒斯坦託管地」（Mandate of Palestine），但無法有效調解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1947 年，聯合國提出了一項分治計畫，建議將巴勒斯坦分為猶太國和阿拉伯國；此提案遭到阿拉伯國家拒絕，導致了 1948 年第一次以阿戰爭的爆發，以及無止境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之衝突（Segev, 2001; Gavish, 2005; Morris, 2008），在巴勒斯坦出現一塊土地，兩個民族的現象（Pappe, 2006）。

以色列建國後與周邊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多次戰爭，使得巴勒斯坦人失去了更多土地，並導致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這一歷史創傷和衝突的延續，使得雙方的立場愈加堅定；特別是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加薩地區和東耶路撒冷，這些地區成為了後來以巴談判中的核心問題；歷年來，雖然雙方曾進行多次和談，但一直無法達成持久的和平協議（Segev, 2001; Shafir, 2017）。2023 年爆發的以色列哈瑪斯衝突（以哈衝突），標誌著衝突再度升高，這次戰爭的起因既涉及長期以來的地緣政治對抗，也包括宗教背景下的爭端。宗教聖地的爭奪以及周邊國家和組織的介入，使得這場衝突更為複雜。

以巴衝突除了對於區域局勢的觀察，更涉及國際政治體系、宗教問題、恐怖主義等一系列問題全球性的挑戰。2023 年以哈戰爭的爆發再次提醒世人，這場持久且錯綜複雜的衝突尚未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東地區一直是世界大國爭取利益的核心地區之一，這場戰爭不僅影響了地區內的政治平衡，更擾動了整體國際秩序。美國、伊朗等國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各自推動自身的地緣戰略利益。同時，宗教因素在該地區的衝突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耶路撒冷作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

教三大宗教的聖地，使得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對該地的控制權爭奪亦因此產生區域擾動。從 20 世紀初期以來地緣政治格局變遷與宗教衝突的加劇，直至 2023 年以哈戰爭的全面爆發。

2023 年以哈戰爭的爆發原因，特別是地緣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具體而言，地緣政治因素包括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外國勢力的介入、黎凡特（Levant）地區國家戰略結盟等；宗教因素則包括猶太教、伊斯蘭教之間的聖地糾紛、宗教極端勢力的崛起以及宗教信仰對於政治決策的影響。

本文核心的研究問題：為何 2023 年以哈戰爭的爆發具有必然性？這場衝突中，地緣政治和宗教因素各自如何造就衝突升級？通過分析前述問題，不僅希望能夠深入理解 2023 年戰爭的具體原因，亦期揭示更廣泛的衝突背景，俾作為未來處理衝突提供參考的建議。

本文首先藉由文獻回顧理解以哈衝突的深層歷史背景，以及學者詮釋以巴衝突所運用的不同理論，藉以作為探索地緣政治和宗教在國家行為中的雙重作用；第二，回顧以巴衝突的具體歷史發展脈絡，以理解其歷史背景；第三，論述美國川普及拜登政府的中東以巴政策，以探究美國政府對以巴及以哈戰爭的影響；第四，分析 2023 年以哈戰爭的影響層面，以理解此戰爭的重要性；最後，以地緣政治及宗教因素論述此戰爭的必然性，並對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提出建設性建議。

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長期以來，以巴衝突是國際關係及中東地區問題專家關注之重點，本文獻回顧聚焦於地緣政治理論和宗教衝突理論，前者強調國家之間在地理空間上的競爭、資源爭奪及權力平衡；後者側重於宗教身份、信仰和教義對於政治行為的影響，另外檢視相關論著對以哈衝突的主要論點和理論解釋。

一、地緣政治理論視角

地緣政治理論中的「心臟地帶理論」，雖然最初用於解釋歐亞大陸的戰略重要性（Mackinder, 1904），但其核心思想—地理位置對國家戰略的影響—對理解中東衝突仍具有啟發意義，主張全球政治競爭的核心在於控制特定地理區域，特別是戰略資源豐富和交通樞紐的地帶。Cohen（2015）將中東地區定義為一個衝突帶，強調該地區複雜的地理環境與政治矛盾。以地緣政治理論主要的學派與論點影響對以哈衝突的理解，應該是現實主義學派，該學派認為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競爭場域，國家為了自身生存和安全而不斷追求權力平衡。Mearsheimer & Walt（2006）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分析了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認為這種支持非僅為追求國家之戰略利益，更有源於國內之政治因素，這一觀點強調了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複雜互動。Inbar（2009）則由以色列的戰略視角為主，強調地理因素對以色列安全政策的影響，認為以色列的領土狹小和戰略縱深不足，使其在制定安全政策時不得不採取積極防禦的姿態。

簡言之，（新）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理論強調地理位置決定了以巴衝突所涉及的國家生存利益，美國在中東地區略略利益及國內政治影響，以及衝突戰爭的高可能性。

二、宗教衝突理論

宗教衝突理論強調宗教信仰作為社會行為和政治決策的重要驅動力，宗教因素在以哈衝突中有著重要角色。Huntington（1993）指出，冷戰後世界將不再以意識形態或經濟競爭為主，而是轉向文明之間的衝突，強調理解宗教和文化在國際衝突中重要性，因宗教不同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對立，亦是形成衝突的重要因素。他將以阿衝突視為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一部分，突顯文化和宗教認同在衝突中的重要性。Juergensmeyer（2017）分析了宗教極端主義在當代衝突中產生的影響，將世俗衝突提升到宗教不容褻瀆的神聖戰爭，增大衝突張力與強度。Mayer（2013）強調各宗教對事務解釋切入點皆不相同，某些宗教之核心信仰態度可能構成暴力，解釋了極端信徒的非理

性行動。Fox & Sandler（2004）提出宗教在國際衝突中效應的分析，認為宗教可以藉由作為身份標記、意識形態來源、合法性來源，以及運用宗教機構的直接參與，以博取更大認同與支持等方式影響衝突。這架構為理解宗教在以哈衝突中的多重作用提供了有益的觀點。

三、以巴衝突的主要論點和理論

以巴衝突中，學者們提出了多種解釋和理論架構。Tessler（2009）強調了歷史敘事在塑造雙方認知和立場中的關鍵作用，認為雙方對歷史的不同解讀和對正義的不同詮釋，是導致衝突持續的根本原因之一。Khalidi（2020）以巴勒斯坦的視角，追溯了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起源和發展，認為外部力量，特別是英、美等大國，造成中東安全環境和衝突加劇的緣由，為衝突提供了後殖民主義的解讀架構。Gelvin（2014）從巴勒斯坦土地、民族主義文化、殖民與猶太復國主義、巴勒斯坦建國、以巴衝突與和平進程，闡述猶太復國與巴勒斯坦建國衝突的百年歷史。

Shlaim（2000）從以色列的戰略思維出發，認為以色列的強硬政策源於深層的不安全感和對阿拉伯世界的不信任，只有當以色列感到足夠安全時，才可能真正與巴勒斯坦達成和解。Halper（2021）認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屯墾區本身就是殖民，經由猶太復國建國的循環完成其殖民，進而解除殖民成立後殖民的民主猶太（以色列）國家。另外，論及宗教與民族主義交織引發之效應，Gorenberg（2011）分析了猶太教極右翼在以色列政治中的崛起及其對和平進程的影響。認為宗教民族主義的興起使得領土問題，不再僅僅是國家安全與戰略考慮，而是關乎信仰和身份認同的問題。Pappé（2006）的「種族屠殺」論點，以較激進的方式，解讀以色列的一切行徑，實質上是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屠殺，這觀點雖然備受爭議，但反映了部分學者對衝突根源的深層思考。

近年來，因應區域情勢的變化，以阿拉伯國家為首的陣營（如沙烏地阿拉伯）與以伊朗為首的陣營之間的角力尤為突出。這兩派勢力不僅反映了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也涉及對區域霸權的爭奪，亦是 2023 年以哈衝突的導因之一。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競爭根源於宗教派別與地緣政治利益的交織，

沙烏地阿拉伯作為遜尼派領袖，長期與什葉派主導的伊朗對抗，兩者在葉門、敘利亞與黎巴嫩等地通過代理人戰爭擴張影響力（Gause, 2023）。伊朗支持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包括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與葉門胡塞武裝，形成對抗以色列及美國盟友的網絡。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發動的「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據信獲得伊朗資金與技術支持，顯示其行動可能嵌入更廣泛的區域戰略（Levitt, 2023）。伊朗的支持為哈馬斯提供了行動能力，而阿拉伯國家的分裂反應則削弱了統一應對的能力（Hassan, 2023）。因此，2023 年以哈衝突可視為區域地緣政治博弈的縮影，而非單純的雙邊衝突。

Guzansky 和 Marshall（2020）分析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影響，認為這趨勢可能進而邊緣化巴勒斯坦問題。中東伊斯蘭信仰國家間的內部地緣政治長期受到宗教、歷史與權力競爭的影響，形成複雜的區域對抗格局，Baconi（2018; 2022）聚焦於哈馬斯的演進，探討其從抵抗運動向準政府組織的轉變過程，以及這轉變對以哈衝突的影響。

探究以哈衝突的研究文獻，地緣政治理論強調地理因素和戰略考慮在衝突中的重要性，宗教衝突理論則揭示了文化和身份認同在塑造衝突動態中的關鍵作用。具體應用於以哈衝突的研究中，從歷史脈絡敘事、民族主義、安全戰略、宗教極端主義等多個角度提出不同論述。這些研究共同構建了理論架構，得以理解以哈衝突的根源、動態和發展。

參、以哈衝突的歷史脈絡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涉及多重歷史因素，其根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並在 20 世紀的殖民地解放和雙方建國進程中不斷演變。依據具有重大意義之轉折節點，就衝突形成之因素，分析四個關鍵事件，探討各事件之堆疊形成兩造之間的對立及仇恨，終究釀成此次以色列與哈瑪斯之戰爭，並探討各時期提出「兩國方案」未能實現的原因，終究釀成此次以色列與哈瑪斯之嚴重衝突。

一、貝爾福宣言及其對以阿關係的影響

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於1917年11月2日，向猶太復國主義聯盟（Zionist Federation）發表了一份聲明，目的在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家園」。聲明中提到：「國王陛下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家園，並將盡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標。」表示英國政府視建立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園為有利，並將盡最大努力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Schneer, 2010; Mathew, 2013）。該宣言符合大英帝國的利益，特別是控制蘇伊士運河和確保巴勒斯坦緩衝區，避免受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鄂圖曼軍隊的潛在威脅（Cohen, 2014）。

貝爾福宣言如同揭開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民族衝突的歷史進程的序幕：首先，貝爾福宣言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持，使得全球猶太復國主義者受到極大地鼓舞；猶太人建國的期望因為得到大國的認可，這對於爭取全球猶太人的支持和鼓勵大規模移民巴勒斯坦至關重要。貝爾福宣言亦賦予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前所未有的合法性（Sachar, 2007），雖然宣言中承諾不得損害巴勒斯坦非猶太社群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但實際上並未充分考慮當地阿拉伯居民的政治訴求。由於貝爾福宣言成為英國在巴勒斯坦地區政策的基礎，致使大量猶太移民湧入該地區，引發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並加劇了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矛盾。

貝爾福宣言同時也埋下以哈衝突的種子，猶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區的移民急速增加，導致當地人口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統計顯示，1922年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口僅佔總人口的11%，然而到1947年已增至33%（Morris, 2008）。這種人口變化加劇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為後續的衝突埋下無法消弭的因素。

二、巴勒斯坦大起義（Thawrat Filastin al-Kubra）及影響

1936年至1939年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發動了針對英國統治和猶太移民的大規模起義，被稱為「巴勒斯坦大起義」。這次起義是巴勒斯坦阿拉伯

人對日益增長的猶太移民和英國巴勒斯坦託管地（Mandate of Palestine）政策的強烈抗爭（Kanafani, 1972; Norris, 2008）。

起義的直接導火線是阿拉伯人於 1935 年 10 月發現的一批走私軍火，認為是猶太人社區準備用來對付他們的。隨後一系列暴力事件迅速蔓延開來，此次起義共區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6-1937 年）主要訴求為罷工和抵制猶太商品，而第二階段（1937-1939 年）則演變為全面的武裝抗爭。起義的主要訴求包括「停止猶太移民、禁止猶太人購買巴勒斯坦土地、在巴勒斯坦建立獨立的阿拉伯政府」（Khalidi, 2006）。儘管起義持續了三年，最終被英國當局派遣了大量軍隊進行鎮壓，並利用猶太人組織的準軍事力量哈加拿（Haganah）和伊爾貢（Irgun）¹ 來維持秩序。英國政府一方面，派遣大量軍隊鎮壓起義，另一方面，他們也試圖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1937 年，英國派遣「皮爾委員會」（Peel Commission）² 調查衝突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案，「皮爾委員會」報告建議將巴勒斯坦分割為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這一建議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並導致起義進入更加暴力的第二階段（Segev, 2001）。

大起義的使得巴勒斯坦阿拉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據估計，起義期間約有 5,000 名巴勒斯坦人喪生，數千人被監禁及流放。其次，起義削弱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此舉在 1948 年的以阿戰爭中產生了負面效應（Khalidi, 2006）。對猶太社區而言，大起義促使他們加強了自衛能力的

¹ 哈加拿（Haganah）成立於 1920 年代，是猶太復國運動中最大的地下軍事武裝組織，任務主要致力於保護猶太屯墾區，在 20 世紀初的以巴衝突中逐漸發展壯大，後來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的核心；轄屬精銳武裝組織帕拉瑪赫（Palmach），亦包括飛行部門之航空勤務隊，日後成為以色列空軍的前身；伊爾貢（Irgun）於 1931 年從哈加拿分裂出來，被廣泛視為恐怖組織，曾策劃大衛王酒店爆炸案等恐怖襲擊及代爾亞辛村大屠殺等種族屠殺；組織於 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為政府所取締，因而改組為右翼主流政黨赫魯特黨（Herut），再演變為該國現在最大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Likud）（Hoffman, 2006）。

² 皮爾委員會是由羅伯特·皮爾勳爵（Sir Robert Peel, 2nd Baronet）領導的組織，於 1936 年由英國政府任命，負責調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騷亂的原因。1937 年 7 月，該委員會建議將託管地劃分為一個阿拉伯國家和一個猶太國家，但這一想法最終因不可行而於 1938 年被拒絕。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影響了聯合國第 181 號決議（1947 年），該決議同樣呼籲猶阿分治。皮爾委員會於 1937 年 7 月發表了報告，儘管英國政府最初接受了這些建議，但到了 1938 年，英政府認為這種劃分是不可行的，最終拒絕了該委員會的報告（Britannica, 2024）。

組建。以色列歷史學家 **Benny Morris** 指出：起義期間，猶太地下武裝組織「哈加拿」和「伊爾貢」的規模和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為後來建立以色列國防軍奠定了基礎（**Morris, 2008**）。大起義也改變了英國的政策取向，英國政府於 1939 年宣示限制猶太移民並承諾在十年內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這政策轉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阿拉伯人的訴求，但也激化英政府與猶太社群間之矛盾，使得猶太移民潮轉向美國（**Segev, 2001**）。

三、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處置方案

以色列於 1948 年建國後，中東局勢因多次戰爭而高度緊張，1967 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及東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數十萬人成為難民（**Shlaim, 2000**）。1973 年贖罪日戰爭後，阿拉伯國家在聯合國共同聲明對巴勒斯坦的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逐漸獲得國際承認。

1974 年 11 月 22 日，第 29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 3236 號決議「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處置」方案。這一決議標誌著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問題立場的重大轉變，奠定後續和平進程的基礎。決議的主要內容包括：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剝奪權利、包括自決權、民族獨立與主權的權利、以及返回家園的權利、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呼籲邀請巴解組織參與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所有討論（**United Nations, 1974**）。

1974 年，聯合國認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並獲得觀察員地位，為其參與聯合國談判奠定基礎以及日後和平進程奠定了國際法律架構（**Sayigh, 1997**）。此亦表明國際社會開始將巴勒斯坦問題視為一個國際性議題，而不僅僅是一個中東地區的衝突。然而，這一決議也引發了爭議，以色列和美國認為它忽視了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以色列和其盟友的強烈反對，以色列也拒絕接受撤出佔領區和巴勒斯坦難民回歸的要求，認為聯合國的這一決議本質上否定了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合法性，因為它暗示了巴勒斯坦難民有權返回以色列佔領之屯墾區（**Karsh, 2002; Kontorovich, 2017**）。儘管如此，1974 年的決議仍然對後續和平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它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參與國際談判墊腳石，也為「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 的形成提供了基礎概念。但實際發展至今，仍是以色列一國，而非兩國 (Lustick, 2019)。中東問題專家 William Quandt 提出：「書面所寫並不保證未來某些衝突會怎麼發展，但書面所寫對各方都是非常象徵性的重要的議題。」 (Quandt, 2005, 290)。

四、1993年奧斯陸協議 (Oslo Accords) 及其後續發展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中東和平進程的主導力量，推動直接談判，首先於 1991 年在馬德里舉行和平會議為以色列與巴解組織雙方對話奠基，但進展有限。1993 年簽署的奧斯陸協議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之間的歷史性和平協議，旨在解決長期衝突並推動巴勒斯坦自治。雙方於 1993 年 9 月 13 日在華盛頓簽署了「關於臨時自治安排的原則宣言」，亦稱為「奧斯陸協議」。這份協議被廣泛視為以巴和平進程的里程碑，它為巴勒斯坦人在加薩地區和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實現有限自治鋪平了道路。協議的核心內容包括：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國的生存權，以色列則承認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雙方同意在五年過渡期內逐步實現巴勒斯坦自治；關於耶路撒冷地位、猶太屯墾區、難民問題等敏感議題則推遲到最終地位談判中解決 (Shlaim, 2000)。奧斯陸協議的重大突破在於以色列和巴解組織的相互承認以及直接談判的開啟，談判過程中的關鍵因素包括保密性、談判環境、初始參與者的地位以及協力調解方的調解角色 (Kelman, 1997)。

協議簽署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於 1994 年成立，開始在加薩地區和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行使有限的自治權，但它並沒有解決耶路撒冷、難民和土地等問題，雙方之間仍存在根本分歧 (Shlaim, 2000)。奧斯陸協議的背景是西岸和加薩地區的土地爭端，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正式承認以色列國，而巴勒斯坦則要求在被佔領的加薩地區和約旦河西岸走廊建立自治政府 (Silpiah, Karomah, Rosanti and Ayuni, 2022)。然而協議實施過程未如前所願，以色列繼續在約旦河西岸擴建屯墾區，這被巴方視為違反協議精神。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發動的自殺式爆炸襲擊也嚴重損害了以色列公眾對和平進程的信心。以色列以「斬草除根」 (mowing the grass) 方式徹底嚇阻哈瑪斯的武力攻擊行動，反而適得其

反（Inbar & Shamir, 2022）；雙方種種脫序行為不儘令人質疑奧斯陸協議本質上是一個無交集的妥協，它沒有觸及巴勒斯坦問題的核心，反而使巴勒斯坦人陷入了更加仇視和分裂的境界（Said, 2000）。

2000 年 7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主持的大衛營（David Camp）峰會試圖就最終地位問題達成協議，但以失敗告終，同年 9 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標誌著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實質性崩潰。儘管如此，奧斯陸協議謀求以阿雙方和平上，仍然有許多重大突破。第一階段協議簽署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雖然權力有限，但仍是巴勒斯坦人自治的一種形式。協議明定的分區管理模式「A、B、C 區」³ 至今仍在約旦河西岸實行，儘管奧斯陸進程並未奏效，卻成為了任何未來解決方案都必須考慮的基礎（Pappe, 2006; Anziska, 2018）。

2014 年加薩戰爭後，巴勒斯坦經濟持續惡化，以色列長期的領土擴張政策以及對巴勒斯坦人的高壓統治，使巴勒斯坦人民生存權飽受迫害，遂於 2015 年 9 月爆發的巴勒斯坦民眾反抗以色列佔領的行動，史稱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義（Third Intifada）。儘管第三次大起義未形成前兩次起義的規模，但持續的暴力循環使巴以和平進程陷入僵局。2020 年美國推出「世紀協議」，計劃將約旦河西岸 30% 的土地劃歸以色列，並要求巴勒斯坦放棄耶路撒冷主權，遭到巴方堅決拒絕。以色列則加速吞併領土，2023 年批准在東耶路撒冷興建 4,000 套猶太人定居點，國際社會譴責其「破壞兩國方案」，也埋下哈瑪斯「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種子。

依照上述重大事件，劃分以巴衝突事件起始及至 2023 年以哈衝突，各個階段均代表象徵意義，貝爾福宣言揭開以巴衝突序幕、巴勒斯坦大起義的發生，意謂巴勒斯坦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運動，開始有組織的抵抗英國託管政府及猶太人，而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和平處置方案，代表國際社會開始重視巴勒斯坦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奧斯陸協議則代表以巴雙方願意正視當前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

³ 「奧斯陸協議」將巴勒斯坦西岸劃分為三個行政區：A 區 18%，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管理民事和安全事務；B 區 22%，PA 僅管理民事事務；以色列完全控制 C 區 60%。C 區包括所有以色列屯墾區和西岸三分之二的肥沃農地。[2] C 區是一片連續的領土，而 A 區和 B 區則被分割成 166 個獨立的飛地。儘管奧斯陸進程破裂，A、B 和 C 區至今仍然有效（Stein, 2002）。

歸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民族、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法塔、哈瑪斯間之衝突，問題之癥結在於土地、主權之爭取及巴勒斯坦民族之生存。以色列無意歸還歷次與周邊阿拉伯國家衝突後所奪取之土地；而原先居住巴勒斯坦之住民，因戰爭喪失的土地及自治權，加劇雙方原本因不同宗教便存在的敵對態度。巴勒斯坦方面，更不可能放棄原屬於自己的土地擁有、居住的權利與以色列妥協（Beilin, 1999）。雙方百年來之衝突，在微露解決曙光之奧斯陸協議後，因無法取得共識下告終，為後續 2023 年以哈衝突埋下哈瑪斯報復以色列之禍因。

肆、川普與拜登政府政策對以哈關係的影響

一、美國中東政策

美國在二戰後逐漸成為全球超級大國，其中東政策對該地區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Oren, 2007）。美國的中東政策主要圍繞著三個核心目標：確保石油供應、維護以色列安全、以及遏制蘇聯（後來是伊朗）的影響力（Khalidi, 2006; 2013; 2020）。1948 年以色列宣示建國後，美國成為第一個承認以色列國的國家，此後一直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美國也試圖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間保持平衡，以維護其在該地區的廣泛利益。換言之，美國的中東政策一直在支持以色列以及在阿拉伯國家保持良好關係之間尋求平衡（Hahn, 2004; Quandt, 2005）。在冷戰時期，美國的中東政策主要是遏制蘇聯的影響力，1957 年代，美艾森豪政府所施行之「艾森豪威爾主義」宣佈美國將保護中東國家免受共產主義威脅。此外，1970 年代的尼克森主義，則強調通過地區盟友（如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來維護美國利益（Lesch, 2007）。

以阿衝突中，美國一直居中扮演著調停者的角色，希望維持中東地區之穩定局勢。1978 年卡特（Jimmy Carter）總統促成了以色列與埃及政府簽署埃以和約（The Egypt-Israel peace treaty），1993 年柯林頓（Bill Clinton）政

府積極推動奧斯陸和平進程。911 事件後，反恐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試圖重塑中東政治格局。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則採取了相對克制的政策，強調外交和多邊主義，並試圖與伊朗達成核協議（Lynch, 2016），即使和平進程相當程度符合美國利益，也持續很久，但中東和平仍是歐巴馬的虛偽宗教信仰（Miller, 2010）。2017 年 5 月，哈瑪斯公布新憲章取代 1988 年的憲章，強調被佔領的人民有權以武力抵抗占領者，但立場已不復 1988 年憲章激進（Hamas Charter, 2017; Hroub, 2017）。直至川普總統任職期間，對中東政策實施大幅調整，尤其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並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亦種下以哈衝突之禍因（Elgindy, 2020）。

二、川普政府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及其影響

美國總統川普就任後對美國中東政策做大幅度調整，於 2017 年 12 月 6 日正式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於 2018 年 5 月將美國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這一決定打破了長達數十年的美國外交慣例，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議。川普這一決定實際上是履行了 1995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耶路撒冷使館法案」⁴。然而，為了免生事端，此前的歷任總統都以國家安全為由，推遲了該法案的執行。川普的決定不僅改變了美國的政策，也改變了美國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的角色定位，但在此進程中，以色列與哈瑪斯是相互需要以對方為敵作為政治訴求（Miller, 2019）。此決定立即引發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強烈反對，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宣佈，美國已經失去了中東和平進程調解人的資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美國代表被召回，法塔（Fatah）也拒絕與美國副總統彭斯會面（Thrall, 2021）。

⁴ 耶路撒冷大使館法（Jerusalem Embassy Act of 1995）是美國國會於 1995 年 10 月 23 日通過的法案，該法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國的首都，並要求耶路撒冷保持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城市。律定於 1999 年 5 月 31 日之前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儘管該法案獲得通過，仍允許總統援引六個月的法律適用豁免，並以「國家安全」為由每六個月重新發布一次豁免。柯林頓、布希和歐巴馬總統多次重申了這項豁免，川普總統於 2017 年 6 月簽署棄權書。

國際社會對美國的決定亦多有批判，2017 年 12 月 21 日，聯合國大會以 128 票贊成、9 票反對、35 票棄權的結果通過決議，宣佈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決定無效（United Nations, 2017）。然而，以色列方面認定這是一個外交勝利，以色列總理納坦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稱讚美國聲明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川普的決定雖然強化了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主權主張，但是對於未來的和平談判將造成影響並增加變數（Inbar, 2020）。就此決定的長期影響而言，它不僅改變了美國在以巴衝突中的立場，更可能影響未來的和平談判，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實際上否定了巴勒斯坦人對東耶路撒冷的主權訴求，這可能使兩國方案更加難以實現（Khalidi, 2020）。

三、川普政府承認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的主權

美國國務卿 Mike Pompeo 於 2019 年 11 月 18 日宣佈，美國政府不再將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立的屯墾區視為違反國際法（Hansler, Gaouette, and Diamond, 2019）。這一聲明推翻了 1978 年卡特政府時期確立的美國政策立場，也與聯合國安理會 1979 年第 446 號決議相悖。川普政府的這一決定被廣泛解讀為對以色列佔領政策的認可；而巴勒斯坦方面則強烈譴責，表示此一決定完全違反國際法（Halbfinger, 2019）。美國的立場轉變對國際法秩序產生了衝擊，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以色列在被佔領土上建立屯墾區違反了 1949 年日內瓦公約。

美國的這一政策轉變儼如關閉和平談判之門，使得以巴和平進程更是遙遙無期。美國承認巴勒斯坦地區約旦河西岸屯墾區主權，意謂贊同以色列的屯墾區擴張政策，加強以色列右翼政府繼續擴建屯墾區的決心，完全無視巴勒斯坦的領土回歸訴求（Kacowicz, 2020）。這一決定嚴重損害了美國作為中立調停者的公信力，使得美國儼然從和平進程的調解人變成了以色列佔領的合作者（Erekat, 2020），造成整個阿拉伯世界均發出反對聲浪，導致美國在未來的和平談判中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

四、川普政府「中東和平計畫」及其爭議

川普政府於 2020 年 1 月 28 日，公佈了自訂名稱為「實現和平的繁榮：改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生活的願景」（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的「中東和平計畫」，目的在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長達數十年的衝突。這份長達 181 頁的檔雖然也提出了「兩國方案」，但其內容和提出方式都引發了巨大爭議。該計畫的主要內容包括：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允許以色列兼併約旦河谷和西岸大部分猶太屯墾區，允許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權，但要求他們承認以色列為猶太國，並放棄對東耶路撒冷的主權要求以及解除哈馬斯武裝等（The White House, 2020）。

川普政府聲稱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但它立即遭到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全面拒絕。巴勒斯坦不認為這是和平計畫，而是以色列佔領的永久化計畫；，阿拉伯國家聯盟也不認同這計畫，國際社會對此計畫的反應也大多是負面的（Erlanger & Halbfinger, 2020）。儘管這個計畫存在明顯缺陷，但它可能改變以巴衝突的討論架構，儘管計畫本身不太可能實現，但它可能會推動以色列社會重新思考佔領問題（Goodman, 2020, 78）。

美國處理以巴衝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主要是顧及在中東地區的利益，以保障能源供應、維護區域穩定以及遏制潛在的敵對勢力為考量。美國一直把保護以色列安全作為其中東戰略的核心（唐志超，2024），將以色列視為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一方面藉以應對伊朗等地區對手的威脅。這個戰略聯盟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軍事合作和經濟聯繫為基礎，米爾斯海默認為這些對於美國維護地區穩定和影響力的利益至關重要（Katulis, 2024），這一戰略選擇，部分是由於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位置，以及其作為民主政體和美國盟友的戰略價值，亦考量美國在中東的霸權維護，透過支持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尋求有力的支撐點。

此外，2016 年川普執政後以巴問題上一面倒的傾向以色列，除了能源經濟利益等地緣戰略利益外，美國國內政治利益遊說團體，如「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在美國政治中具有重要影響力，以及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堅定地支持以色列，均驅使美國政

府之中東政策偏頗傾向以色列，加重位於加薩地區之哈瑪斯對以色列與美國的仇視（Hanifa, 2020）。

伍、2023年哈馬斯「阿克薩洪水行動」分析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起了代號為「阿克薩洪水行動」對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哈馬斯的準武裝組織卡桑旅（Ezzedeen Al-Qassam Brigades, EQB），在軍事戰力比與以色列國防軍完全懸殊的狀況下，仍造成以色列重大損失及傷亡，使得此次以哈衝突事件迅速躍升為全球關注之重點。哈馬斯成立之歷史、政治立場、此次行動的背景和動機、哈馬斯的戰略考量及其對以色列的戰爭攻擊，以及這次行動對以哈關係造成的影響，實值吾人深入瞭解進行分析。

一、哈馬斯組織的歷史和政治立場

哈馬斯（Hamas）又名伊斯蘭抵抗運動（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其前身起源於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會，為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運動分支之一（Mishal & Sela, 2006）。哈馬斯的政治立場主要體現在其1988年發表的「哈馬斯憲章」（Hamas Charter 1988）中，該憲章明確表示巴勒斯坦土地是伊斯蘭教產，不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權（Hroub, 2017）。

哈馬斯領導階層以宗教、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為由拒絕與以色列談和。主張通過聖戰收復整個巴勒斯坦土地。哈馬斯的組織結構包括政治局和軍事部門（卡桑旅）。政治局負責制定政策和對外交涉，而軍事部門則負責執行軍事行動。2007年哈瑪斯與法塔之「加薩之戰」⁵後，哈瑪斯實際控制加薩地

⁵ 法塔和哈馬斯於2007年6月10-15日在加薩地區發生內戰，主因是法塔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選舉中失利後的權力鬥爭。這場戰爭導致團結政府解散，巴勒斯坦領土實際上分為兩個實體，由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治理的西岸，以及由哈馬斯（Hamas）治理的加薩地帶。哈馬斯控制了加薩地帶，位於加薩之法塔官員則被當作囚犯處決或驅逐出境，在戰鬥中至少有161人死亡，700多人受傷（Levitt, 2008; Margolin & Levitt 2023）。

區，在加薩地區施行統治，並通過武力手段驅逐了法塔組織（Milton-Edwards & Farrell, 2010, 121）。

法塔退守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分裂成兩大陣營。此後，雙方多次嘗試和解，如 2011 年開羅協議與 2017 年團結政府談判，但因權力分配與政策分歧屢告失敗（Milton-Edwards & Farrell, 2010）。法塔未參與 2023 年恐攻行動，主要可歸因於戰略目標與政治立場的差異，而法塔則避免捲入可能引發全面戰爭的舉動。首先，法塔赫領導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長期依賴國際支持，特別是美國與歐盟的資金援助，參與武裝衝突將危及其合法性與經濟來源（Zanotti, 2023），哈馬斯的單邊行動未事先協調，反映其獨立決策傾向。且由於兩派彼此不信任，持續影響巴勒斯坦內部凝聚力，法塔赫與哈馬斯在對以色列政策上明顯分歧，法塔赫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主張通過談判實現兩國方案，反對無計劃的軍事冒險；哈馬斯則視武裝鬥爭為核心策略，2023 年攻擊旨在提升其國內外影響力（Hassan, 2023）。此外，法塔赫擔憂哈馬斯成功可能削弱其在巴勒斯坦內部的領導地位，尤其在加薩失控後，其影響已受限。

在意識形態上，哈馬斯結合了伊斯蘭主義和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它強調伊斯蘭價值觀，同時也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這種意識形態使其在巴勒斯坦民眾中獲得了相當的支持，在巴勒斯坦社會中具有廣泛的吸引力（Hroub, 2010, 89）。然而，礙於現實環境之壓力並隨著時間推移，哈馬斯的立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調整，並於 2017 年發布了新的政策檔，表示雖然仍然不承認以色列，但願意接受以 1967 年邊界為基礎建立巴勒斯坦國（Levitt, 2008; Margolin & Levitt 2023）。

然而，哈馬斯的政治立場和行動方式也招致了國際社會的批評和制裁，許多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將哈馬斯列為恐怖組織。自 1990 年起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上發動了多次反以色列襲擊，包括針對以色列平民目標的大規模爆破、小型武器攻擊、簡易爆炸物（IED）和火箭攻擊。美國政府將哈馬斯列為外國恐怖組織（US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2014），此舉極大地限制了哈馬斯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空間，也加深了對美國與以色列的仇恨。

二、「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目的和動機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發動了代號為「阿克薩洪水行動」的恐怖攻擊，其目的與動機具有多個面向。首先是土地爭議的抗爭，法塔與哈瑪斯一直以來要求以色列解除河西走廊與加薩地區的封鎖作為重要訴求。埃及視哈馬斯為潛在威脅，因其為被視為非法組織之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之分支，哈馬斯控制加薩後，與西奈半島的激進團體（如西奈省組織，後隸屬 ISIS）聯繫加深，走私武器與進行恐怖活動（Pelhem 2011，24-29）。埃及擔憂哈馬斯支持西奈叛亂，威脅其內部安全，封鎖成為遏制此風險的手段。自 2007 年哈馬斯控制加薩地區以來，以色列便聯合埃及對加薩地區實施嚴格的封鎖，對當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嚴重影響。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的報告顯示，加薩地區的失業率高達 45%，而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是高達 60%（OCHA, 2023），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加劇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滿情緒。

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爭議事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阿克薩清真寺問題一直是巴以衝突的核心之一，以色列極右翼團體多次試圖改變阿克薩清真寺的現狀，引發了巴勒斯坦人的強烈不滿。2023 年 4 月以色列警方於齋戒月強登耶路撒冷聖殿山（Temple Mount），驅離於阿克薩清真寺聚集之巴勒斯坦民眾，雙方發生嚴重衝突，顯示以色列當局並不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之宗教信仰，哈瑪斯亦宣稱此為攻擊行動之主要原因之一（Raja, 2023）。

哈瑪斯亦計畫藉由「阿克薩洪水行動」打破現狀，挽救巴勒斯坦問題逐漸邊緣化之窘狀，迫使國際社會重新關注巴勒斯坦問題。同時藉由此次行動，強化其在巴勒斯坦內部領導地位，特別是爭取西岸的巴勒斯坦民眾的支持。另外中東地區近年來的局勢變化，特別是部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趨勢，亦促使哈馬斯採取更激進的行動。

三、「阿克薩洪水行動」戰術體現意涵

- （一）無預警發動攻擊造成震撼效果，哈馬斯選擇在以色列重要節日期間發動攻擊，利用以色列防備疏失，大舉進攻以色列屯墾區，使以色列邊防部隊反應不及，造成慘重損失。不僅造成以色列國內震撼，國際上亦對哈瑪斯之行動覺得不可思議。
- （二）多維度作戰模式展現，哈馬斯同時使用火箭彈、地面部隊、水面部隊和無人機，異地同時發起攻擊，顯示出其作戰能力的提升和戰術的多樣化，充分發揮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 Warfare**）之精神，相對以色列高科技優勢武器系統，竟遭哈瑪斯以遊擊戰戰術攻克，顯示哈馬斯這次展示的作戰能力遠超過以往，這對以色列的防禦系統提出了嚴峻挑戰。
- （三）此次行動哈瑪斯襲擊平民並劫持人質，試圖對以色列社會造成巨大的心理衝擊，雖然在道德和法律上都受到譴責，但確實對以色列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影響。

哈瑪斯在此次行動中結合多項游擊戰及特種作戰之戰術，無預警襲擊以色列重要設施，皆能產生短暫戰果，不啻達成其作戰目標，亦顯示其準武裝旅具備之戰力。此次行動暴露了以色列安全與情報體系的嚴重漏洞，以色列民眾對長期以來信任屯墾區之安全亦產生疑慮，歷經此次血的教訓，以色列必須嚴加檢討各項防治與反制措施。不過，哈馬斯的這種戰略也帶來了巨大風險，以色列隨即宣佈全國進入戰爭狀態，並對加薩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無差別轟炸，並發動了地面攻擊，造成了加薩地區大量平民傷亡，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指出，雙方的行為構成戰爭罪（**Human Rights Watch, 2023**）；2024年11月21日，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甚至對以色列納坦雅胡總理及前國防部長加蘭特（**Yoav Gallant**）發布戰爭罪犯通緝逮捕令（**Gritten, 2024**）。

四、哈馬斯地緣政治盤算

分析此次以哈衝突，以結合實際情況，從區域安全角度探討以哈戰爭造成之地區擾動。首先，這次行動重新凸顯了巴勒斯坦問題在中東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近年來，隨著「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⁶ 的簽署，參與簽署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關係逐步趨向和解締交之關係邁進，進而形成巴勒斯坦問題幾近邊緣化之窘境（Fakhro, 2024）。此次衝突迫使國際社會重新關注這一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無論用任何方式，外交或軍事方式，只要巴勒斯坦問題不解決，中東地區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和平與穩定。

2002 年由利比亞媒體稱述，伊朗結合哈瑪斯、真主黨與胡賽武裝部隊等代理人，建立代理網絡形成反美國與以色列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Anderson, 2020）。伊朗作為哈馬斯的主要支持者，如果「抵抗軸心」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便使伊朗能夠調整其戰略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地區動態。而憂心區域動態轉向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正常化，置哈馬斯於革命衛隊的指導下，既符合對抗以色列的戰略，改變了哈馬斯與以色列衝突的平衡，雖不足以撼動以色列的軍事優勢，但已經顯示了伊朗在區域權力動態中的影響力作用（Sara, 2024）。即使伊朗無法威脅以色列的軍事攻擊迦薩、黎巴嫩及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甚至以哈衝突仍未停止，哈瑪斯或是巴勒斯坦的未來是悲觀的，但哈瑪斯依然會是抵抗以色列佔領的哈瑪斯。

此次衝突對「亞伯拉罕協議」架構下的以阿關係正常化進程產生了負面影響，雖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等國並未完全放棄與以色列的和平協議，但這次衝突無疑增加了這一進程的不確定性，或許哈瑪斯的行動正是要延緩或逆轉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⁶ 《亞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分別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於 2020 年 9 月簽署的阿以正常化的雙邊協議。協議中論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巴林都承認以色列的主權，從而能夠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初步協議標誌著自 1994 年以色列-約旦和平條約生效以來，以色列首次與阿拉伯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亞伯拉罕協議以突顯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對先知亞伯拉罕的共同信仰而命名 2020 年 10 月 23 日，以色列和蘇丹同意實現關係正常化，協議簽署之後 2021 年 1 月 6 日，蘇丹政府在喀土木簽署《亞伯拉罕協議宣言》。2020 年 12 月 22 日，以色列與摩洛哥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作為摩洛哥承認以色列主權的交換條件，美國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的主權（Fakhro, 2024）。

最後，此次攻擊行動迅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使得巴勒斯坦問題重新受到國際社會關注，亦是哈馬斯重要戰略目標。這次衝突也引發了全球範圍內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討論和抗議活動，凸顯了這一問題在國際政治中的持續重要性。從紐約到倫敦，從巴黎到開羅，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的示威此起彼伏，反映了這一問題的全球影響力，然而儘管哈馬斯可能有多重動機，但這種極端暴力行為不僅違反國際法，也可能最終損害巴勒斯坦人的利益（Byman, 2023）。

陸、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的交織

地緣政治因素可定義為國家利益、領土控制及區域權力動態，宗教因素則涵蓋信仰體系與身份認同（陸大道，2013）。兩者交織不僅塑造了衝突的動態，也加劇了其不可避免性。2023年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於10月7日爆發，哈馬斯對以色列南部發起前所未有的攻擊，這場衝突不能僅視為過往雙方小規模衝突或報復性打擊等直接觸發因素。地緣政治因素與宗教因素在2023年以哈衝突中交織作用，成為理解其爆發必然性的關鍵。深探其必然性，可歸因於長久以來塑造中東格局的地緣政治催化劑和宗教行為者動態的複雜相互作用。中東地區不斷變化的地區權力格局、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策略以及宗教身份的激化，共同促成了這場衝突。這場戰爭反映了地緣政治戰略運用和以色列與哈馬斯內部政治因素對宗教敘事的工具化所加劇的結構性緊張局勢，以耶路撒冷為例，聖城的爭議既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亦是宗教情感的引爆點，此次哈馬斯發動的攻擊即凸顯此特性（Hassan, 2023）。

研究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的相互作用，對解析2023年衝突的深層原因至關重要。地緣政治學者指出，區域聯盟（如伊朗支持哈馬斯）與宗教團結相輔相成，而宗教極端主義則為衝突火上澆油（Gause, 2023）。若忽略此交織，將難以全面理解衝突的複雜性及其對和平進程的影響。本節旨在探討此現象，揭示其如何促成衝突的必然性。

一、地緣政治因素在以哈衝突中的角色

以色列與哈瑪斯衝突根源，除領土的爭端、宗教信仰的分歧外，地緣政治因素如區域安全、大國的干預以及政治勢力的博弈，亦成為這場衝突的因素。就地緣政治原則而言，國家安全與戰略利益對國家行為有著重要影響，以色列位於中東的心臟地帶，其安全和領土完整受到周邊國家的密切關注。以色列建國後，周邊阿拉伯國家隨即對以色列發起武力攻擊，促使以色列除還擊外更積極建立安全防護措施，並將巴勒斯坦人民圈居拘束於河西走廊擊加薩地區，造成雙方不可勝數的大小衝突。因此，巴勒斯坦地區情勢穩定，對以色列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更是中東地區區域安全穩定的基石。

美國藉由大力支持以色列作為其在中東地區之支撐，俾利對中東地區自然資源及地區戰略利益的掌控；美國在軍事、經濟和外交領域援助以色列，使得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衝突中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以保持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亦是美國針對伊朗建立之「抵抗軸心」相抗衡之重要助力（李睿恒，2024）。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背後，既有其在中東地區保持影響力的需求，也與美國國內政治力量支持以色列有關，如今敘利亞反抗軍成功獲取政權，以色列又趁機佔領兩國邊界緩衝區的戈蘭高地制高點黑門山（Mount Hermon），勢將引起敘利亞新政府的抗議與要求以色列撤軍歸還領土。美國政府如何因應此新變局，更會是影響以哈戰爭延續或結束的關鍵。

另一方面，伊朗作為地緣政治催化劑的角色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動態，哈瑪斯獲得伊朗和土耳其等伊斯蘭國家的支持，特別是伊朗一直積極援助哈瑪斯，提供資金和武器，來削弱以色列和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Smith, 2023）。伊朗作為什葉派主導的國家，卻支持遜尼派的哈馬斯，顯示其行動不顧教派分界與限制，只看重地緣政治目標之達成。伊朗對哈馬斯的支援除了削弱以色列之外，並挑戰以沙烏地為首的遜尼派阿拉伯陣營，這一聯繫不僅凸顯中東內部的複雜性，也反映教派矛盾如何被權力競爭所利用。伊朗對哈瑪斯的支援顯示出中東地區伊斯蘭教派內部矛盾與地緣政治博弈間的緊密聯繫；此外，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如卡達（Qatar）也在財政上資助哈瑪斯，反映出中東國家在地緣政治格局中的複雜態度，亦顯示地緣政治博弈如何利用教派工具，將哈馬斯變成伊朗對抗西方與遜尼派競爭者的棋子。

此次哈瑪斯恐怖攻擊，部分原因係伊朗和哈馬斯恐怕美國積極促成之「亞伯拉罕協議」完成後，將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聯盟環，控制荷姆茲海峽、蘇伊士運河等海上咽喉要道，將使伊朗有限制在大陸範圍內（Sciman, 2023）；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議題勢必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犧牲品，其在地區穩定和國際談判中的角色亦將被削弱（Salem, 2005; Margolin & Levitt 2023; Fakhro, 2024）。

二、宗教因素在以哈衝突中的作用

宗教在以哈衝突對立加重以哈衝突發生的必然性，舉以哈雙方均奉為宗教聖地的聖城耶路撒冷為例：對於猶太人而言，耶路撒冷是歷史與信仰的核心，而對於穆斯林來說，神聖的聖殿如阿克薩清真寺則象徵著宗教與民族認同。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的影響根深蒂固，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均奉為國教，也被用作反對猶太人和西方的精神象徵。而以色列極端宗教之錫安主義者，執著於信仰教條，堅決反对接納阿拉伯人，甚至與左派猶太人為敵的態度（Lynch, 2018），宗教情感在衝突中的持續性使得雙方在談判桌上難以妥協。

宗教意識形態除了加強哈瑪斯代理人衝突動力，亦受廣大巴勒斯坦群眾支持。哈馬斯將自身定位為伊斯蘭抵抗運動，將與以色列的戰鬥，視為宗教聖戰。在其憲章中更將土地，列為伊斯蘭黨產，誓言以消滅以色列討回黨產為所有信徒之終身職志（Levitt, 2008）。哈馬斯乃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以明確的伊斯蘭教義構建此次恐怖攻擊之合理性，將 10 月 7 日的襲擊描述為保護阿克薩清真寺免受以色列侵犯的行為（Rabbani, 2023）。這種敘事援引耶路撒冷聖地的神聖性，引發巴勒斯坦人和更廣泛的穆斯林選民的共鳴，將領土爭端轉變為宗教聖戰。襲擊的時間恰逢 1973 年贖罪日戰爭 50 週年，具有象徵意義，加強了哈馬斯聲稱在抵抗猶太復國主義方面的歷史連續性。在以色列方面，錫安主義狂熱分子宣導基於對猶大和撒馬利亞（約旦河西岸）的聖經主張的大以色列救世主願景，作為擴大定居點等激進政策的正當理由，也因此形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長久以來的敵對狀態，甚至信奉錫安主義的內閣部長例如國家安全部長 Itamar Ben Gvir 造訪阿克薩清真寺，引起約旦河哈瑪斯抗議是挑釁（Rabbani et al., 2024）。

關鍵是，地緣政治與宗教的交匯挑戰了簡單化的敘事。哈馬斯的攻擊不僅僅是其支持者所稱的對以色列「暴行」的反應，以色列的回應也不僅僅是其政府所聲稱的對恐怖主義的防禦。相反，雙方都利用地緣政治機遇和宗教熱情來推進自己的議程，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這場戰爭在區域內的迴響，緊張了以色列與埃及和約旦的關係，使沙特的關係正常化進程脫軌，並鼓舞了伊朗，強調了它作為更廣泛力量的產物的必然性。甚至中國的謹慎立場，即通過其全球安全倡議尋求調解，也反映了這場衝突在全球權力鬥爭中的糾纏。

以哈雙方競相以宗教敘事作為支持之訴求，形成了惡性循環：以色列國內極端宗教錫安主義者，自認為是猶太國家發展的守護者，堅持宗教立國，堅守教義完全不對阿拉伯人作任何讓步，而哈馬斯的伊斯蘭主義言論使其襲擊合法化，而以色列的則以這種威脅為藉口來鞏固他們的強硬立場，使得難見妥協之日。

三、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的相互作用

地緣政治與宗教如何相互影響，造成以色列和哈瑪斯之間的衝突，亦是本文探討重點。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相互交織，形成了復雜的關係網。以色列的安全政策往往不僅考慮軍事和經濟因素，還必須考量宗教情感的影響。例如，在以色列政府對約旦河西岸的政策中，宗教信仰常常轉化為對信念得以支持行動的驅動力。任何對宗教聖地的改變都將引發強烈反應，甚至可能導致廣泛的暴力升級（Mishal & Sela, 2006; Gunning, 2007）。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之間相互交織，也影響了雙方的策略和行動。受到地緣政治現實所迫，以色列政策制訂必須以國家安全為首要考量，例如保持中東地區的軍事優勢以及阻止伊朗在該地區擴張影響力，這戰略考量需要與其國內的宗教勢力相協調。以色列內部的宗教保守派對政府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施加了極大的壓力，特別是在擴大猶太人屯墾區及屯墾區問題上，這些行動往往加劇了與巴勒斯坦及哈瑪斯的對立，尤其是強烈以武力反抗以色列的哈瑪斯（Heller & Nusseibeh, 1991; Baconi, 2018; 2022）。而哈瑪斯的宗教意識形態與其地緣政治策略也密不可分，哈瑪斯以宗教信仰為旗幟，但其與伊朗等國的聯繫顯

示了其實際上是在利用宗教作為地緣政治工具，來增強其在巴勒斯坦的統治地位並挑戰法塔的世俗統治。

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的相互作用，不僅影響了以色列和哈瑪斯的直接衝突，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更廣泛的政治和宗教運動。以色列與哈瑪斯的戰爭引發全球範圍內的穆斯林社區抗議，尤其是在歐洲和北美，這些地區的穆斯林社群通過遊行、集會以及支持巴勒斯坦運動，對所在國的政策形成壓力。反之，以色列也在全球範圍內尋求猶太社區的支持，特別是在美國，這些力量影響著西方國家的中東政策（Alsoos, 2021; Margolin & Levitt 2023; Fakhro, 2024）。

宗教領袖的聲音在政治決策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他們的討論往往影響民意，進而影響政府行為，使得宗教和地緣政治的關係更加緊密。這一現象在哈馬斯的動員中尤為明顯，其利用宗教理念來增強支持者的凝聚力（Milton-Edwards & Farrell, 2010; Milton-Edwards, 2014）。

在以哈衝突的複雜背景下，地緣政治與宗教因素的交織構成了衝突發展的核心。地緣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衝突雙方的行動策略，而宗教則在情感與認同上加深了彼此的對立。這兩者的相互作用不僅影響當前的現實，更在未來和平進程的推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未來的衝突走向難以預測，衝突解決中同時處理地緣政治與宗教維度的挑戰極大。雙方對聖地的敏感性根深蒂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將耶路撒冷視為不可妥協的核心，宗教敘事則固化立場，阻礙談判（Armstrong, 1996）。極端主義團體的影響使和平進程易被破壞，2023 年衝突即顯示出宗教激情如何壓倒理性對話，和平前景黯淡。

總之，2023 年以色列與哈瑪斯的衝突並非異常現象，而是長期醞釀的地緣政治催化劑和宗教行為者動態的高潮。中東聯盟的重新調整、以色列的內部激進化以及宗教身份的相互武器化，造成了雙方無法挽回的悲劇。關於以哈關係的進一步研究必須重視這兩方面的動態交互。透過對於歷史、文化與權力關係的深入分析，有助於各方更好地理解對方的立場與期待，從而創造出新的對話平臺，促進和平的可能性。

柒、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2023 年以哈戰爭的爆發乃長期歷史矛盾積累的必然結果，從貝爾福宣言到奧斯陸協議，歷次和平方案的失敗都在積累衝突的潛在因素。特別是「兩國方案」的持續失敗，導致巴勒斯坦人對和平進程徹底失去信心，為暴力衝突埋下深層隱患。尤其川普政府時期的中東政策轉向，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承認約旦河西岸屯墾區主權等決策，實質上打破了地區政治平衡，加劇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滿情緒。

以哈戰爭仍是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為主，區域大國的權力競爭加劇了衝突的複雜性，哈馬斯的行動是地緣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其背後得到了伊朗、土耳其等國家的支持，並利用了宗教因素來動員群眾，強化其對抗以色列的正當性；另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進程刺激了極端組織的反彈。更根本的是因對立的宗教信仰造成耶路撒冷聖地爭議累積而成持續加劇的雙方矛盾，可見宗教認同加劇雙方對立立場，宗教極端主義轉變的意識形態，亦為暴力行為提供了強大的力量；宗教因素雖非直接導火索，但在衝突的持續和累積的力量亦不容小覷。

基於本文的發現，為減緩以哈衝突並促進地區穩定，建議推動多邊對話，重啟和平進程，鼓勵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人回到談判桌前，重新審視「兩國方案」並研擬兩個可行務實之替代方案。

一、解決核心領土與宗教爭議

務實的建立國際監督的跨信仰管理機制，確保各方權益，但這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放棄部分主權主張，實現共管。此外，1967 年邊界的重新劃定與定居點撤離是談判基礎，否則領土衝突將持續引發暴力（Shlaim, 2000）。

二、經濟重建與社會穩定

經濟困境與青年失業是極端主義的溫床，加薩的人道危機造成哈瑪斯官逼民反（Zanotti, 2023），和平的前提包括解除封鎖、重建基礎設施並促進區

域經濟合作。國際援助與投資可降低民眾對激進團體的支持，但需以色列放寬限制，並與阿拉伯國家協調實施。

另外建議美國深刻檢視並調整中東的政策，摒棄過往獨利以色列的作法，推動更為平衡的中東外交戰略。並且促進宗教間的對話與和解，增加社會的包容與諒解，尋求實質之巴勒斯坦和平之道。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李睿恒（2024）。〈中東“抵抗軸心”的興起及前景〉，《現代國際關係》，4:60-75。
- 唐志超（2024）。〈美國的中東戰略調整：環境塑造與秩序重建〉，《西亞非洲》，2:3-23。
- 陸大道、杜德斌。（2013）。〈關於加強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研究的思考〉，《地理學報》，68（6）：723-727。

二、英文

- Alsoos, I. (2021). From jihad to resistance: The evolution of hamas's discourse in the framework of mobiliz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7(5), 833-856.
- Anderson, T. (2020). *Axis of resistance: Towards an independent middle east*. Atlantan,GA: Clarity Press, Inc.
- Anziska, S. (2018). *Preventing palestine: A political history from camp david to osl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mstrong, K. (1996). *Jerusalem: One city, three faiths*. New York,NY: Alfred A. Knopf.
- Baconi, T. (2018). *Hamas contained: The rise and pacification of palestinian resist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coni, T. (2022). *Hamas contained: A history of palestinian resist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ilin, Y. (1999). *Touching peace: From the oslo accord to a final agreement*. London, UK: Weidenfeld & Nicolson.
- Britannica,(2024). Peel commission. Retrieved from Britannica Web site: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Peel-Commission>

- Byman, D. (2023). *Why hamas attacked when it di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Chomsky, N., & Pappé, I. (2015). *On palestine*. 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
- Cohen, M. (2014). *Britain's moment in palestine: Retrospect and perspectives, 1917-194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ohen, S.-B. (2015).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 Elgindy, K. (2020). *Blind spot: America and the palestinians, from balfour to trum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European Union. (2017). Remarks by eu high representative mogherini following the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remarks-by-eu-high-representative-mogherini-following-the-foreign-affairs-council/>
- European Union. (2020). Declaration by the eu high representative josep borrell on behalf of the eu o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declaration-by-the-eu-high-representative-josep-borrell-on-behalf-of-the-eu-on-the-middle-east-peace-process/>
- Fakhro, E. (2024).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gulf states, israel, and the limits of normaliza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ox, J., & Sandler, S. (2004).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ause, F. -G. (2023). "Th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Israel-Hamas War."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 Retrieved From <https://bfpg.co.uk/2023/10/geopolitics-of-israel-hamas-war/>
- Gavish, D. (2005). *The survey of palestine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1920-194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elvin, J.-L. (2014).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One hundred years of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renberg, G. (2011). *The unmaking of israel*. New York, NY: Harper.

- Gritten, D. (2024). Arrest warrants issued for netanyahu, gallant and hamas commander over alleged war crimes. *BB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2exvx944o>
- Gunning, J. (2007). *Hamas in politics: Democracy, religion, violence*. New York, NY: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 Guzansky, Y., & Marshall, Z. -A. (2020). The abraham accords: Immediate significance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14(3), 379-389.
- Hahn, P.-L. (2004). *Caught in the middle east: U.S.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5-1961*.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Halper, J. (2021). *Decolonizing israel, liberating palestine: Zionism,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case for one democratic state*. London, UK: Pluto Press.
- Hamas Charter. (2017). 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Retrieved from <https://palestina-komitee.nl/wp-content/uploads/2017/11/HAMAS-A-Document-of-General-Principles-and-Policies-May-1-2017.pdf>
- Hanifa, N.-A. (2020). *The power of aipac (american-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nd u.s.-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Future of the palestinian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Singapore: Partridge Publishing.
- Heller, M. -A. & Nusseibeh, S. (1991). *No trumpets, no drums: A two-state settlement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New York, NY: Hill & Wang.
- Hoffman, B. (2006).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roub, K. (2010). *Hamas: A beginner's guide*. London, UK: Pluto Press.
- Hroub, K. (2017). A newer hamas? The revised charte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6(4), 100-111.
- Hassan, J. (2023). *Ideological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underlie the war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Stimson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imson.org/2023/ideological-and-religious-extremism-underlie-the-war-between-israel-and-hamas/>
- Huntington, S.-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22-49.

- Inbar, E. (2009).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two-state paradigm. *Orbis*, 53(2), 265-283.
- Inbar, E. (2020). The genesis of the trump plan lies in the israeli left : An interview with efraim inbar. *Fatham*, Retrieved from <https://fathomjournal.org/the-trump-plan-and-those-that-came-before-an-interview-with-efraim-inbar/>
- Inbar, E. & Shamir, E. (2014). Mowing the grass in gaza.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255. Retrieved from <https://besa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4/07/Inbar-Efraim-and-Shamir-Eitan-Mowing-the-Grass-in-Gaza-PP255-20-July-20141.pdf>
- Juergensmeyer, M. (2017).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nafani, G. (1972). *The 1936-39 revolt in palestine*. New York, NY: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Palestine.
- Karsh, E. (2002).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The palestine war 1948*.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 Katulis, B. (2024). America's strategic drift in the middle east. *Policy Assessment*, Retrieved October 2, 2024, from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mericas-strategic-drift-middle-east-assessment-biden-administrations-policy-one-year>
- Kelman, H. (1997). Some determinants of the oslo breakthroug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2(2), 183-194.
- Khalidi, R. (2006).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Khalidi, R. (2013). *Brokers of deceit: How the u.s. has undermine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Khalidi, R. (2020).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 1917-2017*.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Books.
- Kontorovich, E. (2017). Unsettled: A global study of settlements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9(2), 285-350.
- Lesch, D. (2007).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sessmen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Levitt, M. (2008). *Hamas: Politics, charity, and terrorism in the service of jiha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evitt, M. (2023). *Religion and the Israel-Palestinian conflict*. Washington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religion-and-israel-palestinian-conflict-cause-consequence-and-cure>
- Lustick, I.-S. (2019). *Paradigm Lost: From Two-State Solution to One-State Realit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ynch, M. (2016). *The new arab wars: Uprisings and anarch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 Lynch, M. (2018). The new arab order: Power and violence in today's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97(5), 116-126.
- Mackinder, H. -J.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421-437.
- Margolin, D. & Levitt, M. (2023). The road to october 7: Hamas' long game, clarified. *CTC Sentinel*, 16(10), 1-10.
- Mathew, W. -M. (2013).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palestine mandate, 1917-1923: British imperialist impera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0(3), 231-250.
- Mayer, W. (2013). Religious conflict: Definitions, problem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W. Mayer & B. Neil (Eds.), *Religious Conflict from Early Christianity to the Rise of Islam* Berlin, DE: De Gruyter, 1-20.
- Milton-Edwards, B., & Farrell, S. (2010). *Hamas: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Polity Press.
- Mearsheimer, J.-J., & Walt, S.-M. (2006).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13(3), 29-87.
- Miller, A.-D. (2010). The false religion of mideast peace. *Foreign Policy*, 179, 50-57.
- Miller, A.-D. (2019). Israel and hamas need each other and a new round of conflict won't change that." *Foreign Affai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srael/2019-03-29/israel-and-hamas-need-each-other>

- Milton-Edwards, B. (2014). *Islamic politics in palestine*. London, UK: Tauris.
- Mishal, S. and Sela, A. (2006). *The palestinian hamas: Vision, violence, and coexistenc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B. (2008). *1948: A history of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J. (2008). Repression and rebellion: Britain's response to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of 1936-39.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1), 25-45.
- O'Neill, A. (2024). Unemployment rate in palestine 202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423918/unemployment-rate-in-palestine/>
- OCHA. (2023). *Annual report 2023*,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cha.org>
- Oren, M.-B. (2007). *Power, faith, and fantasy: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Pelhem, N. (2011). *Gaza's tunnel complex*. Middle East Report, 261, Retrived from <https://merip.org/2011/11/gazas-tunnel-complex/>
- Pappe, I. (2006).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ath, Y. (1977).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29-1939: From riots to rebell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Quandt, W.-B. (2005).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bbani, M. (2023, October 11). "Operation Al Aqsa Storm: How, why, and where to now in Gaza?." *Asia Pacific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asiapacificreport.nz/2023/10/11/operation-al-aqsa-storm-how-why-and-where-to-now/>
- Raja, A. (2023, March 22). At ai aqsa mosque, shards of stained glass tell a story of conflict.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22/world/middleeast/aqsa-mosque-jerusalem.html>
- Rabbani, M., et al. (2024). *Understanding hamas: And why that matters*. New York, NY: OR Books.

- Sachar, H.-M. (2007).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 Said, E.-W. (2000). *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Oslo and after*.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Sayigh, Y. (1997).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neer, J. (2010).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Segev, T. (2001).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H. Watzman, Trans.). New York, NY: Macmillan.
- Shafir, G. (1989). *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882-1914*.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fir, G. (2017). *A half century of occupation: Israel, palestine, and the world's most intractable conflict*.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laim, A. (2000).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Smith, M. (2023). Attitudes to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in yougov. *yougov.co.uk*, Retrieved July 3, 2023, from <https://yougov.co.uk/international/articles/45869-attitudes-israel-palestine-conflict-westerneurope>
- Stein, Y. (2002). *Land grab: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Jerusalem, IL: B'Tselem.
- Tessler, M. (2009).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he White House. (2020). *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Retrieved from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1/Peace-to-Prosperity-0120.pdf>
- The White House. (2021). Statement by president joe biden on the ceasefire in gaza.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trieved August 7, 2022,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7/statement-by-president-biden-on-the-ceasefire-in-gaza/>

- Thrall, N. (2021). *The only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Forcing compromise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Books.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1). The united states restores assistance for the palestinians, press stat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e.gov/the-united-states-restores-assistance-for-the-palestinians>
- United Nations. (1974). Resolution 3236 (XXIX). Question of Palest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unispal/wp-content/uploads/2016/05/ARES3236XXIX.pdf>
- United Nations. (2017).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es-10/1.22 on the status of jerusalem.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17, from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27365?ln=en&v=pdf>
- US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2014). Hamas the terrorist group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ni.gov/nctc/groups/hamas.html>
- Zanotti, J. (2023). *The Palestinians: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trieved from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4074>

「復興崗學報」徵稿簡約

107 年 6 月 13 日復興崗學報編審委員會議第 1 次修訂

113 年 6 月復興崗學報編務會議第 2 次修訂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復興崗學報」為綜合性學術刊物，園地公開每年出版 2 期，各於 6、12 月出版。敬邀各界人士踴躍賜稿。相關事宜如下：

一、徵稿論文範圍

以軍事社會科學（軍人、軍隊，及其與社會關係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領域）為主，本學報置重點於此一領域之軍事社會學、軍事心理學、軍事倫理學、軍事政治學、軍隊社會工作、軍事新聞、軍事應用藝術、軍事管理學，以及相關領域之政治作戰、全民國防、中國大陸等主題的研究。

二、審稿原則

- （一）來稿每篇由總編輯推薦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專家至少 2 人，送編審會主任委員圈選審查委員名單後，採雙向匿名審查，並請其提出建議：(1) 採用；(2) 修正後採用；(3) 修正後再審；(4) 不採用。
- （二）審查結果，如兩人均不採用，則來稿不採用；如一人不採用、一人修正後再審，則由編輯組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若無法決定，則送交編審委員會決定）不採用、或送三審或再審，以作決定，審查標準評定原則如下表。

審查人 1 審查人 2	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審	不採用
採用	採用	修正後採用 *	修正後採用或二審 *	送第三審或再審 *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採用 *	修正後採用或再審 *	送第三審或再審 *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採用或再審 *	不採用或再審 *	不採用或送第三審或再審 *
不採用	送第三審	送第三審或再審 *	不採用或送第三審或再審 *	不採用

* 由編輯組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若無法決定，則送交編審委員會決定。

- (三) 來稿如果經過審查人建議「不採用」，本學報將附上審查意見請作者參考。作者如對審查意見持有異議，可具陳反駁意見。本學報將在編審委員會議中討論議決，並將結果告知作者。
- (四) 各篇審查意見由執行編輯彙整後，提報編審委員會（或編輯組）討論，並經決議通過後始予刊載。
- (五) 審稿人員須慎重邀請具有與受審主題之研究專長及審查態度嚴謹者擔任（審稿人至少 1 名為校外人員）。
- (六) 來稿如已進入審查程序，投稿人因故撤稿者，一年內不接收投稿者投稿。

三、為提高學報學術水準，稿件應從嚴審查，寧缺毋濫。同時，為求客觀公正，對未獲採用之稿件，編輯應將審查意見函告作者，如作者仍有異議，則提交編審委員會議決。

四、學報論文內容及引用資料，凡可能涉及機敏性者，應於不違背現行法律規定原則下，在送學者專家學術審查之前，由編輯組協請編審委員事先予以審查，以免洩漏軍機或造成對國軍形象之不利影響。需要修正之處，則商請作者修改；如仍有不當之處而不予刊登者，則提編審委員會討論決議後，交由執行編輯處理。

五、本刊之學術論文著作者，申請刊登證明文件應於簽奉核定後發給。

三、稿件規範

- (一) 來稿請依《復興崗學報》論文體例，格式不符者，本學報有權退回，要求修改後再予受理。
- (二) 投稿中、英文均可，中文為 12,000-20,000 字；英文論文為 6,000-8,000 字。
 - 1. 中文摘要：以 150-200 字為限，文前並需列明中文論文題目；中文關鍵詞以不超過 6 個為原則，並依筆劃順序排列。
 - 2. 英文摘要：以 100-150 字為限，文前並需列明英文論文題目；英文關鍵詞以不超過 6 個為原則，並依英文關鍵詞順序排列。

- (三) 本學報不接受已刊登之作品，並不得一稿多投；若經發現或被檢舉確有此情況者，列入永久拒稿名單。
- (四) 文稿引證資料務必註明出處，不得抄襲，文責自負；保證無涉及侵權情事。
- (五) 論文若由學位改寫者，須於文中註明「本文為碩、博士論文改寫」；若由研究專案改寫者，亦須於文中註明「研究計畫名稱及獎補助單位」。
- (六) 論文首頁註明：
 - 1. 首頁內容包括：(1) 論文題目，(2) 姓名，(3) 任職機構及職稱／就讀學校及身分，(4) E-mail，(5) 電話，(6) 通訊處，(7) 相關說明。
 - 2. 論文名稱若有正、副題之分，請以冒號區隔。例如：〈口述影像研究：語言世界的秘密後花園〉。
- (七) 作者可以註明希望迴避之評審委員兩位。

四、本期刊採雙向匿名審查及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之限制。來稿請至國防大學校務資訊系統（<https://mis.ndu.edu.tw>）→「雜誌期刊投稿作業系統」辦理線上報名投稿。

五、經採用之稿件，本刊將酌贈稿酬，並致贈當期出版刊物 1 冊。

六、來稿一經刊登，版權暨著作權即歸本學報所有，轉載須經本學報同意。惟作者可自行彙集其作品編印出版，但應註明已刊載於本學報。

***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學報承辦人王小姐 電話：02-28925125**

E-mail: ndufhk@gmail.com

敬愛的讀者：

謝謝您對本學報的愛護與支持，為加強對讀者提供更完美的服務，請詳填下列各欄，寄回本院學報編輯部，本編輯部將依您寶貴意見，不斷追求進步與更新內容。

一、您的職業：

☐軍 ☐公 ☐教 ☐工 ☐商 ☐學生 ☐其他

二、您的最高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三、您從何得知本學報：

☐書局 ☐圖書館 ☐學校 ☐其他

四、您對本學報的滿意程度：

1. 文稿內容：☐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2. 編輯校對：☐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3. 紙張印刷：☐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4. 封面設計：☐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5. 您給予我們的批評與建議：
